



胡繩全書

第一卷（下）

人 民 出 版 社



第 三 辑
时 事 政 治 评 论
(1946—1948)



释和、战、拖

在15天(6月7日—21日)的休战期间,联合社曾传政府某要人发表谈话说:“国共冲突解决办法,不外和战拖三者,政府宁愿一战而不愿再拖。”他又说:“中国经历内战已19年,政府与人民均不愿再见阡墙之争。国家不能月复一月处于半战争状态,经济已至山穷水尽状态。职是之故,立即和平解决如不可能,政府宁愿武力解决。”

到了休战期延长8天快结束时,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社论(6月29日),发挥这“宁愿一战而不愿再拖”的理论。他说:“可谈则谈,谈好就和;到了不可谈,不必谈,谈而终无效果时,我们与其拖,还不如忍痛一时‘打’。因为打未必死,而拖则必死!”他又说:“和与打,我们无条件的百分之百的希望和。可是万一不能和而剩下了打与拖,我们却又无条件的百分之百的反对再拖。”这自然也就是“无条件的百分之百”地主张开打了。

我们还记得,在一个月前,陈诚将军向《大公报》记者谈话曾说:“大局沉闷,举国同感。一般人看法,和既不能,战又不许,只有拖!”

把这三段话连在一起看,就是和既不能,战又不许,拖则必死,怎么办呢?

试为和、战、拖这三条路进一解。



什么叫做和？

走和的路，就是要以和的方法达到和的目的。

何谓和的方法？——和的方法就是协商方法。这方法是抗战结束后在中国政治上的一个新创造。中国政治两三千年都是专制政治。专制主义者高高坐在上面，我说的话、放的屁都是“圣旨”，我要怎样，大家都跟着我怎样，这就叫做和平。但这和平完全靠的是武力。假如有人不服从我了，那怎么办呢？只有打的一法。我把你打败，我就还能高高在上；你把我打倒，你就爬到我的位子上来发号施令。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书；所以民国立国以来，几乎没有一年没有内战。专制政府以武力统一“天下”，在这“天下”中不用武力不能解决任何政治问题。所以协商的方法可说是一个空前的新方法。

在朝党和在野党的代表相对而坐，商量国事，你不能强迫我接受你的意见，我也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的意见，非要在互相妥协让步下得到共同的意见时不能做决定。——这就是协商。两党代表相商还不够，加上其他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代表，于是就有了政治协商会议；或加上美国代表做中间人，于是有了三人军事会议。所谓协商，就是把枪杆解决问题的方式，改成圆桌会议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要能在圆桌会议上取得各方一致同意公平合理的结论，就必须让参加协商的任何一方都握有“否决权”。政协会议代表包括五个方面。最初很有人担心，如每一方面都有否决权，则必至一事无成，但结果并不如此。许多繁难的问题居然都协商得五方一致同意的结果。可见协商的办法是行得通的。

用协商办法来代替打的办法，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要和平就只有采取这个方法。

用和平的方法就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我们所要争取的和平



当然不是表面的、一时的和平，而是巩固的、长久的和平。

惟民主才能保障和平，惟联合政府才能保障民主。这是已经被证明为确定不移的真理了。

自古以来实在并没有为喜欢战争而战争的人，要战争终归是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不消除造成战争的政治原因，和平总是得不到。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就使造成内战的政治背景消失了。和平就能有保障。

所以和平是什么？说来很简单，就是走协商的道路，达到联合政府的成立。除此以外，事实上不可能有和平。

照前引陈诚将军、政府某要人及《申报》社论的说法，都有和不可能的意思。为什么不能和呢？假如是在没有找到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办法时，那么面对着一大堆政治纠纷，的确是只有一条道路，打个明白，拚个你死我活，可以说，和不可能。但现在办法有了，方向有了，照此做法，自然就有和平。怎么说不可能呢？

其实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近来舆论中常用“好战分子”一语，但被称为好战分子的却总是装出悲天悯人的模样，自称为也是苦心孤诣求和平。从一种意义上说，好战分子自称为好和平，也不完全是假话。他们也是想要和平，但他虽要和平，却不愿意诚心遵守政治协商和联合政府的办法。他所要的“和平”是专制主义秩序的和平，就是把一切国事给我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包办的和平。就这意义说，希特勒也是爱和平的人。因为他曾以为，只要全世界都跪倒在我脚底下，世界和平就能实现。

爱和平并不是一句空话。是真正爱和平，就自然要放弃一切国事都由我一个人决定的办法，而赞成大家来共同商量的办法；也就



自然要放弃一切国事由我一个人包办的办法，而走向大家一起来干，共同负责的联合政府的办法。离开这唯一的可以得到和平、保障和平的实际办法，和平就只剩下了一句空话。

人民爱和平，但人民不能牺牲一切民主要求和民生要求来作为得到和平的代价。专制主义的和平只能靠武力来求得，也只能靠武力来维持。所以专制主义的爱和平，实际上变成了爱战争。

也许有人说，协商的道路、联合政府的目标虽能得到和平，但是太麻烦了。是的，从向来以打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历史转到协商的历史，不是很容易的事。要把不同的意见协商出共同的结论，不容易。而且旧的问题解决了，也难免有新的纠纷发生，又待协商。联合政府的成立更是艰难，不能一跃而至。人们曾提出从临时性的联合政府到长久性的联合政府的办法，又曾提出从地方的联合政府到中央的联合政府的办法。——但不管怎样困难，需要多少时间，只要大家始终守着有问题就协商的方法，始终坚信以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解决一切纠纷的方向，则和平就能维持，国事也总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坚守着协商的方法，确定了联合政府的方向，一步步逐渐做下去，——这不能叫做“拖”。

“拖”是什么意思？只有在排斥了协商的方法，丢开了联合政府的方向时，才会形成不幸的拖。既不走和的道路，又不敢或不能立即公开宣布战的方针，明目张胆地打，那就是拖。

“拖”和“战”的不同，只是暗打和明打的不同，小打和大打的不同。——上引某要人的话说得很明白：他把拖解释为“半战争状态”。

究竟是谁愿意拖呢？



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愿生活在不死不活而等死的拖局里，那是不待说的。

国民党是不是愿意拖呢？照上引某要人谈话及《申报》社论看来，国民党也并不愿意拖。他们甚至说，与其拖下去，不如马上打，甚至断然地说，拖则必死。

但国民党方面似乎以为共产党是愿意拖的。《中央日报》6月27日社论题目是《共产党不要再拖下去了》。据说陈果夫先生曾在一次演说中说，“中共现在打算着拖下去，以期在拖中获得利益。”但是拖难道只是对国民党有害而对共产党有利么？这并不合乎事实。因为走协商的道路达到联合政府的目的，这无论如何，对于共产党是比拖下去更有利的。所以从实际上看，共产党不至于宁愿拖而不愿和。

照我们这样说来，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拖了。既然大家都不愿拖，何以实际上又会出现拖局呢？

不肯认真走和的道路的好战分子对于拖局的造成是要负责的。

专制主义秩序的和，不可能达到；民主协商的和，不愿意去求得。于是只好战。但战又不许——人民的反对，世界的形势，实际的力量现在都有阻碍。战不得，便只有拖了。

而拖在他们看来，作为战的准备，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在拖中也许可以求得：第一，在人民眼中逃避开好战的责任；第二，利用拖的时机增强战的资本；第三，也许可以拖到国际最有利的时机，譬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是另一方面，从好战分子之立场上看，拖下去又未始没有害处。拖究竟不是和，而起码是半战争状态。首先人民是欺蒙不了的，谁造成拖的局面，谁就是破坏和平的罪犯。其次，在半战争状态下



自然还是有消耗,不仅经济上越来越“山穷水尽”,军力上也不见得能越拖越强,可能越拖越弱。最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尚不可知,而且纵然拖得到那时,是否有绝对把握也难保,万一没有拖到,自己已先拖死了,那就更糟糕。

就这方面考虑,又觉得万万不能拖。

因为觉得拖中还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拒绝所不喜欢的民主协商的和,所以在“战不许”的时候只好退而求拖。但又因为拖或者反会蒙大害,于是又愤而有与其再拖,不如一战的想法,正如赌徒之下孤注一掷的决心。

所以可以说,有两种好战分子,一种是审慎派,以为:“战不许,只好拖”;又一种是急进派,以为“打未必死,拖则必死”。由他们的口气就可看出,他们无论对于打,对于拖,都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没有绝对的信心。而这二者实际上又同归于统一,主张拖的人也无非是主张小打,暗打;而主张打的人在打不出所希望的结果时,也还是只好走向拖的方针。

“战不许”,这是对的,人民不许内战,谁进行内战,谁就要受到人民最顽强的反对;但是拖难道就是人民所容许的吗?“拖必死”,也是对的,好战分子能有多少力量可以禁受得住拖。但既然拖必死,难道打就有把握了么?会不会打起来,死得更快呢?

由好战分子的自白中,就可看出,在人民反内战的雄伟力量前面,在不利于战的实际局势下面,好战分子自己也感觉到自己走向了绝路,只能在战与拖这两条死路间选择一条,挣扎求生。

而他们之所以觉得眼前只此两条路,正是他们已先肯定了“和不可能”的前提。——专制主义秩序的和是他们所想望的,但不可能;民主协商的和是可能的,但他们不情愿。

好战分子拒绝民主协商,而自行陷入死路,那并不足惜,但是



把中国的国运，四万万人的共同的命运，都拖下了泥坑，这是万万不能宽恕的。

中国人民既坚决反对拖，更坚决反对打，要从实际上来更多地使得好战分子得到教训，使他们知道，无论是打还是拖都是“必死”的路，而绝无“未必死”的侥幸可能，这才能把国事拉回到和平的轨道上来，由政治上来求解决，由协商的道路达到联合政府的成立——这就全靠中国人民的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发挥了。

最初刊载于1946年7月6日《周报》(上海)
第44期。



中国不该是一个战场

中国还是一个战场

极目四望，四野茫茫，已经饱受了 18 年的战争灾殃，中国大地至今还是一片战场。

鄂中、鄂北的战事最紧张。中共方面宣称，国民党部队在这地区从上月 26 日起（即在所谓休战命令尚未失效的期间），已接受秘密命令而发动“围剿”；国民党则宣称，中共的中原军区的部队从上月 29 日起开始越过平汉路，向西“猛攻”。实际的情况不难看出，这是一方面围攻，一方面突围的战争。中共部队在这地区在李先念将军部下共约 6 万人，散布在平汉路两侧，在国民党部队 22 个师 30 万人包围下，被分割成若干小块。四五月间，因周恩来、白鲁德、徐永昌 3 人亲往调停，军事危机稍见缓和，但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早料到这里埋着一触即发的火种。现在果然大规模爆发了。中共中原军区的中心宣化店已被占据，中共军正分向豫南、鄂北各地分散。一方面想聚而歼之，一方面自然要突围四出。聚歼的计划显然未能实现，好战者的野心倘还不因此而收敛，中原广大地区上的炮火是停不下来的。

但战事不仅在中原。

在胶东有战事，在津浦线有战事，在山西的北部和西南部有战



事。

而且战事还有传染到别的地区的可能。

热河南部是可能发生战事的一个地区。苏北又是战机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区。

华北和华中一片战火。相反的，在东北倒显得形势和缓。在东北的双方军事指挥官杜聿明、林彪二将军，且已因军调处长春分部美代表之斡旋而相约在长春会晤。自从中共军由四平街、长春退出，接着在野战中国国民党军损失了相当大的兵力，又加以滇军 184 师宣布反内战，这样一来，东北军事形势便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局面。固然一时遏制下了好战者的野心，但也不能不令人担心战机还在暗中酝酿。

5 月间，马歇尔元帅曾说要阻止东北内战牵到华北，现在是不是又要阻止华北、华中内战牵到东北呢？总之，中国是整个的，在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内战都会引动全局。今天内战的形势不仅是 1 月 10 日停战协定以前的局势，而且是更加严重了。

谈判在南京已经停顿。据说中枢当局要到庐山去“避暑”了。把全中国化成了血海的战场，难道在五老峰前就能感到清凉么？

从军事到政治

南京的谈判之所以失败，政府方面坚持单独解决军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人们早已看出，离开民主政治原则的实施，军事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是“休战”23 天间的谈判失败后，国共双方代表直接商谈（所谓五人会议），政府方面仍只愿意商讨军事问题，因此五人会议到 7 月 6 日后，一事无成地停顿下来了。

但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看出，政府方面主张先解决军事问题，



并不是无兴趣于政治问题，实际上他所提出的军事方案是有政治意义的。

大家都知道，使谈判成为僵局是由于所谓防区问题，其实应该说是补充整军方案，明确规定驻地的问题。双方争执点大致如下：

第一，政府方面要求中共退出下列各地区：1. 陇海路以南（包括苏北、皖北）；2. 胶济路全线及山东沿海各地区；3. 热河省的承德及其以南及冀东；4. 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及其以南；5. 东北的安东、通化、牡丹江、哈尔滨、洮南五城市。

中共方面答复：中共可以在下列各地不驻兵：1. 苏北的淮安以南；2. 胶济路全线；3. 承德以南及冀东（承德不在内）；4. 张家口以南（张家口不在内）；5. 哈尔滨市。

第二，政府方面说，上述各地区要求中共撤退者，不仅是中共的军队，而且一切现有的行政机构都要撤退。

中共方面说，只能规定某些地区不驻兵，无所谓全部撤退。因为以军治政是不对的，军民分治也为政协会既定原则。现在既先谈军事，只能讨论军队驻地。中共军撤离地区之人民自由、农村改革、地方自治政权均不能变更。倘要变更，即涉及地方政治问题，应依政协会原则另行讨论。

由双方争论的这两个要点来看，就知道症结虽似乎在第一点，其实还是在第二点。以第一点而言，整军方案原来规定中共在华中可以驻 1 军 3 师（12 个月后再缩编为 2 师），因此政府要求中共军退到陇海路以北是说不通的。而且对这点，中共方面对军队驻地已愿有所退让，并在五人会议上又答应不等到 12 个月以后先缩到 2 个师，因此华中驻军问题理应可以解决了。其他各地区，中共方面也同样都提出了妥协的办法，实在没有继续僵持的道理。所以真正的纠纷其实是在第二点上。



在这里是两个原则的对立：

一个原则是，这一地区里有谁的军队，谁就有权管这一地区的政治，爱怎样干就怎样干。所以你的军队撤走，一切地方政治就得归我管。

另一个原则是，不能由武力的分布来决定政治问题。地方政治问题只能由政治协商，根据民主原则来解决。

谁都看得出来，前一个原则不过是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原则。因此也就很清楚，虽然说是先只求解决军事问题，但实际上却是要以军事力量为先锋来扩大其一党专政的地区，是要避免在政协会民主原则下解决问题，而仍旧用一党专政的政治原则来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就看到，一面谈判停顿，内战蜂起；一面政府当局仍坚拒召开政协会议，却单独宣布国民大会日期，并有不管各党派参加与否单独进行改组政府和开国民大会的表示。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政府怎样改组，国民大会怎样开法，其结果仍不过是一党专政的继续强化而已。所以中共与民主同盟已提出严重的抗议，并要求立即重开政协会议。五人会议虽在10日又重开，但是各方面都相信，假如不坚决放弃一党专政的政治原则，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只有重开政协会议，由改组政府着手来解决一切问题，才是唯一的正路。

美国向何处去

本月初，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有电致马歇尔，要他尽最大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

7月9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这两个行动都不是不重要的。

美国的帝国主义性的独占资本反动集团，在政治上以胡佛、范登堡、杜威、惠勒以至赫尔利、魏德迈等人物为代表。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全力组织反苏集团，准备进行反苏战争，以争取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他们在远东通过麦克阿瑟元帅及其影响下的美国驻远东海军所做的是，是完全适应于其世界政策的。如在日本，扶植法西斯残余势力，使日本政治至今仍在混乱中。本月10日的联合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中，美方甚至排斥对于日本的劳工所作民主改革的建议。如在菲律宾，扶植曾与日本法西斯合作的罗哈斯做总统，使菲律宾名为从今年7月4日起独立，实际上仍在美国军事管制下“尚不如锡兰之自治”（英国《星期时报》之评论）。于是在中国，便是扶植一个最腐败无能、专制暴虐的政治集团，军事援助和经济控制双管齐下，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其直接结果就使得中国的内战不已。美国的反动派相信他们能用武器来造成中国反动派的胜利，而稳定美国在中国的独占权利。他们的活动抵消了马歇尔在中国的和平努力。

但事实上是，虽有原子弹，美国反动派也还不能有发动世界战争的把握；虽有美式配备，国民党在中国的战争也并无必胜的把握。

必须看出，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之能够做到解决了一连串的具体问题，并且已于7月9日商定发出7月29日召开21国和平会议的请柬，这是击破了国际反动集团无数阴谋阻碍而才能得到的结果。也可以想见，下星期内，巴黎会议中讨论德国问题、奥地利问题与意大利内政，还会有重重波折。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了，国际反动集团到底不可能丢开苏联来单独解决世界问题，而燃起世界战争的火药线。美国的根本国策仍不能不服从于世界的和局。



说到中国局势，在世界和局下单独发生中国内战，难道真是对美国有利的么？美国的反动派的对华政策是使中国走向绝境，也使美国的远东地位走到险岩的边缘。而且在美国支持下的中国内战显然危及世界和平，因此对莫斯科会议宣言负有义务的苏英两国也不能不越来越注意这问题了。

世界的舆论（包括美国本国的）都在责问美国，到底美国对华政策要走向哪里去？

司徒雷登受马歇尔之邀，参与调停国共纠纷，现在出任大使，这和杜鲁门的信一样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因为这表示，美国的基本国策仍不能不从“促进中国的和平”这一点出发。

但问题是，促进和平不是一句空话。美国是握有具体办法来制止中国好战分子的行为的。联总署长赖伽第亚在本月9日宣布，即日起停止一切工业与农业设备运华。这对于中国一党专政下的贪污腐败、排除异己的官僚机构虽是一个警告，但制止内战显然还远远不够。中国人民要求，美国立刻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取消以军事设备援华并派军事代表团到中国的法案，并且撤退一切在美国驻军，因为这就是美国帮助中国建立和平的最有效的办法。

中国人民，目前坚决要求和争取的就是这三件事：第一，国共两党立即无条件宣布停战，停止一切冲突；第二，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根本解决政治问题，实现政府改组；第三，美国彻底改变其政策，停止助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中国人民一定要用一切力量来排除国外的和国内的反动派的阻碍而争取和平的实现。中国一定不该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战场！

最初刊载于1946年7月13日《民主周刊》（上海）
第39期，署名念青。



一年来人民努力的成就

——为抗战结束一周年而作

我听见好些地方的人都把去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叫做“放爆竹的日子”。似乎胜利的欢喜，也像爆竹一样，兴高采烈了一阵，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而从放爆竹的那一天起，寒来暑往，不知不觉，已经过掉一年了。

但这一年究竟不是毫无痕迹地白过了的。虽然在这一年中，我们一次次经历到乐观的幻灭，希望的破碎，但是从幻灭中我们又重新获得昂起头来前进的力量，从破碎中又重新取得对于中国的将来前途的坚定的信心。

这一年不是白过的。我们应该总结这一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总结这一年来人民斗争的成果，来增强我们的力量和信心。

抗战结束，内战继起，愈打愈凶，停不下来。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

一年来的经验使大家愈来愈明白，内战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在政治问题上。这政治问题又不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党争”，而是两条基本的政治路线之争，是中国前进途中两个方向的斗争。

不承认是内战而口口声声只是说“内乱”，其用心固然是以“戡



平内乱”作为进行内战的借口，同时也是为了蒙蔽在这里实际存在着的两条路线、两个方向的分歧。

抗战结束后的政治形势是抗战期间的政治形势的延长和发展。抗战结束后的两条政治路线也就是抗战期间、抗战阵营内部两条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一条是人民的路，一条是反人民的路。前者是民主的路，是一切依靠广大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后者是反民主的路，是一切依靠“外援”，也就是依靠帝国主义。

抗战结束后，中国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问题逼到了我们的面前。是一切“复原”，回复到抗战以前的那个老中国的样子呢，还是向前进步，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新中国？

怎样才能使中国进步？不仅有八年抗战的经验，而且有百年来的苦痛经验，我们已经懂得，一定要做到这几件事，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

第一，在农业上一定要进行改革。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唯一办法，也是消除中国社会落后的因素的基本办法。

第二，工业一定要发展。但工业发展不能依靠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正是扼杀工业不能发展的因素。要给自由的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才是发展工业的办法。

第三，一定要脱离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控制。用改革农业和发展工业的办法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我们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建国力量，我们就可以和一切友邦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

第四，为了做到以上各点，一定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官僚政治、军阀政治、法西斯政治必须铲除，广大的人民必须获得参加政治生活的充分自由与权利。

这便是人民所要求、所争取的新中国的基础。但是代表大地主



和买办大资产者的反动政治集团不愿意走这条路。他们所要的恰恰和这四点相反。

第一，他们要维持和巩固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以保障他们土地剥削的利益。

第二，他们要用官僚资本控制生产事业以压制自由的民族资本家与工人的抬头。

第三，他们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外力援助上以排斥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四，他们坚决走独裁统治的政治路线，对于人民在抗战期间所已取得的民主权利甚至都要收回去。

用不着解释，走这条路就是使中国更深地陷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甚至于必然发展到完全殖民地化而后已。

中国国内的两条路线的对立，又是以世界性的两条路线的对立为背景的。世界性的两条路线不能仅以美苏的对立来说明。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新中国，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在战后所要求的同样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要求肃清法西斯的残余，推翻国际独占资本的统治，而在还存有封建残余之处，更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样来达到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国际独占资本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庇护战败了的法西斯势力残余，不惜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向全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进攻。

中国的反人民势力得到外国的独占资本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正在努力使中国走向奴隶的绝路，去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

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在继续其在抗战期间的努力，用群众的力量把中国推向自由解放的光明前途，并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为



建立自由和平的新世界而奋斗。

这两条路线的谁胜谁败，是否一定要取决于内战的炮火中呢？

要求走民主路线的人民大众不需要战争，因为民主的胜利完全可以不靠枪炮而取决于人民的自由意志。所以民主与和平二而一，争和平就是争民主。

拒绝民主的人一定就是破坏和平的人，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切拒绝民主醉心独裁的人，总是妄想靠武力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从武力中寻求自己的出路。

当人民已经觉醒，坚决走民主的路线，而反人民势力仍拥有强大军力时，内战自然难以避免。纵然人民没有武器，也会有别种形式的内战。“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以至闻李二先生的被杀，不就是在向和平人民的宣战么？

两条路线，两个方向——互相激荡，就形成这一年来极度不安定的局面。内战就是反民主势力向人民的进攻。和平就是人民大众压倒反民主势力的武器。

中国今后百年的国运取决于当前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一年来，政治舞台上有过一次次的会议、一个个的文件，人民为了争取和平甚至已经流了大量的血。有人感到失望悲观。但必须看出，一年来，人民的努力是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了。

一年来的局势至少已经证明了这几件事：

第一，反民主势力企图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无论如何是不能成功的。因此：

第二，统治者终究不能为所欲为，人民至少已保有“否决权”，因此产生了协商的方式，而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第三，组织联合政府，这是抗战结束前已被提出的办法，也已经被证明是真正实现民主所不能不采取的途径。



我们来简单说明这三点。

抗战一结束，内战就继起。去年八九月间内战虽已挑起，但发动内战者无论在华北或华中都有一筹莫展之苦，这是第一次证明内战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就有在重庆的国共商谈。在商谈期间，好战分子由于美国的帮助，才能在华北取得若干重要据点，这使他们觉得还可一逞，于是10月以后内战重起。一战于绥东，再战于漳河北岸，华北问题不能用战争解决的形势已定。11月中旬后，又在美方支持下移其目光与行动到山海关外，但在东北也只能做到浅尝即止。因而不得不在12月中重开谈判，产生今年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并举行政协会议。这是第二次证明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政协会后，3月上旬起，苏军由东北撤退，“武力接收东北”的内战又启，美械师纷纷集中东北，从关外到关内，内战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概。但直到5月中旬仅仅做到占领长春，其时好战分子未尝不以为可以一帆风顺地武力解决东北。但到了5月底，东北军事形势已不同，从长春再要向四面八方发展已不可能，于是不得不有6月7日的东北休战命令。这是第三次证明内战不能解决问题。22日的休战过后，战机又开，这回是箭头指向华中，6月26日发动鄂北之战，7月15日发动苏北之战。这回是第四次来证明战争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了。

武力之不能解决问题，不仅由于军事形势，这个武力所恃为靠山的不过是美国的帮助，而这个武力所要对抗的却是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和民生要求。人民的要求是压制不下去的。孙中山先生早已说过：“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相结合者无不败。”这是我们从一年来的形势中可以得到充分信心的。

其次，专制统治者从来以为“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说什么就是法律，就是天经地义，不必和任何人商量。抗战结束以后，首先由



去年 9、10 月间的国共商谈产生了双十会谈纪要，其次由今年 1 月的政协会谈产生了 5 项决议，继之又有三人军事会议及在 3 月间产生的整军方案。这些东西，说起来都是不合于一党专政的“法统”的。不合于“法统”的东西，也不能不承认其存在，这就表明一党专政的“法统”已在事实上开始动摇了。人民虽还没有取得最后决定国事的权力，但已开始取得否决权。在党派协商中，在政协会议中，每一决定必须得到各方代表一致通过，有一方面不同意即不能成立，这就表示，各阶层人民的代表至少已开始对国事取得否决的权力。在从未有过民主的中国，这是一件空前大事。人民有了否决权，也就是统治者已不能有完全的支配权了。

固然至今反动分子仍企图无视人民的否决权，并取消政协会议的成果。但是要知道协商的方式是符合于目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形势，也是由这形势中产生的。人民要用最大的力量来保卫政协会议的成果，这是没有人能够加以毁弃的。一年来的形势证明要解决问题，只有走政治协商的道路。

再其次，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政治民主化，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而以改组政府为实现这两个口号的先决条件。由改组政府而产生民主的联合政府，再由联合政府来实施和平建国纲领，一方面根据整军方案以达到军队国家化，一方面召开民主的国民大会以制定民主的宪法而完成政治民主化。这个方案异常明确，虽然至今还未实行，但是要求得政治解决，就不能抛开这个方案，就不能不从改组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开始。这个方案又是国际间所公认的。去年 12 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一致承认依循民主团结之原则改组政府为中国问题解决的枢纽。谁要来帮助中国解决政治问题而不遵循这个方针，必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也必然于事无补。



固然，联合政府还是中国人民所争取的事。对于政协会议，3月间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发动了毁约的攻势，7月初单独宣布召开国大是又一次的攻势，企图加以毁弃。但是事实已证明，这已经是动摇不了的了。确定了联合政府这一个不易的方针，也是中国人民一年来的民主奋斗的成果。

所以我们说，一年来的局势尽管是迂回曲折，艰难重重，但人民的奋斗是有成果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回顾这一年的局势时丝毫不感到悲观的原因。

一年来的局势使我们看出中国前进途程上的两条道路。——中国人民只能选择民主进步的路，而拒绝另一条倒退死亡的路。

一年来的局势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步的路而作的努力已开始取得重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一定是毫不犹豫地继续奋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年来的局势也充分使我们看到中国的路是何等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的民主斗争是在何等的艰难困苦之中进行。今后，中国人民还要走同样，甚至更加曲折而艰苦的道路，是可以料想到的。但是看了过去的一年，我们对于人民力量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打破一切阻碍的信心，是再坚强不过的。

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的力量曾经配合了国际民主力量打败了赫尔利之流，使得中国的好战分子受到极大的打击。中国人民曾经一次次阻止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一次次阻止了破坏政治协商的阴谋。——反动派还有什么花样、什么本事是人民力量所不能战胜的呢？

当反动派用出暗杀的手段时，不过表现了它的残酷和丑恶，也表现它的怯弱与无出路。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惨遭杀害，不是因为人民的力量薄弱，



也不表示人民的力量将被压倒。不，恰恰相反，这正足以说明人民民主力量的异常强大，吓得反动分子手忙脚乱，就不择手段地采取这种最卑鄙的暗杀政策来对付人民了。从李闻二先生流血的地方开始，中国人民将更奋勇地前进，展开新的斗争，来达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实现。

1946年7月18日

最初刊载于1946年7月25日《理论与现实》(上海)
第3卷第2期。



“坏政府”必须改组

“改组政府”的由来

今年6月里,美国的《时代》杂志发表了《坏政府》一文,立刻轰动一时。中国官方,虽则一向对国内民间舆论采装聋作哑主义,但对于高鼻子的这篇文章立刻作出了反响。官方报纸或强词解释,或苦口掩饰,甚至连官方重要人员也为之而发表了谈话。好像这篇文章是中外舆论中破天荒第一次发出这般论调,才引起这样注意。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篇文章的内容也无啥希奇。一则固然这里所写的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拖沓无能的情形,对于我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再则这些情形也不是第一次见之于舆论,在本国民间舆论早已不知写出过多少了。本国的舆论对这个“坏政府”的认识,比高鼻子洋人的认识自然透彻深切得多。

这个政府之为坏得不可救药的坏政府,在中国人民中实在早已是一个常识,初不待《时代》杂志来“肇锡以嘉名”也。中国人民早已就认为政府必须改组,其原故很简单,无非是已看出这是一个其坏无比的政府——非改组不行。

假如执政的国民党也承认改组政府的必要,那也就是承认这个一党包办的政府确是个坏政府。若是不坏,自无须改组。

在抗战最后一年中,人民已坚持不断地主张彻底改组政府。因为在1944年中原及湘桂战役中,最使人民痛心感到这实在不是



一个可以信任的政府。那时政府为了应付激动的民情，转移内外的观感，也曾有过几次人事的更动，但这种更动不过如当时大后方人民所说的是“牌桌上的又一次搬位”，换来换去，还是这几个屁股在这几张椅子上移动而已。1945年5月，宋子文真除行政院长，并以翁文灏为副院长，以蒋梦麟为秘书长，7月底又把全部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免职重任，实际上只添了个王世杰当外交部长，去了个已无足重轻的农林部长盛世才。但这一切，在人民看来都只是极其拙劣的变戏法而已。因为人民所要求的是结束一党专政的改组政府，而当局却想以一党内的人事变动来敷衍门面。对于各党派参加政府一点，当时当局曾提出一办法，即是在行政院中设一政务委员会，以容纳各党人士，这不过是在政府中添出些拿干薪、吃闲饭的陪客的办，自然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说，直到去年12月里，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发表以前，中国政府当局并不承认政府有改组的必要。中国人民虽然一直在督促，在呼吁，全无效果，非等外国人来讲一句话不可，这在中国人民想起来，实在不能不觉得惭愧。但是我们也应该说，假如没有中国人民早就提出彻底改组这“坏政府”的主张，则杜鲁门的声明和莫斯科会议的决定也不会产生。

无论如何，到了去年12月后，中国政府当局也不能再说自己是好到不必改组的政府了，已不能不承认，要改组政府就是要扩大政府基础，使各党派都能参加。

但政府到底如何改组呢？于是有了政协会议的决议。政协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代表先提出了一个方案，经过长久的协商得到了一个一致通过的决案。

有了政协会议的决议案，于是这就成了铁案如山，不可动摇



了！

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须从改组政府做起，而改组政府就是要把一党专政的坏政府，改变成为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共同参加、共同负责的好政府。

政协决议案的分析

政治协商会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根据政协决议案与当时讨论的情形，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指出下列数要点：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政协的改组政府问题决议案是带有妥协性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执政党方面的让步，也有其他各党的让步，才产生这个决议案。现在看起来，我们甚至不能不说，当时各民主党派在许多地方都让步太多了。其他各党承认改组政府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加以扩大，进行改组，这是各党派的一个很大让步。所以政府当局至今还一口咬定，不是成立联合政府，不过是在现有政府中增加一些其他党派的席位而已。但是必须知道，政协会中对于“以现政府为基础”这一点是有明确解释的。其意义只是说：

一、承认现任国府主席蒋先生仍为改组后的政府主席；

二、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较其他党派所占席次最多。最初政府方面代表的提议是国民党应“占特定程度的多数”，最后协议结果则是在国府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占半数的席次。

就这两点看，在改组后的政府中，国民党仍占有优越的地位是很显然的。但国民党之占有优越地位，只能仅此而已。政协决议案中明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之国务机关”，这就是说，政府改组以后，再不能有国民党一党的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党中央



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凌驾于各党派共同组成的政府之上。

所以按照政协决议，政府改组以后，国民党在政府中虽占优越地位，但已不享有支配政府的权力。

第二，因此在改组后的政府中，其他党派就应与国民党同立于平等合法地位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在政协决议案中是用下列数点来保障的：

一、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人员均由各党派自行选出。在决议案的附注第一点说：“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时，由各该党派另提人选”。这很清楚，国府主席没有自由决定人选的权力，国民党一党的机关对此更无干涉的余地。

二、附注第三点说：“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第五点说：“关于国民党以外人士所担任之部会数目，于今后继续磋商”。在政协会中没有能作出具体规定，实在是美中不足，但是很显然的，这些未决问题仍是要由各党派代表继续进行协商来议定，而不是由国民党一党来指定。

三、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中个人独裁制度不应继存。这也是各党派均享有平等合法地位之保障。在政府代表向政协会所作原提案中主张国府主席对于国府委员会决议案有提交复决权，“复议时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并且国府主席还享有紧急处分权，“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但应于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照这提案，国府主席仍是高居于国府委员会上的独裁者。在协商中，各党派代表都一致反对紧急处分权，并认为提交复决权应有严格限制，最后协议结果写定在决议案中，固然已取消了国府主席的紧急处分权，



但是对于提交复决权所限制仍少，只把政府原提案中“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减少为“五分之三以上”。在国民党员占半数的国府委员会中，要以五分之三以上的人数来否决主席的建议，显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这点上，各党派代表实在让步得太大。

不过，无论如何，在改组后的政府中，各党派应一律享有平等合法地位，否则改组即无意义，这点是已确定的了。

第三，改组政府与共同纲领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改组政府并不是增加许多人来做官，改组政府并不是除了人事更动外，一切照旧，这就由共同纲领之制订来保障。在政协会中，最初政府方面对于制定纲领不感兴趣，由于各党派的坚持才产生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后，无论哪一党派在政府中必须以此为施政准绳。

为了保证在政府中的多数党不能借多数的地位而推翻共同纲领，在改组政府决议案中又特别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决议某一议案”。因此，中共与民盟在国府委员会应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席次（至少 14 席），是很合理的。

第四，政协决议案不仅规定国府委员会的改组，且也决定行政院的改组。最初政府方面只想延揽一些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国府委员会就算了，不愿涉及执行机关。但各党派认为，假如执行机关仍操诸一党手里，则国府委员会的改组还是无效的。结果在决议案中也提及了行政院方面的改组。不过按照政协决议，行政院中加上了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 3 人至 5 人，而连现有部会及增设之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总额中，只以 7 席或 8 席由国民党外人士担任，至于究竟有哪几个部会由国民党外人士担任，还未规定，须“于今后继续磋商”。这方面的决议实在太嫌不够了。



由以上各点可见，政协的改组政府决议案虽然大体上可以令人满意，但由于各党派急于求得协议，让步太大，就留下了这些漏洞：

一、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国府委员会名额未分配妥当。

二、在行政院政务委员会中国民党外人士所规定席次太少，尚不及三分之一，且未具体规定部会数目。

三、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中，主席只要有五分之二委员的支持，即可推翻国府委员会的决议。

这几个漏洞就是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可乘之隙。

不准破坏政协决议

但无论如何，政协决议的基本原则是不容许破坏的。

改组政府是为了实施共同纲领，而和平建国纲领是明定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因此在召开制宪的国民大会以前，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假如不从改组政府着手，先行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那就是破坏政协决议，破坏民主团结。

要进行改组政府，必须经过协商，来具体规定国府委员会中各党派名额分配及改组行政院及其所属各部会的方法，并商定各党派参加政府的名单。假如拒绝协商的办法，只由国民党片面指定某些国民党外人员参加政府，那就是破坏政协决议，破坏民主团结。

在改组政府以后，要确实做到一党专政制度的取消。所谓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行撤除，国民党中常会、中执会对于政府只能是普通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在国民政府内应确保民主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独裁制度。行政院的改组应与政府改组同时进行，不仅重要各部会（内政、外交、国防、财政、交通、经济、教育各部）不能由一党包



办,而且所有各部会内部均应改组成为各党派共同参加。假如不做到这样,仍图以一党的机关来控制政府,并在政府内建立个人独裁制,或者只改组决策机关(国府委员会),而不改组执行机关(行政院及各部会),或使执行机关中的主要权力仍操纵于一党之手,那就仍旧是不脱一党专政的窠臼,那就仍旧是破坏政协决议,破坏民主团结。

政府改组,就要执行和平建国纲领。和平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保障人民自由,以民主自治原则解决地方政治问题,实现军队国家化。尤其保障人民自由和实现从下到上的民主选举这两点是政府当局自己的诺言,更不必待到政府改组以后才做。假如一面谈改组政府,一面却摧残人民自由,并以武力解决地方政治问题,那就很显然是以改组政府为骗人的幌子,也就是根本不尊重政协决议,破坏民主团结。

一年来,好战分子以武力解决内政的方针,已经从事实上证明其失败。而一党专政的政府之为一个坏政府,也已是中外咸知共闻的事实了。自政协会开过以后,半年来,政协决议被搁置不执行。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形下,时局的严重与日俱深,内战的惨祸不断扩大。为今之计,是只有改组政府才是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了。而要改组政府就一定要遵守政协决议,经过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才能有效。

改组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医治一党专政的“坏政府”的办法。

7月23日

最初刊载于1946年7月25日《文萃》(上海)
第1年第40期,署名念青。



剥夺他们的武器

谁是凶手

7月17日中央社电说：“蒋主席对李公朴、闻一多被狙击殒命事，闻讯后极为关怀，已手令电谕滇省军政当局，限于一星期缉获正凶，依法严办。”从17日到现在，已经不止一个星期了。

好难破获的一个案件啊。

但究竟谁是凶手，谁的手上染着李公朴、闻一多这两位忠贞的人民战士的血，这在人民的心里是早已清清楚楚的了。

凶手还没有把手上的血揩干，就以为可以凭着猫哭耗子的假惺惺的手段，靠着胡赖乱扯的本领而逍遥自在了。——这难道是不可能的么？假如竟有这样的事，那么在九泉下的袁世凯，一定要懊悔当年杀死宋教仁时技术太差了。

不，不可能的。人民断不能让凶手在伪善的面目下继续在黑暗中进行最无耻残忍的勾当！

一星期来的发展充分表明，昆明街头的这一政治暗杀已经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巨大的波动。

便是最保守的观察者，只要还保存着一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能不从这一事件中看出，一种恐怖的秘密武力正在暗中挟持着中国人民，不惜以一切恐怖手段来企图斩绝民主人士。人们也就不能不从这种事实，看出中国当前政治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别的什么



地方,原来恰恰就是在这里。当这种使用秘密武力的恐怖政策不肃清时,还有什么和平协商之可言!

英文《大美晚报》20日社论直率地说:“如果蒋主席要使中国成为民主、守法、非集权主义的国家,对这秘密团体唯我独尊的王国,实有迅予肃清的必要。”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发表书面谈话,用最愤激的调子说:“这种对内的特务机关是与宪政不相容的。政府口口声声要各党派参加到政府里来,但同时却拿这一机关监视我们,威胁我们,试问我们怎么能参加呢?我们正告政府,这种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

民主同盟坚持必须公开彻查这案件,由政府与各方面共同进行调查。昆明民盟主张组织一由美国顾问参加的调查委员会。他们的建议是对的,应该做到。因为昆明血案能否得到昭雪,真正凶手是否受到惩处,其政治意义并不比调处某一个内战战场较为次要。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陈立夫为周恩来所斥责的事件。

周恩来18日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所发表的谈话中有一节涉及陈氏。他说:“陈立夫先生又来上海了。他是来布置统一党政军的行动,镇压民主运动的。黑名单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凶打、绑票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先生的手中,更不论我们共产党人了。……如果以陈立夫为首的特务机关说我是冤枉了他,希望他有所声明,并拿出事实来看。”

19日陈立夫发表谈话,只说:“周恩来此种谈话既绝无事实根据,且为有意制造社会恐怖,对政府为毁损威信,对个人为公开侮辱及毁谤。”同时,由中央社发布陈氏致周恩来的信,内容与这谈话大致相同。

但接着21日联合社南京电转述了《中央日报》载陈立夫谈话,内称:“中共犹如人体之盲肠,有危害生命之一日,吾人必须割除



之。”上海各报在22日刊出这联合社电后，陈立夫立刻又发表了一个否认的谈话，但承认有割盲肠之一说：“譬如有盲肠炎，良医必先用内服之药。如证明其确将危及生命，自当施用手术，加以割治。”

在全面性的内战正在展开，而昆明血案还在布置新的行动之时，我们听到“割治盲肠”之说，能不心惊！

没有发出的文告

18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由南京至庐山。20日司徒雷登先下山。22日晨马歇尔也离牯岭回南京。据说“马歇尔此次来庐山，携有解决国共纠纷新方案，范围包括日益扩大之内战及国民政府之改组各点。”

20日，南京报载，蒋主席要有一重要文告发表。就时间上看，这想发表的文告不可能是马与司徒上山谈后的结果。这个文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据南京报纸所透露，其内容涉及“扩大政府机构”及“11月12日召开国大”等事。

这几天，南京、上海各官方报纸差不多一致强调，政府要单独地进行“扩大政府”，“召开国大”，不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用这些官方的说法就是现在不是“谈”的时候，是要政府“尽其在我”地“做”了。《大公报》20日南京专电说：“政府为解决当前国内纠纷，经全盘检讨，已有新决策，即仍遵循蒋主席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之基本原则，而在方式上略予改变，不复再经政治协商，而以政协决议付诸实施。”

不难看出，这所谓实施政协决议的新决策，不过是由二中全会以来推翻政协会议阴谋的一新步骤。照这办法就是由国民党发表一个扩大政府的名单，指定一些其他党派的人来做陪客，至于你们



来不来,那是你们的事。假如不来,那就证明这是“自当施以手术加以割治”的“盲肠”了。——很显然的,照这样做法,绝不是为了结束一党专政而改组政府,却是根本上推翻了政协会议的改组政府的决议;绝不是为了消灭内战,却是为了在政治解决名义下加紧发动内战。

由这些官报的议论或许可以让我们来推测到蒋主席的这一个传说要发表的文告的内容。无怪乎20日路透社南京电说:“一般预料,此项宣言即使发表,亦不致减轻目前之严重局势。”

然而到了23日,这个预定的文告,据说“现已不想发表”(《联合日报》)。这是什么原故呢?

我们来看看各方面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战场上的情况。

内战仍在各地区蔓延。规模最大的还是在苏北。但我们只能看到极纷歧零乱的战报。譬如19日已有政府军“收复如皋”的战讯,23日却又“收复”了一次。大致看起来,如皋、泰兴一带战况极为激烈。中共方面说,在这一带有政府军1.2万人缴械,第49军军长王铁汉也在内。政府方面说:在泰兴战役中,“清理战场时掩埋共军两万余”。就苏北的战况言,我们不能不觉得政府的宣传方法实在只足以得到很坏的效果。所发战报既莫衷一是,且不能掩饰主要的战场确是在新四军原驻地区,而又竭力宣传中共军大举进攻;所谓“京沪区受军事威胁”之说连外国记者也不相信,对于外国记者为求了解真相而至战区考察之请求始终力加拒绝。试问,在这种宣传方法下,谁还会看出发动内战的责任究竟是谁?

苏北战争似乎还将大规模地持续下去,正如其他地区之不能停止一样。但是所谓在若干时间内即能灭尽苏北共军之豪语,至少已不能不打折扣了吧?



其次，我们又可看到，所谓“改变方式”的“政治解决”已经遭遇强烈的反响。

假如不把摧残人民自由、制造内战的恶势力消除掉，假如只是请客式地“扩大政府”，假如不重开政协会以公开合理的方式解决政治纠纷，则所谓政治解决就是假的。——这是中共与民盟的见解，也是全国人民的见解。

23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发表声明，庄重地说出了全体中国人民所要说的话。在这声明中，孙夫人指出，国民党由于它目前的错误政策，不能不“担负造成内战的责任”。她指出，实现“联合政府，民权政治与土地政策”，就是三民主义在今日的正确实施。她更明确指出：“联合政府必须立即成立。这个联合政府的产生，必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指派人选，各党派必须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必须由党员选出。”孙夫人更在她的宣言中向美国人民指出“美国反动者与中国反动者为伍，相互鼓励的事实”。

在这庄严的宣言前面，一切假装“政治解决”的阴谋不能不黯然失色！

华盛顿的苦闷

华盛顿已经严重地感到马歇尔在华使命有失败的危险了。新华社华盛顿20日电：“各方消息传来，证明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内部和平之伟大努力，正趋失败中”。华盛顿不能不为此而苦闷。

莫斯科方面对于美国在华政策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也不能不使华盛顿感到震动。22日莫斯科电台广播《新时代》的论文，鲜明地揭露“美国在华不但建立经济与政治根据地，更拟造成战略根据地，以便美国得以支配远东”，并且在苏联的舆论中第一次严重地



宣布“苏联的意见认为：这是切实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对华各项决议的时候了，因为这里面会有圆满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及保障远东恒久和平之最低限度先决条件”。

美国当前的苦闷可由联合社华盛顿 21 日的长电中看出：一方面是希望由大量的物资与军火的援助来“坚强中国，使成为亚洲方面一种力量”（不待解释其意就是对付苏联的一种力量），一方面又感到“国军配备如不如此充分，则对美国吁请与共产党合作或更能听从”。因此“华盛顿官方大致系在绝望情绪中始考虑禁止军火军器运华问题”。这种苦闷又可以这样来说明，假如照现在中国这情形，自无从拒绝苏联关于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责问，假如彻底换一套做法，又担心会不会给苏联造机会。

很显然的，美国的苦闷不过是由它自己的矛盾的政策所造成。只有坚决走一条路，为了中国国内的和平民主，为了远东国际关系的和平协调，那么一切困难就可解决。

孙夫人的谈话在国内，官方虽然装出是不问不闻，但在美国却已引起政府方面的反响。国务院发言人为了答复孙夫人的宣言，特别声明：“美国对华政策是要团结各党各派组成一联合政府”。很好，那么我们更有权利要求美国注意孙夫人的全篇宣言的结语：“我要求中国国共两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领袖立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我要求我们的美国朋友以停止一切军火供应，只允许把援助给予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促成这一行动”。华盛顿的苦闷可以由此而解除，中国国内局势也只有有好战将军和行凶特务手中的武器被剥夺时，才能有澄清的可能。

最初刊载于 1946 年 7 月 27 日《民主周刊》（上海）
第 41 期，署名念青。



面对着内战与分裂的深渊

悬崖的边上

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了：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在牯岭逗留好多天后，于8月6日带到南京去和中共商议的是蒋主席所提出的五个条件。哪五个条件呢？

一、中共须即退出苏北、皖北。

二、热河境内，中共须退出承德以南地区（包括承德在内）。

三、中共须退出胶济路全线。

四、中共须退出本年6月7日以后在山东、山西所占领各地。

五、东北境内，中共须撤退到兴江、龙江二省及嫩江省之一部分地区内，哈尔滨市须撤出。

这五项条件其实就是在6月19日政府方面所提的方案。7月以来，政府方面的军事行动可说正是在谋以武力达到这些条件，所以有胶济路之战，有苏北之战，有热河之战。中共方面拒绝这五项条件。他们认为承认这些条件无异于订“城下之盟”，他们仍坚持先行无条件停战再谈别的问题。

谈判不成，战停不下来。10日下午4时，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名发表了震动一时的公告。这公告的文字极简单，其中说明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指出他们作为调解人的任务是“尽各种可能方法以谋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长的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的政府之初步步骤”。

第二，指出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冲突，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在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虑”。

第三，指出“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所以不能发出，是因为有些具体问题在国共间不能获一致协议。“在此等未解决问题中，有关军队之重新布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布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以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布署更难解决”。

在这联合公告中有一点是暧昧不明的，就是它既未表示调解工作就此无望而结束，也未表示还要继续努力。因此对这联合公告的作用何在，各方纷纷猜测。虽然公告发表后，马、司徒仍继续在京与国共双方代表接谈，司徒于14日赴北平，马歇尔且有四上庐山之说。但是同时产生了许多传说，有说马歇尔已定于下月15日返美，有说北平的事军调处执行部即将因美方人员撤回而结束，这些也就是说：美国将退出在国共间任调解人的地位而置身事外了。

美国代理国务卿13日表示马歇尔元帅“尚无返美之意向”。我们或许可以由此相信他至少暂时还不回国。但形势正在急激变化中，无论美国，无论中国，都是——正如《华盛顿邮报》12日的漫画中所画的——站在危险的悬崖的边上。

为什么失败

可以说，联合公告是马氏的自认失败，但其实他并不是不曾成



功过的。马歇尔氏于去年12月16日来华。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协议支持着他的工作。杜鲁门声明中说：“美国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任何内战的发展。”莫斯科协议中重申三国不干涉中国内战之旨，并确定美苏二国在中国驻军须于适当时候撤退。二者又都表示了中国须确立和平民主以免危及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安定。从今年1月到2月底，马歇尔曾得到很大成功。在他努力下，成立了停战协定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使内战得以渐止，而政协能够开成。最后，在他3月12日返美前，又签订了整军方案。然而到了4月17日，他再到中国时，情况已全非了。过去的成功已不能继续，至今四个月间更不能得到什么新的成功。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

我们看到，在三四月间，马氏返国期间，苏联已履约从东北撤兵。而中国的内战却跟着就引进了东北。中国的反动派以东北内战来破坏1月10日的全国停战协定，而美国的反动派也借东北问题，以防苏为理由而进一步干预中国内战。在美国反动派策动下，今年5月以后，美国在华北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不断加强实力，对华的军事援助大形增加，再加上继续租借物资与中国的法案，成立军事顾问团的法案等等，都在精神上与实际上增强了中国反动派的勇气和力量。于是政协会议被毁弃，整军方案被搁置，停战协定被玩弄。马歇尔的任务本来是以杜鲁门声明与莫斯科协议为基础，来克制破坏中国和平与远东和平的因素，但逆浪狂起，他被颠簸在这中间了。我们可以引美国众议员柏德森氏之言为佐证，他说：

本人深信，中国及美国国内之恶势力曾不知羞耻地利用马使以随其私欲，结果中国之民主、美国之安全及世界和平均为其牺牲。中国大局每发生一次危机，马使即尽其任务而要求双方休战。政府方面一再同意休战，但系利用休战，调动或增



加其势力，以便重行进攻共产党及其他反对政府之民主分子，美国方面亦有一部分人利用停战期间，增加并改进其援助中国政府物资之数量及品质。以故一俟和平期间为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之合作者充分利用后，中国军队即发动更猛烈而惨酷之内战。这就是马使失败之悲剧。

到了联合公告中，马氏承认不能停战的原因是在“军队之重新部署”及“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就可表明4个月前马氏调解中国和平的成就已全被摧毁。倘以那些成就为基础，则这些枝节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或竟不至产生。因为按照1月10日的协定，停战是无条件的，不应有先决条件；按照整军方案的原则和办法，军队部署也不会发生大困难，且决不应牵涉及地方政府问题；而按照政协的和平建国纲领，则地方政府也应用民主方式来解决，断不应和驻军问题连在一起。

由此可见，阻碍和平的症结，表面上虽似乎是联合公告中所指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却是在于美国的反动势力与中国的反动势力相结合，推翻了杜鲁门声明，也推翻了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也就是推翻了足以使马氏成功的基础。

马氏既然失败了，怎么办呢？美国舆论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召回马使，撤退在华美军，断绝一切在华军事及经济援助”。他们以为，马氏自认失败回国，才是完成任务的办法。但其实假如做到撤退美军，断绝援助，那就是具体执行了去年12月的杜鲁门声明和莫斯科协议，一切反动派的阴谋就被打消，于是马歇尔在华就能够顺利地继续今年3月以前的努力而得到成功了。反之，假如在华美军不撤，援华物资也仍源源不断，那么在这情形下，马氏离华正是一切反动势力所鼓掌欢迎、求之不得的事。在现状下，马氏假如回国，其结果就可能是如此。真是这样，美国并不能因马氏回国即置



身局外，避开责任，是很明显的。

事实上，美国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中国内战，这责任是逃不了的。目前美国的问题就是：是继续错误政策而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国内战，以至负起破坏远东国际和平的责任呢？还是恢复杜鲁门声明与莫斯科协议的立场，对于中国内争真正采中立调解的态度而纠正一切错误？前者使马歇尔失败，后者可以使他成功。这就是美国所面对着的悬崖。

走向分裂

7月7日据说蒋主席本拟发文告而未发，这回正在马、司联合公告之后，于8月14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为了要明白政府当局对于当前紧急局势的态度，我们自然最注意文告中所举出的“今后的方针”。方针共有六项：第一是说“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必定如期召开”。第二是说“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所有决议必衷诚遵守，尽力推行”。第三是说“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务求从速实现”。对于这3点，民主同盟的罗隆基氏当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虽谓政府愿遵守政协会之协议，而前3项本身已属违犯政协会之任务，政协会并不同意于11月12日举行国民大会之日期。就第三项而论，政府势将不依代表各党之政协会而自行改组。”

这三项方针，一言以贯之，还是所谓“自动实施政协决议”。单独改组政府与单独召开国大之议，已造成了目前内政上的僵局，形成政协决议实施的障碍。现在障碍未除，僵局未破，反而更巩固了。

更重要的其实还有：第四是关于“停止冲突”，第五是关于“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纷争”。由蒋主席所宣布的政府方针，可以看出，



停止冲突是有先决条件的(就是要中共退出若干地区),和平解决也是有先决条件的(就是先做到军队国家化)。

因此我们纵然不像报载有些观察家认为,全面内战已在这个文件中被批准,但也不能不同意司徒雷登大使所说:“蒋主席文告中,并无足以清除阻碍国共间取得解决之困难者。”

中国就是这样被推向一个可怕的悬崖,在这悬崖下是全面的内战,是全面的分裂。

事实上,内战在全国各处仍在激烈进行。尤以陇海路、正太路为最。杜聿明将军于本月8日出发至抚顺、本溪湖、长春各军事要地阅兵,使人预感到东北方面战事终将不免再起。

何以说分裂?在所谓单独执行政协决议的策略下,据说将于下月中旬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然后再召开国民参政会,然后接上去就是11月的国民大会。为了避免“单独执行”之讥,又有集全国“名流”开庐山会议之说。其实不论重开国民参政会也好,召开庐山会议也好,都不过是为了抵制政协会议的作用。政协会议何以要抵制呢?它是比较最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对比,所以它能够团结各方面而产生了那五大重要协议。抵制了团结,所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如上所述的程序,假如一步步做下去,那正是一步步走向政治的分裂。

因此,眼前正是一个最紧的决定命运的时机。

最初刊载于1946年8月17日《民主周刊》
第44期,署名念青。



五人会议是如何产生的

假如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使“非正式的五人会谈”流产，那么，当本文与读者见面时，大概正是它刚刚开幕，而尚未见分晓之时。

所谓“非正式的五人会谈”是由政府代表 2 人、共产党代表 2 人，外加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组成。其任务应由商讨改组政府问题而求得停战。

假如这非正式的五人会谈竟一帆风顺而得到完美的结果，那就是：在五人会谈中获得改组政府的协议，随即由国共双方下令全面停战，实现和平，然后再经过政协综合小组根据政协决议而实行政府改组。——那么，一年来，老百姓苦心焦虑，求之不得的和平局面就此出现了。五人会谈便成了起死回生的一剂灵药。

但是任何一个最乐观的观察家——除非他故意闭着眼睛说话——也不敢相信五人会谈真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根据五人会谈在酝酿和开幕前的期间各方面情况来判断，我们不能不说，最大的可能是这谈判仍旧重蹈今年 6 月间休战 23 天的谈判和 7 月间由国方 3 人与共方 2 人组成的五人会议的覆辙。而且又必须指出，前二次失败，大家都已看到，其结果就是内战的扩大展开，而这一次谈判假如再失败，其结果将带有更加严重的性质了。

因此在五人会谈尚未开始时，一般人所集中注意的问题已不是这次谈判能否成功，而是：这次谈判假如失败，则其后果将如何？



但是，我们要展望这次五人会谈的后果，仍必须先考察五人会谈是如何产生的，并且要看出，五人会谈假如失败，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这次非正式的五人会谈是由美国方面所一手造成的。这样说法，并不为过分。因为先求解决改组政府问题的计划是马歇尔第五次上庐山（8月23日至27日）的产物，司徒雷登则直接负着促成这种性质的五人会谈的任务。

为什么美方在这时提出这个建议呢？

我们应该从马、司联合公告说起。

8月10日发表的马、司联合公告，文字简单，内容可说是很含糊的。表面上虽似乎是承认调处失败，却又没有明白承认失败，预示下一步的做法。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联合公告其实是属于试探性的。公告广泛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在美国的舆论中主张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华援助乃至撤退马歇尔的呼声大起；而中国人民也用坚定的态度答复了这公告：既然美国自认调处失败，那么这失败的责任是美国自己要负担的，因为造成中国内战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不符合于莫斯科协议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不能逃避责任，必须有所交待。这种反应恐怕并不是美国政府当局乃至马、司本人所预料到的，也是使他们感到头痛的。在这情形下，假如撤退马歇尔而驻华美军不动，援华办法依旧，那么美国作为中国内战的调解人的资格完全丧失，也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显出了美国参与中国内战，帮助一个集团而反对另一个集团的真面目，这是美国当局所不愿意做的。因为纵然别的不管，只就即将到来的11月的议员选举来说，这样一做，美国现政府当局就将在选举中自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反之，若认真照中美民间舆论来做，撤军停援，并且把中国内战让渡到国际间来处理，那虽然是有效的办法，



却更不是美国当局所愿意的。——因此，在联合公告发表后，美国跌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

拿马、司二位在中国的行动来看，我们现在也可以回头看到，在8月10日以后，大约有10天之久，他们是在决策不定的情况下。一时虽盛传马歇尔即将回美，但他却又上了庐山。司徒雷登也忙里偷闲，去了一次北平。到了8月20日，马、司两人分途同时回京，一个新的努力开始了。这时可以看出，美国当局的方针已经确定下来了。

美国当局所决定的新的方针是什么呢？

并没有什么新奇，还是旧戏法的续演。

一方面还是不放弃作为中国内战调解人的地位。于是马、司两位又在南京与国共双方作频繁地接触。23日，马歇尔带着他的“新建议”第五次上了庐山。

但一方面也仍不放弃用各种办法来帮助中国内战的政策。不但不撤兵，不停援，而且还要加强。美国的麦凯比与柏特森等正在这时到了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宋子文进行秘密谈判，商讨把太平洋上各岛屿的美军剩余物资转让给中国的问题。到了8月，官方宣布谈判的结果是有8亿美元的剩余物资让给了中国，“作为划抵美国在中国积欠之国币费用”。实际情形如何，尚待继续探讨，但无论如何，一宗巨大的作为战争资本的物资是送到了中国内战的战场上。其意义为火上加油是不待说的。

一方面继续调停，一方面又鼓煽战争，这很显然的，不过是马、司联合公告发表以前的美国对华的实际政策继续发展。

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今年3月底东北停战协定成立后，美方虽是促成这协定的人，但他一方面签订这协定，一方面却仍继续帮助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向东北，于是中国的好战派就有恃无



恐地在东北发动了战事，以至完全破坏了1月10日的全国停战协定。到了6月里，休战商谈期间，马歇尔虽然看起来是积极参加了这商谈，但另一方面，杜鲁门却在6月14日在国会宣布美国将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中国，而且国会中又提出延长对华租借法案10年，并且通过了以200余艘船舰让给中国的法案。这样一来，6月的谈判自然失败。得到了美国的实际援助的中国好战派自然趾高气扬地不把谈判当一回事，休战期满后，立刻又在各地发动了内战。现在，马、司既然开始了一次新的调解，而恰恰就赶在这时候，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而未确定的剩余物资问题迅速地谈妥公布了，实在是对于“调处”的莫大的讽刺。早已有漫画家尖锐地指出，美国这个自命为救火员的好心人是在用汽油浇着中国内战的火场。在五人会议前来一个让与剩余物资的协议，还有什么事实比这更分明地显出这“好心人”的手脚呢？

6个月前的事我们不去重谈，3个月前的事也且搁下不提，但是已经有了这一次次失败经验后，美国居然还是这样做，谁也不能为它辩护，说它不是明知故犯了。假如美国是真心接受了过去的失败经验，认真从事调解，无论如何，不该是这样做法。

正因为美国这次在马、司联合公告以后重新进行调解工作，是建筑在这样的政策基础上，所以它才提议从改组政府的问题上谈起。——因为精神依旧，所以才在方式上改变。假如美国接受中美民间舆论的意见，在调解的精神上来一个大改变，一面撤兵停援，一面进行调解，那么在调解的方式上，其实也无须乎改变，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三人军事小组加上北平调处执行部就足够可以负起完全停止中国内战的任务，然后再由政协会议从改组政府起执行全部的政协决议。那倒是顺理成章。现在变了个花样，来一个非正式的五人会议，倒过来先商量改组政府问题，这怎能不令人觉得，



不过是玩玩花样而已。

假如方式变一下，仍能得到和平的结果，那自然还是中国人民所赞同，也愿意试一下的。但是美国的“加油”政策变本加厉，这已够使人对于停战前途毫无信心了。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纵然在非正式的五人会议上取得协议，但是如果战仍不停，则有了协议也还是一场空。谁也不能设想，在内战扩大进行时，居然可以成立起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在内的政府，共坐一堂以商定国家大计。

国府委员会如何改组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太难解决的。以国共双方日来表示的态度来看，将成为争执的是在否决权一点上。但这一点还不是不能取得协议的，真正成为五人会谈的致命伤的实在还是在改组政府协议成立后是否即能停战的问题。彭学沛氏在8月28日谈话中仍只把停战的责任完全加在中共身上。预定参加五人会谈的政府代表吴铁城、张厉生二氏30日在牯岭发表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有这样一段回答：

问：如有人以超出改组国府委员会范围以外之问题提交五人商谈，将如何处理？

答：相信大家都会考虑议程之范围。

这一个问题，显然是表示，在政府方面意思，五人会谈是只谈改组国府委员会问题，绝不愿牵涉到停战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的，六七月间停战谈判屡屡失败的症结就在于政府方面提出中共须退出若干地区的五条要求。这五条是否撤销，在五人会议前，政府并无明确表示，因此战停不下来的前途是可想而见的。

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以为马歇尔、司徒雷登竟然智不及此，看不出五人会议并不能一帆风顺地由改组政府的商谈而达到停战，那么更是太低估这两位饱有经验的老人了。我们对美国方面之所以再度作这番努力之唯一解释，只能说是因为美国仍坚持支持中



国内战的一方面的基本政策,但又断不愿意放弃调人的地位,因为从对内对外的关系上说,它都非站在这调人地位上不可。五人会谈对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仍可用这来证明它是个调人,而不是帮凶。

美国这样做法恰恰和中国的好战反动派的意愿相符,因为后者也是坚持内战的基本方针,但不敢公然自居于发动内战者的地位,仍想向世界和国内人民表示,它是要和平的。

五人会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因此它假如能开成,其结果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是由这种情况,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无论五人会谈能否开成,这总是美国最后一次做中国内战的调人的机会了。除非美国根本改变其政策,中国的人民、美国的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将从这里更进一步看出,美国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做中国内战的调人的工作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假如美国不改变其政策,它是再没有资格来做中国的调人了。

最初刊载于1946年9月5日《文萃》(上海)
第46期,署名公孙求之。



究竟是什么

战争？和平？

由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建议，国共间又酝酿着一次新的谈判。这回谈判的方式有异于过去的各次：是由国民党方面两代表（吴铁城、张厉生）及共产党方面两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加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而形成所谓“非正式的五人小组”。这回预定谈判的内容也有异于过去的各次。过去都是先谈停战问题再及其他，但六七月间的停战谈判已因政府方面提出五个条件而被堵塞了。这回是先不谈停战，首谈政府改组的问题。

由这情形，便可看出，这个五人小组可说是有着先天的缺点的。既谈改组政府，就是谈内政问题，解决内政问题本该运用政协会议，现在却让外国人参加，已很不妥。而且在战火万分炽烈的时候，先不忙救火，却从容谈政府问题，更不能不说是滑稽。

但假如五人小组中能很快地谈好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办法，立刻就宣布停战，那自然也还是值得欢迎的。但是看一看冷酷的事实，谁也不能保持这样的乐观的信心。

五人会议先谈改组政府的办法，是马歇尔8月23日第五次上庐山时建议的。2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京招待记者，表示：

先谈改组政府以促成停战亦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需弄清



两个问题。即：一、政府是否愿在改组政府问题谈妥后，立即下令停战？二、政府是否愿在谈改组问题时，放弃上述五项条件不谈？（按：即指要中共退出苏北、皖北、胶济线，承德与承德以南，东北退至黑龙江、兴安与嫩江北半省及延吉，山东、山西退出6月7日后中共占领地区）回答如是肯定的，则我们愿意先谈改组政府问题。（《群众周刊》）

作为对周恩来的答复，政府方面负责人士先后发表了好一些谈话。28日彭学沛说：“中共要求立即颁布停战命令，并不合理。”（法国新闻社南京电）29日吴鼎昌说：“政府对先行改组政府再谈一切问题表示同意，惟中共提出两条件则认为不能解决，换言之，即政府无法接受此二条件也。”（南京《人报》）30日吴铁城、张厉生谈话中也强调说明，五人会谈的议程不能“超出改组国府委员会范围以外”。

由此可见，五人会议虽是为了先谈改组政府问题，但是在会前双方的争执的症结并不是在政府问题上，而仍旧是在停战问题上。假如停战并无保证，则改组政府问题无论谈得如何热闹，结果也还是一场空。正是因此，五人会议直到记者执笔时（9月4日）仍无开幕的确期，而且大有开不成的可能。新闻记者们已严重地预感到会议纵然开成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至预感到有“在第一日会议后即告破裂”的危险。（联合社南京2日电）

再看一看实际战场上的情形，更使人不能对于五人会议抱有什么希望。

拿一周来的战况来看。由于中共军在陇海路大规模出击，牵制了鲁南苏北的战事，虽然政府军从北面进攻苏北，又占了宿迁、睢宁，但南线进攻在邵伯、泰兴、如皋方面却都失利甚大。据中共宣布，在上月24日到27日，这方面政府军有2.3万人的损失。“失之



东隅，收之桑榆”，于是政府军在热河方面猛攻，由朝阳往西推进的政府军于29日入驻承德。中共方面也不甘示弱，本月2日正式宣布进攻大同。同时在晋南，中共军也有进展，同蒲线的主要部分似已为中共军控制。

由这种战况看起来，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弃用军事力量求实现其五条要求；另一方面中共的实际军力显然超出其对手的估计，也不甘订立城下之盟。你打这里，我打那边，你占这地，我取那城，兵连祸结，何尝能停得下来？《文汇报》8月30日牯岭专电说：“周恩来所提请政府保证之两点，据此间某高级官员之推断，似仍多困难，因即使中共诚意参加政府改组，战事亦将延续，迄共军退出苏北、热察、胶东后方可停止”。这样说来，战事就是决不能停止的了，或者说，停战问题只能由战争本身来解决了。

在这情形下，五人会议即使开成，最大的可能却是以这为幌子来掩饰战争的进行。

调解？哄骗？

为了进行政治谈判，马歇尔第五次上庐山（8月23日）。又据说为了使五人会议能够开成，马歇尔又六上庐山（8月30日）。而且又传他还要七上庐山。有人以六出祁山来比喻六上庐山的失败，假如还有七上庐山，那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七擒七纵”了。美国在这半年多来，已多次地表现出它似乎真是在用力争取中国的和平，但每一次争取后，立即又自行放纵了中国内战的进行。我们只要想到马歇尔曾经在今年3月促成东北停战协议，但随即他又帮助陆续运了3个军到东北去，使这协议成为废纸，这就足够说明擒与纵的手法了。现在正在五人会议酝酿期间，美国与中国关于剩余



物资的让渡的谈判又宣告完成。按照8月31日的公布,这谈判的结果是有共计“原来成本”值8.25亿美元的剩余物资,外加“专供租船偿付技术人员及购买零件之用”的3000万美元交给中国。我们不知道所谓“原来成本”是如何计算法的,但无论如何,这项军用的剩余物资数量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事先各方推测,这项物资全部运来后足供两年作战之用殆非过甚其词。由此可以见得,假如建议五人会谈是一擒,那么这剩余物资的一纵已足够抵消这一擒而有余了。

8月10日马、司联合公告发表后,中美民间舆论绝大部分都认为马、司调解任务如果真想成功,就非要立即实行撤兵和停止援助不可。作为对于人民舆论的答复,只提出这样性质的五人会议,却不从如何坚决促成停战着想,未免是离题太远了。已经有了一年来的经验,人虽至愚也不会看不出来这样的调解并不能得到什么结果。马、司两位难道会看不出来么?因此人们渐渐地相信,美方这种无效的调解继续进行只不过是为了使人相信,它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放纵中国内战。那么,所谓调解,在实际上已渐渐只剩下哄骗的意义,这恐怕并不能算是过分的判断吧?

很显明的,在这五人会议将开未开,一开起来就有破裂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中国正在面临着最严重的局势。政府方面的洪兰友于9月3日表示,“五人会议不问结果如何,政府对于召集国民大会不致再度延期”。中共方面的王炳南也在上月28日表示:“若政府在战事未停前召开国民大会,摒弃中共,吾人已准备召集所有边区政府会议作为答复。”联合社记者甚至从这一谈话推论到“政府若坚持于和平谈判及改组政府等主要问题解决前召开国民大会,则延安将考虑另建中央政府”。不管今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何,总之,这都可看出当前局势实已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危



机突入。

和平与战争，必须有所选择了，打打谈谈的老局面恐怕难以再长此继续下去了，擒擒纵纵的手法怕也再行不通了。到底是真心调解，还是故意哄骗，不仅中国人民要问个清楚，就是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也一定非追问个明白不可了。

最初刊载于1946年9月7日《民主周刊》(上海)
第47期，署名念青。



五人小组流产以后

“调解”的失败

由于政府方面坚持不愿意作停战的保证，所谓“非正式的五人小组”成了一场空谈。马歇尔七登匡庐，在他上山（6日）下山（10日）之间，战鼓在全国是越敲越紧了。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在4日发表谈话，宣布大同、承德、张家口为一个战场，并认为政府要求中共军退出若干地区并非条件，所以非做到不可。这使人预感到不但战事不能停，反而更要扩大延长。在这情形下，五人会议到底开不开，实已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五人会议就此开不成，或开起来而仍失败，则局势将如何发展？

这问题不仅是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政治势力面前的问题，而且是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

合众社9日电：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及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定本月22日到28日为“退出中国周”。这代表美国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这意见就是说：既然美国已不能尽调人之责，那就应坚决从中国退出。所谓“退出中国”至少要包含撤销对华物资援助和撤退驻华美军两件事。

美国人民之所以如此主张，自然是他们已经看出，美国政府目前在中国的政策是以调解为名义，来掩护助长中国内战的实质。既



然名义上的调解已为事实所揭穿，那么再继续留在中国，是除了制造战争，破坏世界和平外，别无其他意义了。

全权执行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马、司 2 人中，马歇尔元帅很谨慎地不说话，但他七上庐山时召集了在华美军中的 4 个将领（驻华美军总司令吉伦上将，美国顾问团团团长鲁克斯中将，顾问团海军组组长莫雷少将，空军组组长麦克尼尔少将），足见严重的情势正在被考虑中。司徒雷登大使在这期间却透露了几句话。8 月 31 日司徒在沪答复记者说：“美军驻华任务原为遣送日寇，现暂时为守卫铁路。”9 月 5 日司徒在南京为剩余物资之转让作辩护，说：“此项物资售予中国系本善意，志在嘉惠中国，并非偏于一党；况此项剩余物资若不转让中国，亦将归于无用”。

由司徒的谈话可以看出，美政府还是不会采取“退出中国”的政策。再看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最近谈话，更可明白。9 月 3 日，柯克上将在青岛发表谈话说：“美不愿与中国内战发生关系，但要看内战发展之情形如何而定。第七舰队总部可能常驻青岛。”9 日，他又在北平发表谈话：“美国驻华日期须视将来需要而定。沪青为商埠，恐须久留。”“美国海军陆战队之责，其唯一任务为协助中国遣送日本战俘及树立和平状态。”

美国陆军部长柏特森本月 3 日于离中国返美京途中在旧金山说：“我想美军驻华甚属正当。”但他没有说出为什么是正当的理由。其“理由”是由司徒大使和柯克上将说出来的，但这“理由”倘不是用帝国主义的逻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司徒大使究竟是教育家出身，所以他还小心地说，美军目前在华不过是“暂时”给中国“守卫铁路”。柯克上将是武人，说得就更加露骨，他竟拿“树立和平状态”为美军遥遥无期地留在中国的“理由”，并且公然承认美军有“与中国内战发生关系”之可能。事实上，美军早已与中国内战发生



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成为促进内战的最大因素,按照柯克上将的逻辑,美军就可永远在中国各地留驻下去了,岂独沪、青二“商埠”而已;而司徒大使的“暂时”也自然要无限期地延长了。

我们不能不严重看出,美国在华的负责官员发表这类谈话实在是对于中国人民、中国民族的尊严的莫大侮辱。由这里也就使得我们对于美国调处工作不能不表示绝望。事实上,也很明白,正是由于美方负责人士一再从言论和实际上给中国好战分子以鼓励,所以五人会议才得不到停战的保证而搁浅,而作为调人的美国对于求取停战的保证显然也并没有尽什么力。五人会议之所以失败,原因就是在这里。

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政策至今还蒙着一层调处的假面具,当这假面具终于揭开,再也戴不上的时候,是走那些好战将军们的路,不惜公开“与中国内战发生关系”呢,还是走美国人民所主张的路,断然“退出中国”呢?这问题是一定会更加严重地提出来的。

陇海路与长城线

五人会议既开不成,国共间的和平商谈事实上已可说不存在了。在战不停止的情形下,本来所谓商谈就只具有为战争掩护的作用。舍停战问题不顾,只谈政治问题,那就更明白地只是掩护战争的进行。五人会议搁浅,不过表示用纸是再也包不住战火的蔓延了。

两个主要的战场吸引着举世的注意。

一个战场是在陇海路以北,徐州与郑州之间。这一战场之所以重要,因为这里是有关苏皖鲁豫四省形势的战略地带。中共方面刘伯承率大军在这一带驻守,以鲁西南的菏泽为中心,进可以策应苏



皖，退足以控制平汉、津浦之间的要冲。政府军月来在苏北的进攻，无可讳言的，是处于不利的形势，对鲁南的进攻，也只在本月2日才攻下了台儿庄一地，所以在上个月下旬即不断增兵陇海路（共达35个师，兵力在30万人以上），企图一鼓进歼刘伯承总部，然后再来收拾苏鲁。这一战役范围之广与战况之激烈是可想而见的。西路政府军由长垣、考城、兰封进攻尤猛，已占曹县，更向北进直取菏泽。就在这一带展开了决战。据延安电讯，这一战的初步结果是政府军的第3师的第3旅及第20旅、第47师的第117旅、第41师的第22旅共4旅覆没，第3师师长赵锡田及师部人员全被俘。战事仍在继续着。

另一个主要战场是在冀察热的沿长城线上。政府军于上月28日拿下承德，用意自然是要插入中共军由西北通东北的走廊。但仅仅拿下承德不能达到这目的，而且中共军退出承德并没有损失，所以战事势必继续扩大。本月3日热境政府军有停止西进之说，显然为了避免交通线拉长后的后顾之忧，因此首先向南攻取长城各口，以与秦皇岛及北平方面相配合而会攻冀东的共军。喜峰口、冷口已在政府军掌握下，但古北口尚未证实。政府军取得冷口后，热境共军蹶其后又取下冷口以北的都山，足见这方面战线极复杂。赤峰情况也不易判明。日来报纸虽盛传张家口之争夺战，但事实上，傅作义部由集宁南下，主要作用尚在谋救大同之围；孙连仲部在青龙桥方面尚未开始动作，所以张垣之战大规模展开恐怕还是下一步，在这以前，先要演一场冀东的争夺战。冀东地带拱卫平津，锁带热河与东北，所以驻华美军特别选了这个地方住下，它所自动负起的“守卫铁路”的“义务”，也就是指这一段的北宁路。政府军于取得承德后，就在冀东大量增加，全部兵力在10万以上，从本月5日起冀东大战已揭开。这在政府军方面，自然是为了作进取察热的张本。



由这两个方面的战事都可看出，内战形势是在继续向着扩大延长而发展。这是任何诡辩所不能粉饰的。

为了“反苏”？

中国的内战这样严重地发展，势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及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发动“退出中国周”，正是因为他们已看出，美国退出中国以阻止中国内战，就是促进了世界和平。

反之，也有另一部分人从另一歪曲的角度来看这问题。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于本月8日致函杜鲁门总统，主张说，解决中国问题就是要“美国政府坚持苏联放弃其在政治上对中国领土之控制权”。美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考察团在北平发表谈话，也公然把中国问题扯在美苏关系中，要求美国对苏联采“更坚决的立场”。这些美国好战军人的应声虫的呐喊值得我们警惕。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是要以反苏的名义来加强掌握中国。由此可见，驻军中国的各种“理由”说到理屈词穷时，一定还有最后一着，就是说：我来是为了“防苏”。我们应该记得，“九一八”后日本武装进入中国就是用这理由的。照这做法，就是使中国的内战继续扩大，使中国成为军事占领下的殖民地，并且把中国推向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做牺牲品。

德日法西斯曾经在反苏的名义下作破坏世界和平的活动，结果苏联没有反掉，全世界却扰攘纷乱了十多年，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正在巴黎开会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突于10日离法飞回国内，自然是为了面陈国际的“行情”，以供决策的参考。有一点我们必须警觉，中国决没有理由去供别人充反苏的基地。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



是符合于中国民族利益的。假如一心投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那便是葬送中国的民族利益于万劫不复之地。

最初刊载于1946年9月14日《民主周刊》(上海)第48期,署名念青。



由这两个方面的战事都可看出，内战形势是在继续向着扩大延长而发展。这是任何诡辩所不能粉饰的。

为了“反苏”？

中国的内战这样严重地发展，势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及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发动“退出中国周”，正是因为他们已看出，美国退出中国以阻止中国内战，就是促进了世界和平。

反之，也有另一部分人从另一歪曲的角度来看这问题。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于本月8日致函杜鲁门总统，主张说，解决中国问题就是要“美国政府坚持苏联放弃其在政治上对中国领土之控制权”。美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考察团在北平发表谈话，也公然把中国问题扯在美苏关系中，要求美国对苏联采“更坚决的立场”。这些美国好战军人的应声虫的呐喊值得我们警惕。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是要以反苏的名义来加强掌握中国。由此可见，驻军中国的各种“理由”说到理屈词穷时，一定还有最后一着，就是说：我来是为了“防苏”。我们应该记得，“九一八”后日本武装进入中国就是用这理由的。照这做法，就是使中国的内战继续扩大，使中国成为军事占领下的殖民地，并且把中国推向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做牺牲品。

德日法西斯曾经在反苏的名义下作破坏世界和平的活动，结果苏联没有反掉，全世界却扰攘纷乱了十多年，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正在巴黎开会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突于10日离法飞回国内，自然是为了面陈国际的“行情”，以供决策的参考。有一点我们必须警觉，中国决没有理由去供别人充反苏的基地。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



是符合于中国民族利益的。假如一心投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那便是葬送中国的民族利益于万劫不复之地。

最初刊载于1946年9月14日《民主周刊》(上海)第48期，署名念青。



放眼看战场

今后两个月

所谓非正式的五人小组已正式宣告：尚未出娘胎，已经死了。

是谁杀死了这个胎儿？8.5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物资的转让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这样巨数的剩余物资的转让，只足以鼓励中国好战分子的气焰，这是中外的公正舆论所一致指出的。司徒雷登大使于本月5日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此项物资售予中国系本于善意，志在嘉惠中国，并非偏于一党”（法国新闻社南京5日电）。这是显然与事实不相符的。他又说：“况此项剩余物资若不转让中国，亦将归于无用。”假如此说当真，那么，把一批已是无用废物的物资一转手而用来扩大中国内战，培植美国在华的势力，这真叫做化腐朽为神奇，不愧为美国大老板们的杰作。

有了剩余物资到手，就有了作战的资本。好战分子们觉得不妨开个会来谈谈改组国府委员会的空头文章，却绝不愿意再作一次停战诺言以约束自己。中共提出的两个前提（一、改组政府问题谈妥后即停战；二、政府放弃要中共撤退某某地区等的五项条件），被完全拒绝。据说，邵力子老先生也认为：“我觉得中共的两项前提的要求，并不能算是过分。”（14日《文汇报》南京通讯）但是有人至今



还是抱着“我要怎样就怎样”的想法，别人提出什么要求，那都是“过分”的。

马歇尔七下庐山(9月10日)，带下来的消息是蒋主席拒绝作下停战令之保证。五人小组会开不成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向马、司两位“调人”建议改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带着这个建议，马歇尔于13日下午八上庐山。

军事三人小组会所谈的当然不能是如何打仗，而只能是如何停战。既然停战之保证已被拒绝，我们不能不担心开三人小组会的建议是否会被接受。三人小组在6月里“休战”期间的谈判后即未再集过会。大家都知道，那时是因为政府方面提出了5项条件而致谈判破裂。这五项条件在7月的五人小组会上仍被坚持。8月6日司徒雷登由庐山带下的5条即为此5条之稍加修改。现在在非正式的五人小组酝酿期中，政府方面仍坚持这5条不放，那么三人小组会纵能开成，也还会遇见这所谓“5条”的拦路虎，会议前途仍不容乐观。

除非，除非好战分子已真正有了“偃武修文”的决心和诚意。

一年来的经验已使人们懂得，这种决心和诚意的产生不能依赖于所谓“天良发现”。既然“战”是有物质基础的——那便是美式配备和剩余物资；那么“和”也一定要有事实基础——那就是事实上证明了虽有美式配备和剩余物资也无所用其技。

观察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

多数观察家都相信，今后两个月的战场形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为什么说两个月？因为两个月后有两个大节目。

第一是10月23日的联合国大会。原定9月23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是否要延期的问题，是在巴黎和会中国际间争议的一个问



题。四国外长中，苏联主张延期到11月初旬，最早在10月20日；美国则坚主维持9月23日原议。9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应邀参加外长会议。王世杰当即提议把联合国大会延到11月11日举行。最后在8日到9日的会议席上协定了以10月23日为会期。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中，因为苏联方面已经提出了调查各国在友好国家中驻军的动议，所以至少在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美国在华驻军问题，涉及中国的内战问题。中国内战倘继续维持现状，中国在联合国内势将处于难堪的地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王世杰赞成延期举行。他所建议的日子恰恰是中山先生诞辰的前一天，而中山先生诞辰是政府当局预定要开国民大会的日子，这尤其是值得玩味的。

第二个重要日子自然就是11月12日。人们早已可以看出，在内战不停止的情况下，一定开不成全国团结的国民大会。假如政府当局一意孤行地开一党的国民大会，势必造成全国的大分裂。11月12日究竟开不开国民大会是一个严重的关键。至今政府方面对于“如期召开国大”不曾松过口，但本月12日传出了邵力子辞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之讯。可见比较老成持重人士如邵先生，也不能不感到苦恼，宁愿置身事外以免蒙造成破裂的恶名。

从现在到10月23日是40天，到11月12日是两个月。就政府方面的布置来看，这两个月无论如何，总是紧锣密鼓，大打出手的期间。要在两个月间实现其所希望的目的，那恐怕是政府当局自己也不见得有此把握，其所希望的无非是在这两个月间至少能打出点“苗头”，以便较体面地通过10月23日以后和11月12日的难关，那一定不惜用全力来争取的。

从中共方面说，下列一个消息可以表示它是有着决心和信心来继续进行战争的。



据中共发言人称：政府现动员 170 万兵力，进攻中共解放区，但中共现已消灭政府军 21 旅约 20 万之众。该发言人估计一俟消灭了三分之一约 50 万人时，政府当可停止战争。记者当询以届时中共将取何种态度？彼称决取和平政策。（13 日《文汇报》北平专电）

所谓已消灭的 20 万之众，据中共宣布，是从 7 月中旬到最近的两个月的战果。

我们所可以断言的是，在最近两个月内，战事只有越来越扩大，越激烈，而这两个月的战事对于今后的局势的展开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过去两个月

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两个月的战场形势。

7 月里的战场情势是：（一）6 月 29 日，政府军在鄂豫边区发动对中共军李先念部的围歼；李部突围而出后，7 月初，其主力部分已安然转移到襄河以西，政府军跟踪追击。（二）15 日苏皖长江北岸的战事发动。政府方面人士说，两个月可肃清苏北。但至 7 月底时，虽已在来安至南通一带前进百余里，但只占了如皋、天长数城市，未能再前进。7 月下旬，又由陇海路方面向南发动攻势，以围攻苏北。（三）山东方面，沿胶济线战事激烈进行，至 7 月底政府军已大致完成打通胶济路的目的。但高密要镇至今仍在共军坚守中。（四）山西方面，胡宗南部由陕西开入晋南，7 月 3 日沿同蒲路南段向中条山进攻。至 7 月底时已占领汾河三角洲之间的若干据点。

7 月份的战事主要战场就是这 4 个地区。政府军处于主动进攻方面是很显然的。这四方面攻势包含着很大的计划。东面取胶



济路俾进而肃清山东，取津浦路；西边进入同蒲路，取中条山的战略地带，以求肃清山西，进而争夺河北的平原；南方消灭苏皖鄂的共军，以便下一步集中全力于北方。由此可见，7月攻势显然是全面内战的开始。但这攻势的结果却并不全如意想。李先念部主力三脚两步跨到了陕豫川边境，苏北南线政府军的所得也不足抵其战场上的损失，这都是在国防部参谋处的计划上本来没有的。

一转而至8月。我们看到一方面政府军仍继续7月间的几个攻势，并向鲁南与热河开辟了新的战场。另一方面，中共军则在陇海路、鲁南、晋中、晋北发动了反攻。

8月初，战场重心仍在苏北。长江北岸与陇海东段都是炮火连天。8月10日，中共方面忽然奇兵突出，刘伯承所部大举从太行山南下，出现于陇海路上，一时碭山与兰封间铁路全为控制，开封震动。刘部这一进袭显为分散对苏北、鲁南的进逼，所以突然出击，又突然退回，留下了一部力量在陇海路以南，太康淮阳一带，其主力仍退到陇海路以北去了。于是政府方面立即抽调大军云集陇海路的徐州、郑州之间，达13个军35个师之众。战场重心一时移到了徐州外围及陇海路。从8月21日起政府军发动向鲁南及刘伯承总部所在地菏泽（曹州）进攻。23日起刘部在定陶、东明一带向进攻军作有力的反扑，进攻军中有4个旅覆灭。同时苏北南线也在23日起发生大战，政府军进攻邵伯，中共军则向如皋、海安反击，两处政府军都损丧甚众。

中共另一个发动反攻的方面是在山西。晋南八路军于8月中旬连取灵石、霍县、赵城、洪洞、汾西诸城，控制了介休至临汾之间的同蒲路（约270里）。中共在山西本来是西部以吕梁山为根据地，东部以太行山为根据地，这两部分现在是经过这一段同蒲路而连接起来了。晋北中共军一向占优势，本月中旬又取得怀仁，进迫大



同。

8月20日，政府军向热河发动攻势，于是又出现一个新的大战场。28日中共军自动退出承德，政府军入驻。这样，环绕着华北的大平原，除了东南西三方面外，北边也点起了战火，完成了全面战争的形势。

这就是8月里的形势。

9月还只过了半个月，就上旬的战况来看，可以大致看到今后的发展。

鲁南战事到本月8日大致告一段落。政府军进攻菏泽本有东西两路，现为刘伯承击溃的只是西路；东路进攻虽也因而暂时停顿，大战再起也还是可能的。但鲁西南这一决战的结果对于陇海路以北山东的战场局势具有相当决定性的意义，殆难否认。

入9月以来，报纸上的大标题吸引人注意于“张垣争夺战”。但争夺张家口的大战还有所待。政府军的计划大致是三路进取张垣，一路是孙连仲率所部由北平西北出居庸关，沿平绥路直奔张家口，这路似当为主力；另一路是进据热河南部的第93军、新6军、1军等部，由承德、隆化继续西进以进入察哈尔境；再一路是绥西的傅作义由平绥路西段越集宁、丰镇而进取张垣。这三路中至今有动作者还只是西边这一路。但是集宁、丰镇为中共的贺龙主力所在，傅部进攻，已受挫折。本月11日，在集宁西北傅部主力11团被击溃。假如其他两路不动，单靠傅部这一路进取张家口是断然无所成的。但热河的一路事实上还没有全力西进，这自然是因为承德虽已取得，而热河中共军力未有消耗，倘把交通线更加延长，则危险更大了。最后，孙连仲部最前线至今也还未出居庸关一步，其所以按兵不动也是有苦衷的，因为中共军在冀东还拥有重兵，假如贸然在平绥路上调动大军，则平津难免有后顾之忧。



因此进攻张家口的风声虽紧,但9月上半月华北战事重心实在冀东。政府军在上月底已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于本月初开始进攻。在冀东10余天战事中,政府军可以说很顺利地进入了许多城市,如西路的三河、香河、宝坻,东路的乐亭、昌黎、卢龙等,中共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出这些城市。《大公报》12日北平专电说,“现冀东共军控制之县城仅余平谷一处。惟各地克复时均未经主力决战,以后乡村之争夺仍有一个时期。”13日《文汇报》北平专电说:“冀东战争白热化。中共发言人称:中共可能退出冀东各城,但国军占了城市,并不能解决问题,因广大之面,仍在共军掌握。继称,一俟冀东战事决定后,青龙桥方面国军始可发动攻势。”由这两条专电可以看出,冀东还可能有大战。本月11日起,共军在冀东的东线卢龙、抚宁之间已开始有小规模的反击。14日《新民晚报》北平电说:“自冀东、冀中败退之共军,有集中北平、天津附近地区,以谋策动张家口会战之势。”这条消息更使我们知道冀东形势将愈益吃紧,孙连仲部迟迟不动不是没有理由的。

过去两个月来,全面内战的战场形势大致如此。

察 往 知 来

就过去两个月的战场形势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政府军军力确比6月以前增强了。拿去年10月的内战局势看,政府军仅仅在漳河北岸一战吃了大亏后,即不得不渐渐停止攻势,终至举行停战商谈,签订今年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又在今年5月,虽已取长春,但经鞍山、海城一带受挫,潘朔瑞1师反战后,战事也不能更大展开,乃有6月的休战。现在既已利用停战休战期间,重新整顿实力,充分获取了美国供给之配备,并在美国军



事人员直接帮助下进行了整编,所以7月以来的战事发展就不像从前那样遇挫即稍止,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处发动攻势。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出,政府军的军力确已使用到了极限:在全部陆军91个军256个师206万人的军力中,已把74个军206个师174万人投入前线,这已经是把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拿出来了。所以可说是破釜沉舟的一战。

第二,另一方面,中共军的实力也同时增强了。8月的战场上已可以看到中共军的主动出击和反攻,这是重要的标志。中共军的实力增强不外乎武器与人力两方面。据中共方面自称已消灭政府军20万。20万人的武器,其中包括美式装备,对于这支由游击队起家的军队,不是一件小事。政府方面人士也不否认中共军由国军手中夺得武器的事实。《文汇报》沈阳7日专电记有记者与杜聿明将军的问答如下:

记者问:中共人士称彼等已获得美式装备,现有美式装备之军队4师是否确实?

渠坦白表示:共军获国军之武器,屈指可数者6个营而已。其他零星武器,为数不多,最多总计不过3师。惟该项武器之弹药共军无法获得补充。

在人力方面,中共方面颇自负于能动员人民的力量。中共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虽然使一部分地主流亡在外,但却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爱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点确使中共军在人力补给上不感困难,否则就不易设想,何以中共军在分散于全国各地,交通运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却仍能处处就地抗拒进攻者。

以两军在战场上的较量来看,讲城市的争夺,两个多月来,政府军从共军手里是取得了较多的城市,其中包括承德这样较重要的城市。虽然中共方面在“你拿这里,我就拿那里”的方针下也夺回



若干城市，但一般说来，中共采取的战略还是避开城市中的攻守战，从野战中找机会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据中共宣布，这两个月中，仅在苏北，已消灭对方 6 万人；刘伯承部出击陇海路，消灭对方 1 万余人；最近在鲁西南反击，又消灭 2 万余人，全国各战场总计为 20 万。而政府方面的战报中几乎从未有过歼灭战的记录。最近热河与冀东的战况就完全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方面的战果是取得若干城市，另一方面的战略是避开城市，准备主力决战。苏北南线的战况尤为清楚，政府军的猛力进迫虽逼得中共军后撤，让出如皋、海安等地，然而无法制止中共军在大踏步后退后的大踏步前进。

政府军方面似也看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有些地区采取步步推进，稳扎稳打的办法，以求在占领了点与线以后，渐渐围困住对方，加以消灭。但采这个方针，第一必需足够的兵力，第二必需长久的时间。日本在华北就因这两个条件的缺乏而失败。

要说，有着美式配备的政府军不能进行野战是不合理的。但厌战的情绪一出现在战场上就会成为强烈的传染病，这是极难克服的。自高树勋、潘朔瑞将军后，在战场上采取同样行动的据中共方面通讯社所宣布，已经有郝鹏举、孔从周、曹又参、雷文靖、王海青、洗盛楷、田庆云、金亚、刘光国、梁采林、李霞冲等师旅长及其所部（全部或一部）。这恐怕是政府军进行决战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

到现在为止，苏北、鲁南、山西，都已有过较大规模的战争。虽未足为最后决定性的决战，但已大致确定了各该地区的战场形势。惟一未知数是在北战场上。环绕着张家口的争夺，一个大的决战殆不可免。政府军固然是在厉兵秣马，专待一试；而中共军方面，就其坚决退出承德，退出冀东若干城市来看，可见也是在郑重地准备应接决战。——今后两个月的战场形势大概就要以这一方面的决战



为重心。

东北战场从6月以来还没有大的战事,但一直在冒着烟,随时可能起大火。政府军方面仅因为军力不足(现只有6军在东北)而未敢贸然发动向哈尔滨的进攻,但近传有从关内增调1军到东北的可能。同时据传,东北共军总司令林彪也已于本月上旬下了“防御性的反攻命令”(9日路透社南京电)。近两个月内,与张家口的争夺战相配合,东北战场重新活跃起来,也是可能的。

最初刊载于1946年9月19日《文萃》(上海)
第1年48期,署名公孙求之。



和平商谈走入绝境

“三人”与“五人”

五人会议势已流产，中共代表于马歇尔七下庐山（10日）后，提出开三人会议以单刀直入解决停战问题的主张。13日马歇尔八上庐山见蒋主席。15日周恩来向马帅行馆正式提出书面申请。16日周由京飞沪，这时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也到了上海。据说，周氏将于三人会议召开时始返京，而吴氏到上海的任务是为了征询各党派领袖意见，以谋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

于是三人会议乎？五人会议乎？乃至政协会议乎？——天天在报纸上用大标题字标出，使人目迷五色。

但问题很简单。从人民的立场来看，显然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有漂亮名称的会议，而是要一个真能解除人民痛苦的会议。今日中国人民的最大痛苦是什么？——谁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内战。任何一个会议，假如不能使内战立即结束，对我们有何意义？

三人会议原是从今年年初为实施停战而设立。这本应是常设机关，是商谈停战问题的最合法的机关。这时能够重开，自然再好不过。但是政府和美方调解人既都不愿对于五人会议作停战保证，显见并无停战决心；既无停战决心，如何能开得起三人会议？在6月休战期间三人会议曾开过好多次，结果虽曾在停战、恢复交通，



乃至整军问题上得到了初步协议，但是政府方面忽然提出了防区办法的4条要求（以后又演化为5条），以致谈判破裂，从此后，三人会议就再未开过。现在如若重开，自当从上次已有协议的地方谈起，而不应从造成破裂的地方谈起，那就又牵涉到政府是否放弃五条要求的问题。如不放弃，那就还是谈不拢，还是停不了战。18日马歇尔八下庐山，带回的意见是政府拒绝开三人会议。

虽说马歇尔是13日带着中共新建议而上山去商量，但是其态度却先已确定了。13日联合社南京电说：

闻政府及马歇尔特使鉴于军事三人小组未能保持中国和平，故对中共要求重开三人小组会议颇为冷淡，尤以马使为然，已拒绝接受要求，且托司徒雷登大使向中共说明。

这种态度在司徒雷登14日向《大公报》记者谈话中也表示得很清楚。他说明是：

军事三人小组，以前开过很久的会，没有什么结果。马帅与本人觉得，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的问题只限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改组比较单纯。……但马帅与本人亦并非不赞成军事三人会议之开，所怕的是一时不容易有结果。

这样的表示实在令人非常诧异。马歇尔在中国本来负的是军事调解的任务。其专心一志作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主席期间（今年1月至3月）很完成了些重大的成就，取得中国各党派、中国人民的一致推重，这实在是马帅的殊荣。但现在照理，马帅若想继续调解，就应坚主开三人会议，反之若认三人会议已无能为力，就应承认使命的失败。现在作为调解人的美国人都表示对实施停战的合法机构表示冷淡，反而只有兴趣于参加一个只讨论中国政府改组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岂不是令人十分惊异的事么？

据法国新闻社电，司徒雷登14日晚又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他



日时机一至，停战问题当然将加以讨论，三人军事小组自当重新召开”。这里又包含一个玄机。是说，三人会议开是要开的，不过不是在现在，而是在适宜于停战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所谓时机是指的什么？若我们联系 13 日联合社南京电所传，“据高级人士传出消息，蒋主席无意与中共长期拖战，但拟在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以前，达到牢不可破之军事有利地位”。我们也许可以断定：所谓停战的“时机”，也就是这所谓“达到牢不可破之军事有利”的时候。因此，在达到这样的时候以前继续作战的计划，可说是已经由作为“调解人”的美国的元帅和大使所批准了。

但是在这样的“时机”到来以前，是否就可以明目张胆一切不顾地打呢？政府还不敢担负造成破裂的责任，“调解人”也还不愿丢开调解人的幌子，因此就有必要在这样的时机到来以前，开一个“非正式的五人会议”以空谈政府改组来敷衍日子；也因此五人会议的戏法玩不成的时候，甚至进一步考虑到开政协综合小组会了。

重开政协自然最好不过。但自今年 4 月以后，各方频呼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政府一直置之不理；现在假如战争不能停，开了又有啥用？我们还记得，在 1 月政协会开幕前，各方意见是：必须先停战事，然后才能开政协；如果战不先停，则政协会开幕第一件讨论的事就应该是停战。后来总算先由三人军事会议得到了停战协议，政协才能如期举行。这个程序可说是已经成为一个“法统”。这是和平建国的铁定的道路，违背这个道路，就一定走入绝境。

秋高马肥

因此，在这个会议、那个会议的热闹传说声中，战争在全国蔓延得更加可怕，那是很自然的。



这时，又传出政府已下令打通 7 条铁路，攻占 3 个城市的消息。7 条铁路及作战指挥官是：

一、津蒲路：薛岳

二、胶济路：王耀武

三、平汉路：顾祝同

四、同蒲路：胡宗南

五、正太路：阎锡山

六、平绥路：傅作义、孙连仲

七、中长路：杜聿明

3 个城市是：淮阴、张家口、哈尔滨。

这时，陈诚将军忽由陇海路飞赴北战场巡视。15 日他由郑州飞北平，16 日飞沈阳，17 日回北平。履霜坚冰至。在好战将军的飞机翼下，战场将有一个丰收了。一个传说说：当局计划是从陈诚离平飞沈之日起 12 天之内（本月 28 日前）打下张家口。

作为目标的三大城市中，淮阴共军突于 17 日撤出。《大公报》专电报告说：“此部分共军抵抗力甚弱”。足见攻占淮阴，未经激烈战斗。共军在苏北南线坚强地反击，而在北线甚至撤出苏皖区的首府，其结果，政府军究竟是否能从此“扫清”苏北，或者是陷入了一个拔足不起的泥沼，那要由今后的战局来证明了。

但整个看来，战事中心是已决定地移向北战场了。7 条铁路线中，平绥线和中长线集中了一切人的视线。

平绥线上，傅作义部首先发动，目前正在丰镇作着激烈的争夺战；孙连仲部预定由青龙桥出居庸关，进占承德的政府军预定西向配合作战，这两路当在待机出动。争张家口之战如箭在弦上。中长铁路上，以松花江北岸陶赖昭为中心，政府军也正在发动着分兵三路，会攻哈尔滨。



政府军继续进兵的方针显已不可动摇，一切会议无非作为烟幕。中共方面在战场上周旋的决心也显已不可动摇，这从《解放日报》12日发表《将军必败》的社论可知。因此他们对谈判采取了你不谈，我也不急的态度。

秋高马肥，固然正好厮杀，但是将军们也该想一下，假如在50天内取不到决定的胜利，反而在互有胜负的情形下泥足愈陷愈深，那又将如何呢？

华莱士的发言

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在12日于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说，不仅造成美国国内政治上的轩然大波，而且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华莱士的演说显然与贝尔纳斯、范登堡、康纳利等所实际执行着的世界政策不同，甚至相反。联合社华盛顿13日电中说：“外交界分析华氏演说原文，发现三点与美国当前外交政策不符”。这三点是：

第一，“贝尔纳斯虽曾一再郑重否认有英美反苏集团之存在，但伦敦与华盛顿处理中东及地中海方面政治问题，政策完全并行”，而华莱士则“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与英国帝国主义政策分裂”。事实上，自邱吉尔首先倡议军事同盟之后，英美反动派已日益结合在一起，不仅政策平行，而且已以苏联为假想敌，谋在军事上结为一体，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此时正在美国。11日他忽然向记者表示：“一旦冲突再起，两国军队之统一诚为双方所愿望者”。在一切方面控制英国已成为美国反动帝国主义分子的基本世界政策之一，现在华莱士一口加以揭破，自然要受到猛烈攻击了。



联合国指出华莱士所言与美国现行政策不相合的第二点就在对苏关系上。华莱士说的是：“我们不能听任我们的对苏政策感受国内外盼望美苏战争的人的影响”，“我们殷望双方面的和平，我们殷望合作”。

第三点照联合社的说法是，“美国政策以反对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为基干，华莱士则主张美国不干与东欧政治，苏联则不问拉丁美洲与西欧事”。但事实上，美国反动派口中的反对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其实际意思都不过是世界都应该遵照美国的模型，而美国的武力和经济力应该能无所不至，因此他们对于东欧的新民主势力抱着极端仇恨的态度。而华莱士却提醒人们：“我们应承认巴尔干邻近苏联，巴尔干与美国的距离则较远，以是苏联不能允许英美决定该区政治。”

其实还应补充第四点：就是中国问题。华莱士说：“世界和平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不受任何势力范围的限制。但除非中国和平统一，并在国内各政治团体之合作和列强的不干涉政策的基础上，中国的贸易门户开放和经济发展机会也将毫无意义”。这个意见和不惜以军事占领和制造内战的方式来控制中国，使中国降为殖民地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对华政策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中的必然包含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这四点就可以看出美国现行世界政治是在反动派的指纵下，以英美同盟，反对苏联，打入东欧，控制中国为其基本政策，恰如脱缰之马，正走向最危险的方向。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华莱士的发言的意义。

但若以为美国政策即将因华莱士的发言而改变，那是言之过早的。相反的，我们看到，最初杜鲁门大概是为了想利用华莱士的发言以结纳民心，准备 11 月的选举，所以表示同意他的发言；但立



刻在受到了贝尔纳斯、范登堡和塔虎特之流的猛烈的压力后，立刻又狼狈失措地收回他的赞助之意。杜鲁门的威信固然由此而又一次大大降落，而美国帝国主义反动分子正以全力掌握着全局也可以由此看出。

但是，几个月来，美国许多官员与将军的不可一世的向世界的示威表示，是在华莱士的发言中受到了从自己内部发出的有力的一击。美国国内和平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搏斗不是结束，而正在开始，正如全世界人民为和平而斗争的事业正在开始一样。

最初刊载于1946年9月21日《民主周刊》(上海)
第49期，署名念青。



真打和假谈

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热，一阵寒。政治的气候和这个月的天气一样。经过这个月天气的变幻，我们终于确定地进入了秋天。经过这一个月政治气候的熬煎，我们终于确定地看明白了几件事情。

哪几件事被我们看清楚了：

首先，我们看到，假如在6月休战以后，曾有过边谈边打的拖的局面，那么到了最近一个月来，已经非常清楚：原来打是真打，谈是假谈。

打是真的，那还用解释？8月10日的马、司联合公告和8月14日的蒋主席庐山文告，实际上已表明和平谈判业已停止，此后就只能是真刀真枪地打下去了。但到了8月底，好像峰回路转，出现了所谓非正式的五人会议之说。现在已很清楚，五人会议是假谈，因为五人会议的建议者并不打算从这会议取得停战的结果，则谈归谈，一切问题还是要从战争中求解决。谈只具有为打做掩护的作用而已。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当局已决心不在此时停战，已决心要采取打的方针了。其实从6月休战期谈判失败后，政府打的方针已经确定了。8月初政府经由司徒雷登提出5个条件作为停战前提，好心肠的人还以为这也许是漫天讨价，还有继续商量的余地，哪里知道政府已决心你不答应我这5条，我就用武力来造成这五



条的事实。只同意开五人会议以讨论改组国府委员会，就是表示不愿续商停战问题；坚拒开军事三人会议，就因三人会议是正面谈停战的会议。于是随便什么人都无法为政府当局辩护，说他不是无意停战，有心打仗了。

再其次，9月还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使我们看出了作为调解人的美方的真面目。我们早已能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就是一面调停中国内战，一面又在火上浇油，助长中国内战。但是到了七八月以来，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一面却一天天地萎缩下去，几乎使人看不见了。中美民间舆论多数认为撤兵停援是美国制止中国内战的有效办法，纵然说这办法不一定可靠，但何以不但不尝试做一下，反而变本加厉，搬来了剩余物资，驻华军队的数量也有增加，连美军官的家眷也纷纷搬来，以表示坚决不走？五人会议明明不足以造成停战，连美方调人也不否认，何以他们偏偏对这会议这样感到兴趣，而对于直接谈停战问题的三人会议那样冷淡？马歇尔本以三人会议的主席资格调停中国内战，照理绝不应该不赞成开三人会议；既然他以为三人会议已经无效，不必再开，那么他的调人资格已经失掉。9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已遭临时挫折，嗣后马歇尔特使与司徒雷登调处中国和平谈判企图使中国获得统一，大抵仍将遭遇若干次挫折，但美国对于促成国共双方合作决不致失望。”（据法国新闻社电）由此可见，一方面，美国因为始终不采取有效的办法以制止中国内战，所以它自己也明知调停的前途无望，但另一方面却还是用空头的诺言以占住调停人的地位，使人相信，它还是要继续进行调停。

9月间，在美国国内又发生了华莱士的事件。华莱士直率地指出了美国目前的统治政策是在向着世界战争前进，而对华政策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一部分。华莱士因他的发言而被赶



出政府,这事实是再清楚不过地使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看出,美国当前的政策,无论在全世界和在中国,都已确定地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对于美国调人的最后一点的幻想也被事实所粉碎。

最后,我们从最近局势的发展中又看清楚了中共的态度。6月休战期的谈判中,中共在东北停战、恢复交通,乃至整军问题上都做了很大的让步,虽然最后坚决拒绝了蒋主席提出的四条,但仍给一些人以一个印象,以为还可以继续使中共让步,只要给它以压力,至少中共是可以谈判的圈子来套住的,不管怎样性质的谈判,它总非奉陪不可。八九月间的谈判经过,证明了中共现已下定决心:第一,它决不承认超过限度的让步,对于致它死命的五条绝不能接受;第二,除非谈停战问题,它决不再参加谈判,这就是说,对于一切只是用来敷衍粉饰,无补实际的商谈,它已决心不再奉陪了;第三,假如打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共就决心打下去,任何情况下决不屈服,如周恩来19日在沪向联合社记者谈话中所说:“不论美国给予政府任何援助,中共决将继续作战,即使中共失去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他铁路线主要城市,共产党亦决不向国民党屈服。”

我们既看清楚了这四件事情,我们对于当前局势的症结所在及其发展趋势也就可以看清楚了。是的,天气是晴朗起来了,但这晴朗的天气是万象肃杀的秋天。

时局的症结所在是停战的条件。去年12月里,中共提出无条件停战的主张。但事实上,今年1月的停战协定已经不能说是完全无条件。战争止而复发,范围逐渐扩大,纠纷越来越复杂,于是一谈停战,势必谈条件。若能在磋商中把条件谈妥,而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实现停战,那也未始不好。6月休战期的谈判就是磋商停战的条件,且已商定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足见只要双方有诚意,停战



条件也不是谈不拢的。但政府忽然又另起炉灶提出4项条件,以致谈判决裂,这四项条件到了8月初又变成5项条件。9月里中共建议重开军事三人会议,看来是表示,不妨重新再来磋商停战的条件。但这时政府却已没有兴趣来谈条件了,因为政府的决策是非实现其5项条件不可,那么一开起停战谈判来,势必因政府的坚持而决裂,则谁让步,谁不让步,谁负破裂的责任就清清楚楚了。因此政府当局到了9月里表示出,他连有条件的谈判也不愿一试了。

那么,打下去又怎样呢?政府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抱着这样的打算:在目前军事形势下,要强迫中共接受5条不可能,所以在打的中间,最好能做到把5条中所要求的各个地区都用武力占领下来,则5条不必谈而自然已实现,那时就可和中共谈“无条件停战”。即或不能做到把这5个地区全面占领,至少也要把几个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占领下来,那时再来和中共谈“有条件的停战”,不怕中共不承认。对于政府方面的这种打算,报端已有透露。如:

联合社南京13日电:据高级人士传出消息,蒋主席无意与中共长期拖战,但拟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前,达到牢不可破之军事有利地位。

《文汇报》18日专讯:某消息素称中立之中立人士称:政府确有意停战,但须在张家口攻克以后。

由此可见,政府方面的计划就是在一定时期以内把战事打到一定的结果,然后再来谈停战。这所谓一定时期以内,当然最好是在10月以内。因为那就可以在10月23日开幕的联合国大会中获得比较体面的地位,而预定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也可以风风光光地举行了。

但是,凡头脑清醒的人,都可看出,这个计划是建立在极不可



靠的基础上。5条所要求的是包含陇海路以南,胶济路沿线,山东、山西的若干城市,热河南部及冀东,以至东北中共区的大部分。要说在一两个月内就能完全用军事占领,只要一看过去两三个月来的政府军战绩就可知道是万万不可能的。而且中共从8月以后就渐渐实施“你拿这里,我拿那里”的方针,于是战事发展势必成为你在这方面进展,他在那方面进展的情况。所以政府方面虽有优势兵力,也不可能处处占先,一切如意,那是不待智者也能看出的。再者,政府军假如集中一点,全力进攻,则拿下中共的若干主要城市固未始不可能,但是,比如说,张家口拿下了,甚至说,连哈尔滨也拿下了,那时是否就能使中共不得不接受现在他们所拒绝的苛刻条件呢?我们可以设想到,向来与乡村结不解之缘的中共军是不会因失去若干城市而丧失其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相反的,恐怕倒会因政府军的进逼而更加深仇恨。政府军充其量只能占到若干大的点和主要的线,而中共军则将如水银泻地开展。那时兵连祸结,停战的条件恐怕是更加谈不拢了。

所以,我们认为,政府方面假如抱着此时不停战,不久后会从战争中求得停战的更好时机,从实际上看,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想法。

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才会有真正的停战,假如停战条件只是对于一方面片面地绝对地有利,那么这种条件仍埋伏着战事再起的祸根。政府既不敢自信能够消灭尽中共力量,而只求在占领得若干重要的战略据点和地区以后,以有利的条件而使战事暂停,纵然能够做到,很显然的,不久以后,一定又要以这有利形势为基础而再发动进攻。所以,无论如何,现在既不谈停战,那么今后就一定是长期拖战的局面。

但以国民党政府下的政治情势、社会情况、财政经济的情况、



军心和民心的情况，能否支持得了长期的拖战，那又是不待智者而能预卜的。

奇怪的是作为调解人的马、司 2 人也同意暂不谈停战，以后再说的办法。教育家出身的司徒雷登大使毕竟老实，他把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说：“以中共提议重开三人军事小组一项问题而论，马歇尔特使与本人，见解相同，即赞成先开五人小组会议，一旦政局有相当进步之时，军事纠纷之解决自较易为事。他日时机一至，停战问题当然将加以讨论，三人军事小组自当重新召开。”（法国新闻社 16 日南京电）这段话表明了，美国调人的意见是，现在还不到停战的时机，所以不必谈停战问题。既然不谈停战，自然是打下去了，既是打个不停，纵然开成五人小组会议，又怎么会在政局上能有“相当进步”呢？所谓等待时机以重开停战谈判，不过是等待政府当局取得军事胜利的时机而已，也足见所谓五人会议的谈，以至一切其他任何方式的不涉及停战问题的谈不过是表面敷衍而已。假谈真打的方针在美国调人和国民党当局间已经取得一致了。

好战分子希望从战争中求得有利的时机，事实终将证明这不过是如同海中捞月一样的空想。他们想用假的谈来掩盖内战的严重性，那更是同用纸包火一样徒劳。

真打是打不出结果来的，假谈是谈不下去了的。当前的局势已经足够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9 月 23 日

最初刊载于 1946 年 9 月 26 日《文萃》（上海）
第 1 年第 49 期，署名公孙求之。



全面破裂能否挽救

在秋风萧瑟之中，人们抱着惊悸的心情回想到民国 16 年（1927 年）的国共分家的惨剧和抗战期中民国 30 年（1941 年）皖南事变的暴风雨。

固然当前的局势绝对不同于民国 16 年，也有异于民国 30 年，但是又一次全面破裂的危机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命运，那是无可否认的。

首先，前方的军事继续发展，势必走向破裂。

不能以为，从去年 8 月以来，内战一直就是“打打停停”地发展着，所以照这样打下去也无伤脾胃，总是可以因拉拉扯扯的谈来给以若干冲淡，总不至于全面破裂。

有些好战分子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以为自己在军事上有利的时候就不停手地打，到了感到有点不利的时候，就借任何一种形式的谈来稍稍歇下手，喘口气，以备重新再打。这样下去，可以一直打到“全盘胜利”、“最后胜利”，而无须担负造成破裂的责任，不至遭到什么妨害打的进行的阻力。

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一天天打得更猛烈时，就一天天更难于用无效的谈来遮掩了。打的规模与程度到了一定的情况时，势必发展为全面的破裂。

从 6 月谈判失败后，7、8、9 三个月内，随着政府军在鄂中、苏



北、胶济线、晋东南、鲁西南各方攻势的发动，战事的严重性像三级跳一样地向前发展着。到了9月下半月，由于陈诚将军飞行巡视华北各军事要镇的结果，三路围攻张家口的攻势如箭在弦上，这使内战发展到了最高潮。

9月30日，以周恩来氏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由政府的政协代表转陈蒋主席一函，措辞严厉为前所未有的，其中说：

“政府军队却毫无任何借口地继续扩大对热河和冀东的占领，并已公然发动对张家口的三路大举进攻。事势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军事政治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临于最后破裂的境地。”

“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从军事上看，进攻张家口显然不只是一个城市的争夺战。为了布署攻击张家口，政府军已先在热河、冀东、绥东发动了攻势。中共既把张家口视为“军事政治的中心之一”，自必以全力抗拒，而且一定在张家口外围各方面以至其他地区实行反击以收牵制之效。进攻张家口的战事实际上是整个华北的战争。所以8月29日凌晨2时，北平行辕的三路进攻张家口的总攻击令发出后19小时，中共方面即大举发动向平汉路北段、保定周围反击。一时间，平汉、津浦、北宁、同蒲、胶济各线都像拉满的弓一样，到处呈现最紧张的状态。可以想见，假如进攻张家口的战事继续下去，或甚至政府竟如其预期而占了张家口，则战场的范围一定更加扩大，决不可能再有一个和谈来使局面松懈一下。

所以，在政府军向张家口的攻击已经正式发动之时，我们不能



不承认，全面破裂的危机正在眼前。

其次，政府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将促成政治上的全面破裂。这点已极显然。按照政府原定法律，在国民大会正式开始报到前一个月颁布“国大召集令”，所以10月2日应即把召集令颁布。虽然政府负责方面仍口口声声说，不管各党派是否参加，国大总是要召开，但到了10月2日，却不得不自行把召集令延搁一下，因为这一纸召集令将是召魂幡，它会召来破裂的幽灵。

此次国大的任务，只是制定宪法。假如其他党派都不参加，只是国民党及其与党——青年党的“恳亲会”，那么从这样的国民大会中所制成的宪法，除了做装饰品外，不会有任何意义，正如同民国以来，军阀政治时代历次所订宪法一样。其唯一意义只在造成破裂。民盟在9月4日发表对时局态度的谈话中说：

“11月12日国民大会之召开，系国家统一或分裂之一重大关键。为了避免国家之分裂，民盟不仅决定不参加国大，且敢于向社会呼吁，希望全国同胞们一致反对这种会议的召开，竭力制止它。”

10月2日，政府发表声明，作为对中共9月30日函件的答复。声明中提出两点“对时局可能让步的最大限度”。第一点是说，在改组后的国府中除中共占8人、民盟占4人外，“无党派名额中1名由中共推荐，政府同意”，“共13人”。以这“让步”来交换中共提出国府委员名单和国大代表名单。第二点是说，“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18个师之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

在破裂危机万分严重的时候，政府当局却只提出这样两项“离题万里”的办法，实在不能不令人失望。以前一点而言，中共与民盟所坚持的是中共、民盟合占14席，以保持对修改和平建国纲领的否决权，或者不论席次多少，任何一党在国府委员会中均握有否决



权。现在政府的“最大让步却只是 12 人，外加推荐一个无党派人士。显然相去甚远。而且按照政协决议，无党派的国府委员 4 人虽是由国府主席提出，但如各党派府委中有三分之一不同意，仍须重提。由此可见，无党派名额 4 人本须征得中共、民盟之同意才能决定。所以无怪乎政府提出中共推荐 1 人的办法，要被中共和民盟看做是耍花样，变把戏，并不是什么“让步”。至于第二点，也显然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危机，因为第一，为了实施整军方案，当然不能说只有中共军驻地要规定，而无需规定政府军驻地；第二，假如不先停战，也无从谈双方军队驻地问题，在战事继续的情形下，要中共军一方面退入其“驻地”，那自然只能成为空话。

政府的这个答复中避开了正面有关大局破裂的问题，既不谈是否进攻张家口，也不谈国民大会如何开法。因此使人看出，政府的决心是张家口还是要打的，战争还是不能停止的，国民大会还是要不顾一切而举行的。

全面破裂的危机再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了！

一心一意想求武力统一的人，就一定是破裂的罪人。反动的武力不能完成统一，只能造成分裂，40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是分明的镜子。

当前的情况和民国 30 年皖南事变时不同，因为当时还有对外抗战的一个大题目在，所以皖南事变后，破裂局面还不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在现在，一旦破裂，局势将格外严重。不过这情况也和民国 16 年的国共分家不同，因为国际国内的条件使得分裂主义者不能不更多所顾虑，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充满自信地蛮干一气。

就军事上看，尽管政府以 11 个军的兵力压到张家口，但是究竟能有多少把握呢？9 月 16 日陈诚将军在北平时，据说所布置的计划是在 12 日内攻下张家口，那就是至迟在 9 月底要完成。但是



不过几天后却又有政府军拟进入张家口过双十国庆之说。9月30日合众社北平电说：“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及第11战区司令孙连仲均表乐观，彼等认为国军一旦发动攻势，一两星期内即可攻陷张垣”。那是又把“胜利”之日推迟到本月月半左右了。冀东、热南的战事，政府军只是“收复”了若干城市，共军在这方面的主力完全无损，对察省战局起着有力的牵制作用。尤其出于预料的是，共军和平汉北段大规模出击，5天内即克望都、徐水、定兴、容城4县城，控制铁路线250余里。使得陈诚将军的预定部署发生动摇，以至不得不又赶往北平，亲自重新布置。周恩来在10月1日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声明，如果政府不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将改变战略，主动出击。平汉北段战事是在这声明之下的第一步。10月6日马歇尔、司徒雷登与蒋主席几经接触之后，向中共提出建议，据说建议内容是要求双方休战若干天，进行商谈。不管这建议是否由政府方面提出，至少可表示政府军一鼓作气拿下张家口的锐气已在实际上发生顿挫，而需要稍缓一下再作计议了。

与这一新建议相平行，政府方面对于国民大会问题也略松了一点口风。洪兰友在7日谈话，不断言国大何时召开，只说“本月12日前总可有重大决定”。邵力子也表示国民大会“亦可能再行延期”。

但是休战的新建议和国大可能延期之说是否就足以消除破裂的危机呢？

不，一点也不。因为问题不在于时间的推延。6月的休战已给了人民深刻的教训，当前的严重战局正是在6月休战以后酝酿起来的。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期也是在6月休战后政府方面片面决定的。政府当局今日倘仍无立即全面停战的决心，仍没有把政治拉回政协会议的道路的诚意，那么他手里高举的不是别的，正是一



柄造成破裂的大斧。客观条件的困难使他不能不考虑，这柄大斧何时斫下来更为有利，但是迟早是要斫下来的。

10日或若干天的休战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也不能使时局澄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最严重不过的全面破裂的危机。除了立即全面停战，实施政协决议外，没有什么挽救时局、克服破裂危机的办法。

最初刊载于1946年10月10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1期，署名公孙求之。



破裂的局面已经出现

十月十一日

时局的发展情势早已指明，进攻张家口的战事继续不止和片面召开国民大会这两件事将促成国内的大破裂。记者在上期本刊中亦曾略加分析。

10月11日，政府军攻进张家口，加以占领。立即，政府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全国人民所不忍闻，不愿设想的最坏的局面因此而突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一个月来，我们担心，我们忧虑，我们总害怕国内局势竟弄到最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总还以为当其事者只要能有一分为国为民的心，就不至于硬要把国家和人民拖去再经历一次可怕的劫难。现在一切希望破灭了，一切幻想碰壁了。

10月11日政府在塞外前方和南京城内的这两个步骤就像是两块大石头，死死地堵住了和平谈判之门，今后除非有一个巨大的力量来搬开这两块石头，此路是不会通的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两个步骤又像是打开了的水闸。内战本来已经是波滔汹涌，但究竟还有一个闸门拦着，现在这水闸一旦拉开，内战的洪水自然就会夺门而出，无所顾虑，无可限制，直向下流，浩浩荡荡地泛滥冲决而去了。



走向绝路

这一局势的出现其实并不是突然而来。

早在一个月前，即9月中旬，政府方面拒绝在开五人小组会议前给予停战的保证，并且坚决拒绝开三人军事小组会以商量停战问题，那时，局势发展实在已经确定。战既不停，谈自然继续不下去；既然光打不谈，则走向破裂实是不可避免的。

9月下旬，政府军在冀热绥的军事布置已大致完成，长城内外调兵遣将，战云密布。24日由洪兰友宣布，政府将于10月2日颁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的命令，同日向各党派发出通知，要他们立即交出参加国大名单。中共与民盟均表示拒绝。这时，停战问题更谈不到了。政府方面的态度是除非中共答应承认早已谈僵了的五条，并且交出国大名单，政府不能下令停战。这在中共方面看来，无异于是被迫递出降表。就在这时候，由军事到政治的破裂局面更已经确定。

然而“盘马弯弓故不发”。9月26日，蒋主席于离开69日后返抵南京，忽然传出了一阵局势有转机的消息。从9月26日到10月11日命运决定之日，一共不过半个月，这半个月中，局势一波三折，几乎使一般人民于每日读报之际完全摸不清“行情”。但是现在回头看来，这半个月的发展是很容易懂得的了。

政府于10月11日的决定的一着是早已成竹在胸的，其所以在9月的末后几天中还要把局面再松一下，不外乎第一，当时军事上虽已布置就署，但正面进攻张垣的战事尚未发动，不免要再观望一下。第二，因为在当时政府拒绝谈判停战问题的建议是众人皆知的，若立即宣告破裂，则责任谁属，异常清楚，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第三,还有作为调人的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两位也有他们的苦衷,当时他们被迫于中共坚持先商停战之建议,不得不公开表明了他们的支持政府不停战主张的立场。若在那种情形下就宣告破裂,则调人的面子实在不好看,因此也需要把局势再转一个弯。

因此在9月26日蒋主席返南京后,即传出马歇尔于27日晨以书面新建议四项提交蒋主席,蒋主席已赞同三人会议与五人会议同时举行的消息。于是和平空气荡漾于报端,给人民以一线新的希望。但空气究竟只是空气。到底政府也没有正式向中共提出三人会议和五人会议同开的建议。这阵空气不过热闹了3天。29日一声炮响,政府军三路进迫张家口的战事正式发动,一级进攻的命令把这飘渺无根的空气冲得烟消云散。

9月30日,中共代表团致函蒋主席;同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均声明,政府倘不停止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一切严重后果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这一强硬的声明揭出了局势的严重,但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决策。10月2日政府要员有一集会,讨论和战问题,温和派的意见被否决。就在这一天,蒋主席致函马歇尔,作为对中共声明的答复。函中主要内容由彭学沛氏声明中公布,即众所周知的2条,1. 国府改组时,中共与民盟共只占12名,外加由中共推荐无党派委员1名;2. 须规定中共军18师之驻地,并须限期进入驻地。这个答复显然是“以强硬对强硬”,据说连政协秘书长雷震氏这时也说:“国共决裂的可能的确很大”。中共方面坚拒接受这两条,认为这是“逼中共订城下之盟”。中共并于4日口头提出对案,即1. 中共与民盟必须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占14名;2. 中共所能同意的停战办法为恢复1月停战令的效力,即双方军队均须由1月13日后所占地区退出。这两点与政府所提两点针锋相对,于是僵持不



下,可说是已经不可能找到出路了。

在这局势破裂,危在旦夕之时,中共方面透露了一个新建议,似有打开危局的企图。这新建议是说,中共可不坚持全面停战后再进行商谈,只要政府无条件停止进攻张家口,则其他问题中共可以参加商谈。这个建议是在10月5日由中共的王炳南氏口头通知司徒雷登大使。可以想见,这建议使政府与调解人都感觉到了为难。因为对张家口的攻势已经发动,志在必得,自不愿自动放手;但若拒绝中共此议,则好战拒和的丑名也怕是洗也洗不掉了的。于是由调人出来解了这个围。10月6日马、司两位与蒋主席商定了一个办法通知中共,这就是对张垣军事行动停止10天的建议。这个建议内容可由已经公布的10月6日马歇尔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中看到,其要点是:1. 停攻只限于10天;2. 实行停攻要以中共承认实行蒋主席10月2日所提2点为条件;3. 停止进攻由二调人宣布,政府与中共双方均不作任何宣布。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停攻张家口10天的建议实在不是有意为和谈找寻出路,不过是为了在破裂之前故作波澜,以减轻政府和调人的责任。因为假如中共能接受这样的停攻10日的办法,则10月2日的政府建议早就可由中共接受了。调人与政府显已明知中共会拒绝,但他们所要的正是中共的拒绝。所以在10月8日中共方面由王炳南口头答复司徒雷登大使,坚持停攻张家口应无限期后,立刻马、司联合发表了一个公告。这公告内容虽只是列举9月30日后的事实,然而很显然的,这公告暗示着,和谈已抵绝境,而其所以至绝境者,是由于中共拒绝停攻张家口10天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9月至10月间政府屡次表示拒绝中共的停战建议,马、司两位从未因而发表声明,却反而加以默认;现在只在中共方面表示意见后数小时,立刻就发表了联合声明。



似乎有点像渔人设饵垂钓，只等鱼一上钩，立刻急不可待地拉起杆来；这一下你可中了计了。在渔人看来，这是聪明的计策，假如中共接受停攻 10 天之议，那就是接受 10 月 2 日的政府条件；假如不接受，那就是你不识抬举，不愿休战，咎由自取，尚复何尤。

8 日马、司的联合公告，9 日下午马歇尔专程赴沪晤周恩来，9 日晚蒋主席的国庆广播，其共同目的是在于把造成破裂的责任加在中共头上。而政府呢，虽然一直不允下停战命令，但口头仍说：“停止军事冲突的问题，这本是我们政府一贯的宗旨，而且我们所期望的是全面的永久的停止冲突。”

戏做到这里，其实已经山穷水尽，再没有可演的了。破裂的局势无可改变。

但中共方面又做了最后一次争取和平商谈的努力。这就是 10 月 9 日晚间发出的周恩来致马歇尔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中心内容是重申，“政府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即系表示其不惜全面破裂的决心”，并且郑重声明：“为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和非正式五人会议或政协综合小组会，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二项问题。”

这是周恩来 10 月 2 日以后第一次的书面文件，其力量不小。尤以他郑重提出的这一让步办法，首先把政协会的国共以外代表煽起了一些希望，他们希望在这紧急关头还能尽一点力以挽救时局。10 日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代表在沪集议，拟即日赴京斡旋，根据“停战”及“照政协办事”二原则来给时局找新出路。政府方面水来土掩，将来兵挡，少不得也招架一下，于是表示欢迎第三方面代表去京。所以 10 日、11 日报端回光返照似地又有了和谈有望的消息，又一次带给万千人民以一线希望。11 日上午，彭学沛氏甚至还



宣布了国大召集令暂缓颁布，待时局澄清后再说。这更是给人民以一股镇定剂。

然而就在 11 日中午，陈诚从前方一个电话打到南京，报告张家口已经攻入。南京的政治空气立时改观。当日下午蒋主席召集紧急会议，出席这会议的是吴铁诚、吴鼎昌、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诸氏，在这会议上决定即时颁布召开国民大会令。因此当梁漱溟作为第三方面代表的先行者于一夜卧车赶赴南京时，清早从车站出来，他所发现的已经是宣布破裂的南京了。有句话说得好：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第三方面代表，什么停战令、政协决议，什么和平会谈，在得到了张家口“捷报”的南京城里，已经完全没有地位了。

所以从 9 月底以后的和平空气的回荡，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和平商谈在 6 月休战谈判失败后，实已无可继续，至 9 月中旬政府拒绝谈停战时，更已前无去路，其所以在破裂以前和谈余波尚荡漾不已者，看了以上所述的经过，不难明白其底情，原来不过是等待张家口消息时的一番做作而已。现在一棒锣响，舞台转暗，破裂的局势已经形成，而造成破裂的责任谁属，也仍是清清楚楚，无可掩饰的。

三 幕 剧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后局势的发展。

国共双方的方针可以看出是都已确定了。

在政府方面，打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了，而且现在已经是不留任何余地地实行这方针了。假如过去还要以一时的停战来歇一下气，那么从 7 月以来是连这也放弃了。张家口打下之后，报端已纷纷议论下一步将以哪一地区为战场。延安乎？哈尔滨与安东乎？烟



台与临沂乎？总之，不断地打下去已经是政府既定的方针。假如过去还令人以为，打尽管打，还要保留政治谈判的余地，避免政治上的决裂；那么现在国大召集令既下，中共与民盟不参加国大的形势也已显然，则政府是已决心在11月12日召开政治分裂的国民大会的了。

在中共方面，决不在武力胁迫下屈服，也已是决定的方针。周恩来10月2日于记者招待会上虽避不答复是否要以召开另一大会来对抗国民党的国民大会，甚至另组政府的问题，但已透露了一旦政府宣告破裂，则中共在军事上不受任何约束，而将全面进行主动性的活动这样的意思。以中共20年来打游击的经验来看，可以相信，它虽然失去若干城市，是仍无碍于其广泛的军事活动的。

由此可见，10月11日政府方面的措施，就和平商谈看，是舞台闭幕，是大石拦死了道路；就战争看，是又一幕新戏上场，是洪水开闸，浩浩荡荡，莫之能御。

更长期的、更大规模的、更激烈的内战，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自从今年2月里，国民党开始破坏政协决议以后，直到10月11日以前，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内战在关内关外各处大打，但是政府方面一直还是保留着政治不分裂的余地。所以国大由5月5日延期，口头也总是说还要遵守政协决议。这显然是表示当局还谨慎小心地不要把国共关系僵化到不可收拾，准备在必要时还可有回旋余地。可是到了蒋主席双十节国庆广播词中，我们已看不到一个字提到政协协议；到了10月11日国大召开令下，更已把政协协议完全毁掉，再不去理它了。我们不免要疑问，政府当局究竟有什么把握竟然放开大闸，一任洪水泛滥，再不为以后收场留点余地呢？

所以，国民党内人士这几天来，也颇有感到政府这一步骤做得太轻率了。《大公报》10月14日社论就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它认



为，政府在拿下张家口后，似不应立即颁布国大召集令，而应以战胜的地位而进行“政治解决”。

但是我们看来，在当局打出这最后一张牌的时候，不会没有经过考虑。可以设想得到，其所考虑的不外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拿到张家口后，且不下召开国大令，仍然用政治谈判的姿态来向中共和第三方面说，你们看，现在我已经胜利了。现在我可以停战，但你们必须依我的条件，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交出国府委员名单，交出国大名单。

另一种办法就是现在所做的，立即下召开国大令，在政治上不留余地，在战事上放开大闸，从此以后完全靠军事来求解决。

前一种办法看来似乎比较聪明，《大公报》事后所献的策也不外乎就是这个办法。主张应采前一办法的人肯定了一个前提，是武力终究不能解决问题。但正因为武力终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前一办法也一定行不通。因为张家口究竟不足以决定全部战场上的胜败。以占领张家口之“胜利”而要挟中共和第三方面都一起屈膝称臣，可以确定地说，是办不到的。

所以政府当局之舍前一办法而采后一办法，并非智不及此，实在还是鉴于前一办法并不能行得通。于是就冒一下险，干脆走第二条路。

我们早已指出，只有走政协的路，才能真正政治解决，既舍弃政协之路，就一定是依靠武力。现在的事实是做了铁的证明。假如果说，政府现在所采取的是一个不聪明的办法，那么这是因为在它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并没有什么其他聪明的路可走。

无论如何，武力到头来一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假如把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看做一幕戏的话，那么，假如大家老老实实一直遵守双十会谈纪要和政协决议，中国问题是已经可以由政治方



法和平解决,那就是一出独幕喜剧。但好战分子的播弄使得这幕戏变成了拖拖打打,文武双全的闷人的戏。现在这幕戏闭下去了,接下来的将是全部真刀真枪,惊心夺目的武戏了。然而中国问题一定也不会以这样的两幕戏告终,当第二幕告终时,一定还会有第三幕上场。

全国人民在尽一切努力以挽救时局以后,终于还是不能不被迫着面对这一全武行的新的一幕上场,我们的苦痛和愤慨是不可形容的。但是我们仍要咬紧牙关,抱着信心来努力缩短这第二幕,来争取那第三幕。

最后一线阳光落下了地平线,黑夜临降。但黑夜统治这个世界,是决不能长此继续的。

最初刊载于1946年10月17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2期,署名公孙求之。



和平商谈中的“距离”

在这篇文章和读者见面时，南京的和平商谈不管是否已经开始，想来一定可以有更多的材料足以帮助我们判断前途的吉凶。记者执笔时，还只从晚报上得到消息，知道在中共和第三方面代表刚刚到达南京后，蒋主席即已翩然离京，飞到台湾“视察”去了。没有人预先料到这件事，也没有人会把这件事看做是南京的和平商谈的好兆头。

无论如何，人民是在迫切地企望着和平的实现。特别是和平已抵绝境，长期内战与分裂的局面已迫在眉睫之时，我们是尤其盼祷着南京的会议，真能出现一个奇迹。然而正如同善良人常因其好心而为撒旦魔鬼所愚弄一样，人民爱好和平的迫切企望也常为好战分子所利用。为了使我们的希望的大厦不建筑在不可靠的沙滩上，让我们且来就过去 10 天来的局势发展作一粗略的分析。

和平空气之由来

我们早已看出，10月11日政府宣布打下张家口，并颁布召开国大令，这两件事已经把国内局势推向破裂的深渊。但是到了12日以后，和平的字眼在政府若干要员口中强调起来了。14日，蒋主席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的有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张厉



生、陈布雷、陈立夫及吴鼎昌诸氏。据说，在这会议中，甫由上海回京的孙科根据第三方面代表的建议作了一个报告，政府态度即根据第三方面意见而有新决定。虽然在沪第三方面代表立即表示，他们在国军既占张家口后并未有任何新建议，报端所传孙氏在御前会议上的建议实为孙氏自己所提出，但是政府已决定在局面已至最紧张时发动一和平攻势，是在 14 日的会议上确定下来了。

15 日晨，雷震氏衔命抵上海，与第三方面的民盟与青年党的领袖及无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头，民盟代表并访晤中共的周恩来。在这一天第三方面代表为促进和谈表现了很强的积极性是可以显见的。他们有两点建议：1. 政府公开申明其停战诚意；2. 派遣高级官员 2 人来沪，与第三方面续行谈判。在雷震带了这两点意见回南京后，政府要员会商的结果可以从蒋主席在 16 日晚发表的时局声明和彭学沛氏在记者招待会中的答复看出：

第一，对于第三方面代表的首先保障停战的要求，政府的答复是：“至于避免军事冲突，政府在过去与现在均欲尽力促其实现，惟必须有具体妥善之办法，始可使绵长之军事前线得确实停止冲突，且不致蹈以前随停随起之覆辙。”（彭氏谈话，据《大公报》专电）蒋主席的文告中则说：“余特重申和平解决之诚，特提出下列具体实施之办法，一俟共党予以同意，政府即可发表停止冲突令。”几个月来，政府军在内战中一直处于主动进攻地位，所以第三方面代表不能不首先要求政府表示停战决心。政府的表示既只是，停战必须有前提条件，即必须承认政府方面所提出的 8 项办法，这对于求和的人心实不啻是冷水一瓢。

第二，第三方面要求政府派大员来沪商谈，彭学沛氏则表示：“现在仍盼中共及其他党派代表早日来京，继续商谈。”政府虽然立即派了吴铁城、邵力子及雷震于 17 日下午飞抵沪，但他们的任务



并非代表政府在沪商谈，而是挽请在沪的中共及第三方面代表到南京去商谈。在南京谈和在上海谈岂不是一样的？但看起来南京也确有方便之处，因为国民党中枢要人均在京，尤其是蒋主席也在京，则在京商谈就不至于因政府的二三代表不敢决策，函电请示，徒费时日。大概是这原因，在沪的第三方面代表及中共代表均同意赴京。但是一到南京，蒋主席却远去台湾，这对于全国仰望和平的人心不能不说是又加上一层暗影。

中共方面在10月11日后一直保持着缄默态度，直至蒋主席16日声明发表后，17日中共中央才在延安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在这声明中我们看出，中共对政府的这一次和平表示采取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近日若干第三方面人士正在作挽救和平的最后努力，蒋介石为了再一次蒙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乃故意装出和平姿态，于本月16日宣布其和平的八项条件”；但同时也仍表示着愿意继续和平协商：“本党认为只要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之下，愿意实行正式有效的和平，则本党亦可不咎既往，重新协商。”

18、19两日在上海的会谈实际上并无什么结果。政府代表似以能邀得周恩来暨第三方面代表同到南京，即为满足。中共与第三方面代表都愿到南京，显然是存着最后尝试一次的想法，究竟有多大把握，是谁也难说的。要知道和谈进行的困难，就得一看政府方面和中共方面所已经提出的主张的内容。

“八条”与“二条”的距离

蒋主席在16日的声明中提出8条。这8条被认为“发表停止冲突令”的前提，并且“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与军事三人会议都要在这8项“谅解之下进行之”，可见其分量之重。



(一)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

(二)在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执行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

(三)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应即定期实施。

(四)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协议商决国军与共军之驻地分配及整军统编与缩编诸事宜,而达成全国军队统一之目的。

(五)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交由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其协议。

(六)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

(七)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

(八)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停止军事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17日中共中央声明中也包含着他们的具体主张:

本党没有旁的要求,只要求首先恢复信义,今日信义的神圣标准如何?这就是1月10日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三人亲自签署的停战令,与1月31日蒋介石和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政协决议。本党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议如欲期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项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本党认为蒋介石与马歇尔应该重视自己之信义和人格,没有任何理由推翻自己所签字的神圣协定。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



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这两个声明中所提出的具体主张可说是双方摊出的“盘子”。其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呢？

就形式上看，也可看出，两个声明有一显著不同，即是有一方面强调政协决议，而另一方面则回避政协决议，在上举 8 条中只在第五条中提到政协综合小组，而综合小组在这里的地位只是把“由司徒雷登为中心之非正式五人会议”所成立之协议通过一下而已，第八条尤其显著地违背政协决议。因为按照政协决议，必须在停战、改组政府实现以后，才由改组后的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府来筹备开国民大会。第七条虽也提及属于政协会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但也与政协决议原精神不符。因为政协原决议是规定，政协应“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而政府这次声明中则说是，“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按照政协决议，则各党派自应保障政协会的宪草得以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但按照政府所说，情形就完全不同。再则，改组政府本是政协五项决议中的灵魂，由所谓“非正式的五人会议”来“协议改组国府”（仅仅是改组国府！）是不合乎政协决议的程序的。现在既然已经由第三方面代表参加而重新举行商谈，则已经流产的非正式的五人会议，实已无存在之必要，而应该回到政协决议的程序和精神，以进行改组国府和行政院。否则，假如改组政府问题不能按政协决议而进行，则第六条所说“关内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也还是会纠纷重重。

所以这 8 条中，从第五到八条都是关于政治问题的，也都和政协决议不相适应。第三方面代表既然一直强调“照政协决议办事”，中共方面又声明一切政治商谈应以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准则，那么我们不能说，在朝政党与在野政党之间没有原则上的距离。



大家都知道，正因为政协决议自产生后从未能实行，所以这9个月来才弄得内战一天天扩大。现在来谈停战自不能不令人想到停战以后如何。第三方面主张立即停战，然后一切照政协决议办事，自是最公道不过、最合理不过的。若停战而并无实行政协决议之保障，则前途如何，实未可乐观。

再看在军事问题上，国共双方主张之间也不能说没有重大的距离。

中共在军事上只有一句话：即承认1月10日停战令的效力，亦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准则”。政府方面则提出4点（即上举8条中的前4条），四点中无一处提及1月10日停战令。这4点中前3点却都以6月谈判中的拟议为根据。看起来，这好像是尊重1月10日停战令呢，还是尊重6月谈判的协议的争执。但是如大家所周知的，6月谈判是失败了，并无结果。当时，关于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解决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及北平执行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以至关于整军驻地问题曾有过若干初步协议，但是因为政府方面坚持，必须全部解决才能签字，结果就弄到一事无成，只有未经完全协议的草案数纸。何以当时政府不愿签字，现在却又主张部分地恢复6月间的未完成的协议的效力呢？其原因很容易看出：

第一，6月所拟定的恢复交通办法与解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中之争执的办法，显然是在中共让步下对政府方面有利的决定。因为恢复交通办法是限期修复战区内的铁路交通，自然对政府军事上有利。解决争执办法中虽未赋予美方代表以最后决定权，但美方代表却获得了较多的权力，这对于政府也是有利的。正因此，在这次政府声明的8条中首先就要恢复这两项办法。

第二，政府的第三条说，“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



应即定期实施”。但如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东北军队驻地,在6月谈判中连初步协议也没有。当时中共只承认安东一地可以商量,并可接受政府在哈尔滨驻军一团的办法。而政府方面则坚持中共在东北驻军应只限于兴安、龙江二省及嫩江省之一部分。政府对于关内关外中共驻军地区的严苛要求,是直接促成6月谈判失败的原因。从这第三条看来,政府至今仍未放弃其要求。

第三,尤可注意的是,在政府所提第四条中提及华北、华中驻军问题,却又不提6月的谈判了。据说,在6月谈判中,曾有一项协议,规定1月13日以后关内由政府军或中共军所占领之各地均应即行撤退。当时政府同意这项规定,而现在却主张关内政府军、共军均暂驻原地了。很明显的,其原因只在于从7月以来,政府军在关内已经进占到更多的地方,所以利于暂维原状,不提恢复1月13日以前状态了。

由此可见,政府方面在军事上的主张是,在6月谈判中的协议草案中的有些部分,因仍对自己有利,所以主张执行;东北地方因从7月以后未再占到什么地方,所以不主张维持现状,而仍坚持过去所提的要求;在关内,则因过去所提若干要求已用武力达到,所以主张停战维持现状,6月协议草案中尊重1月停战令的规定也就置之不顾了。

由此可见,双方在军事上的要求,相去实在是相当的远。

我们不能陶醉

我们不必讳言事实,我们不能不继续承认,目前局势仍是在最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固然不希望,南京的商谈仅仅是在和平已抵绝望时的回光返照,但是看了双方在军事、政治上的主张的悬殊,



尤其看到在京沪和平空气盛炽之时，北平却正在举行着规模相当大的军事会议，再加上其他种种足以表明作战准备正在积极进行的迹象，我们实在无法让自己陶醉在和平空气之中。

但是我们也并非不重视这一次和平商谈的复活。无论如何，这总可表示，人民要求和平的心意不能不被重视；这里又表现着在国共两大政党以外，“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一部分好战分子未尝不想公然揭开序幕，大张旗鼓，明令讨伐，并且把一切主张民主和平的人士都看成“尾巴”，把他们斥入冷宫。但是时势的发展使他们不能称心如意地这样做。任何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也不敢公然违抗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的意志，无论怎样狡猾，也不能蒙蔽人民对于真和平、真民主的认识。这件事情确定下来，就使我们对于人民的意志能够得到最后胜利，可以有乐观的展望。

第三方面的领袖们对促成这次和谈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实说，自政协决议被逐步破坏后，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也就跟着日益降低。现在他们是用自己的努力而再建起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只要他们坚持人民的立场，坚持反分裂，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统一的立场，同时加强本身的团结，这地位是一定能继续加强的。这件事对于今后的政治发展不是不重要的。

也许用不着多少天，我们就能够确定地知道南京的商谈的结果如何。假如1月的停战协定与政协的全部决议已被证明由于一方面的破坏而无法复活，那么我们就将看到，局势不只是一时的险恶，而将陷入较长期的僵局了。

最初刊载于1946年10月24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3期，署名公孙求之。



从议场到战场

在南京的非正式的和平商谈尚未开始时，陈诚将军已抢先在北平召开了军事会议。在和平商谈迟迟不进，还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军事会议却已经开花结果了。

东北：政府军三路进攻安东，已于 25 日占取安东；山东：政府军水陆并进，猛攻烟台；平汉线：政府军于 24 日由安阳向北推进，打通平汉线的战事势将大规模展开。此外，苏北、陕北、晋南到处都是烽烟大起。

可是回头看南京。和谈如同难产前的强烈的阵痛一样，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安然生产，或者生产出来将是一个怎样的畸形儿。战场的消息使人苦痛地预想到，南京的商谈大有可能陷于流产的惨境。联合社南京 26 日电说得对：

中国高级指挥方面明显之武力政策，26 日已令第三方面之和平努力湮没不彰。国军采取攻势消息仍陆续传至首都，观察家甚异国民党领袖一方面容许重要军事活动继续进行，一方面则谋与共产党成立协议。……就军事论，战争行动有日益扩大之势。政府方面亦承认国军切实采取攻势，已打破第三方面谋令国共恢复谈判，成立协议之希望。实则和平前途，较周恩来未返京时希望尤少。观察家多以此责任直接归诸指挥军事之大员于非正式和谈甫经开始之日，容许其部下采取新攻



势。

人民本来满怀希望地看着南京和谈的议场，但凝望着议场的目光现在又不得不转向战场上去了。一百声和平的空头诺言，抵不过战场上一颗炮弹的响声。在这情形下，第三方面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希望究竟还能维持多少天呢？

要问一个清楚

但无论如何，第三方面为促成这次商谈的继续努力总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工作艰辛可以由沈钧儒老先生的这个说明中看出：

直到今天(26日)，政府与中共代表尚未正式见面会商，仍由第三方面用各种方式试探两方面之意见，并传达之。昨日起，第三方面人士已发展为分工拜访各代表，务必探询出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各方代表是在21日会集于南京的。但因并无正式会议，故只能算是非正式的会商。第一个星期就是在第三方面奔走于国共双方探询意见中过去了。现在各处战事既已更形猛烈，则今后南京会商的情形殆难有更大的发展。寄语第三方面诸公，你们的努力总不是白费的，因为人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把双方意见探询个一清二白，当我们能够看出“症结所在”之时，人民的力量终于是能够解决的。

我们要问清些什么呢？我们以为，从今年年初的局势发展下来，到了现在，不管好也好，坏也好，是到了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把过去的问题在此时彻底地来清查一下。

在军事问题上，我们需要问清这几点：

(一)今年1月10日的停战协议是开启和平商谈的一个始点，



这个协议中规定“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根据这个停战协议而产生的军事调处执行总部于1月21日发布和字第2号命令，其中指出：“双方部队即日隔离并停止作战，指挥官应采取各种步骤恢复1月13日夜晚12时之情况。”我们要问，国共双方以及参加协议和参加执行部的美方调人是否至今还认为这协议、这命令继续有效？

(二)近数月来，常见提到6月协议的草案，最近政府所提8条中又见提到。但6月协议草案全文至今未见正式发表，10月26日《联合晚报》上透露了一部分，似尚不完全。我们要求全部公开。然后我们可以公开研究何以这些协议当时未能完成，或有些部分完成了又未签字？我们也要问清楚，双方现在对6月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的态度到底如何？

(三)从1月13日以后，双方都曾用武力取得若干地方，政府方面进占的地区更多。现在我们也要问一下，对于武力占得的地区，双方所取态度到底如何？在民主政治下本只应允许各党派在各地通过选举票作政争，而不容许用武力占领。假如现在肯定了由武力之所得不能丝毫让步，那么所谓放弃武力，而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还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四)政府方面从6月底以后即坚持对若干地区的要求，假如不给我，我就用武力来拿。这些地区中，有些部分至今确已经用武力占得，而有些地区——主要在东北，尚未取到。我们不能不问清：现在政府的态度到底如何？

(五)“实行军民分治”，“严禁军队干涉政治”，是政协会中决定的原则。依据这原则，断不能承认某一军队居某地，某地的政治即归它管。军阀的防区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要问清楚双方，是否还承认政协会所定的原则？



我想,以上这几点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假如不承认1月协议,则停战问题已失去根据。另起炉灶再谈,纵然能再谈出个办法,也会马上又被否认,那就永远不能得出什么结果来了。假如过去用武力占得若干地区即认为既成事实,不能改变,而且还企图用武力继续造成新的既成事实,则还有什么和平商谈之可言。假如军阀的防区制还被坚持,那就是民主的地方自治原则被否认,则以武力争夺地方的惨剧势必继续演出,无论什么商谈都是空话。

再就政治上看,也有几件事是至少必须问清楚的:

(一)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是1月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大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至今双方是否还诚意遵守,愿全部执行?自然是必须问清楚的。

(二)按照政协协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改组政府。我们要问清楚,改组政府是否包括改组行政院在内,仅仅改组国府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又要问,改组国府的名额分配究竟如何?国民党只允许中共与民盟占13名,而中共与民盟为保障和平建国纲领不被修改,坚持至少有14名,这问题究竟如何了?还要问,改组行政院,只是国民党内人事的变动呢,还是把某几个重要部门由其他党派担任?

(三)国民大会召开问题显将成为中国分裂或团结之标石。所以必须在此时间清楚,国民大会是否要按照政协决议,在政府改组以后,经过各党派协商然后才召开?片面召开国大就是制造分裂,对这历史的责任问题,是一定要弄个清楚的。

(四)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四项有关实行民主、保障自由的诺言,至今是否尚有效?也是必须在此时间清楚的。所谓“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说得这样明白的话,在事实上从未



实行过。我们必须问清楚到底如何。

(五)和平建国纲领中附记第一项特别规定,“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俟国民政府改组后,依施政纲领政治一项,第6、第7、第8三条之规定解决之”。所谓6、7、8这三条的规定就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县自治”,“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这些规定现在是否还遵守?我们也非问清楚不可。因为这些规定还有效,则地方政治问题才有解决的曙光,否则一定弄成僵局。

(六)关于宪法,双方是否还愿遵守政协会所决定的原则,也是一件紧要的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尤为宪法问题中争论的焦点。政协原则的最主要精神亦即在此点上,此点动摇,全部即动摇,所以也非清楚不可。

由这几点来看,就可知道,原来一切问题若依政协决议,都可迎刃而解。若真停止内战,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则必须走向政协之路;离开此路,空谈和平,终归只是酿成战乱。所以与其另想办法,弥缝敷衍,不如走向政协之路。谁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不愿遵守政协决议,谁就是和平的罪人,是战争的祸首。

第三方面诸公现在在奔走探询,想来一定是会把这些问题一一问清的。

假如双方的确都是诚心遵守自1月以来的关于军事与政治问题的协议,那么和平与民主马上就可按部就班地实现,简直用不到开多少次的会议。反之,假如有一方面硬是不承认过去的协议,那么纵举行几十次、几百次的会议也难有和平的保障。则“症结何在”,便很清楚。谁破坏过去的协议,谁就是阻死了和平商谈的“症结”。在这情形下,除了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打破这症结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



最后一个和平机会

第三方面经过试探研究后，已于10月28日向国共双方提出一和平方案。当记者执笔时尚未得悉此方案的内容，但这方案所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政府方面至今仍坚持其10月17日所提的8条，中共方面也一直坚持其2条原则。8条和2条的距离，记者在上期本刊已加以分析。第三方面不愿承认以政府8条或中共的2条为商谈之基础，所以另提一新方案。这个新方案可以设想是折衷性的。然而无论怎样折衷，第三方面的意见总不会与政协决议的内容相违背，尤其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第三方面除了在政协决议的范围以内出主意，将不可能提出别的意见。假如一切意见无非是政协决议的具体化或引申，则主张照政协决议办事的中共当无加以拒绝的理由。但政府的8条，其内容如我们所已指出的，大多与政协决议相违，是否会因第三方面的力量而让步，实不能令人无疑。

更加表现出第三方面建议之折衷性的，或许是在军事问题上。中共方面要求恢复1月13日态势，政府方面则要求承认“既成事实”，并要求实现过去所曾提出的一切要求。在这两种绝不相容的主张之间，第三方面也许会提出若干既不同于此，又不同于彼的折衷意见。但是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政府方面会同意不坚持其主见而作相当的真实让步么？

自政府军进占了承德、淮阴、菏泽、高邮、宝应、张家口、安东以后，表面上看起来，政府军确是得到了若干胜利。这种胜利正如“塞翁失马”一样，究竟是祸是福，实在很难说。在现在看来，政府方面确已因军事胜利而嗜战的气焰大大高涨。一个政府公开表现了其



对内战的兴趣，难道会有好结果么？甚至如孙哲生氏在10月26日也向南京《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是占领安东不过是因为“共军阻止接收，故国军不得不出动排除阻扰，以完成安东之接收。”我们知道孙哲生氏向被认为政府中之持论较公正者，如联合社南京26日电说：“孙科、邵力子诸氏可信其诚意由谈判获得妥协，而其他国民党分子则以在战场上解决国共问题为最善方略。”现在连孙先生也公然发言，为武力政策作辩护，可见嗜战派的影响确已因占领几个城市而益加普遍了。南京《中央日报》26日社论中，几乎是用恫吓的口气向中共和第三方面说：“这半个月（指11月12日以前的今后半个月）如果再等闲错过，我们便不能不再用血来缔造国家的和平统一。”其坚决要打下去以求一统江山的决心更跃然纸上。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今天上海报纸上所刊南京《中央日报》的广告：“君欲了解国策动向，政局发展，中央意旨，人民公意，唯有中央日报能作最正确之报导与最迅速之反应。”假如广告并非吹牛，则《中央日报》26日的社论已经用一个“血”字把“中央意旨”和“国策动向”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这情形下，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和1月31日的政协决议已不在眼中，第三方面的方案能有多大力量，实难令人有乐观的希望。

于是，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看战场。

从这一次世界战争中，我们已看到，无论在欧洲战场还是在东方的战场上，最初占领得许多城市的方面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所以我们说，3个月来，政府军占得若干城市，是祸是福，尚未可必。拿实际情况看，这几个月来，政府军虽以胜利自炫，但中共方面却也在宣称着，只在7、8、9三个月内已消灭政府军25个旅，10月内又消灭了5个旅以上的兵力。假如政府军愈益增加其所占领的点



与线,只不过供给对方以有利的条件,使更能选择时间与地点来进行其主动的出击歼灭,那么我们实在不能不为好战分子今日的耀武扬威的姿态而兴悲。这一次南京的和谈若竟不成功,则今后的战场显将呈现为一种长期搏斗的情况,一方面是想以点为根据以消灭对方的面;另一方面则想以面为根据以克服对方的点。这样长期战争的具体发展情况如何,我们自难具体估计,但是以一个简单的“血”字就能称心如意地达到其欲望,这种打算是终归不能成功的。

我们不能不向好战分子作最后一次恳切的呼吁。莫要为一时表面的胜利而糊了心肝吧。须知这已是最后一次和平的机会。假如凭着武力取胜的野心而放过这一个机会,则中国人民与中国民族固然要因此而遭遇又一度长期的磨难,但是最后崩溃的决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而只是那与人民为敌,执迷不悟的黠武分子!

最初刊载于1946年10月31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4期,署名公孙求之。



我们面对着一颗计时炸弹

两个国大

在人们心目中,是有两个意义不同的国大。一个“国大”是 10 年以来政府当局所说要召集的国民大会。

民国 25 年(1936 年)5 月 5 日,国民政府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届一次全会的决议,宣布宪法草案。这宪草从开始拟稿到最后宣布,虽经过 3 年之久,但只是在国民党一党的范围内讨论研究。同年 5 月 14 日,国民政府又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依据这两个法律,国民党的中央执监委员为国大之“当然代表”,其余的 1200 名代表虽系民选,但候选人的推定经过极复杂的方法,而且最后是由政府来指定的。25 年 7 月 1 日开始依据这选举法而进行选举,更在实际上表现出包办操纵的种种丑态。国民党中央五届一全大会(24 年(1935 年)11 月举行)本定在 25 年 11 月 12 日举行国民大会,到了 25 年 10 月 15 日国民党中常会议中又决议将国大日期展延。当时共只“选”出了 950 个代表。

这个国民大会的一党的性质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的选举法、组织法是一党制定的,其实际筹备和选举事宜是在一党的指使下进行的,其预定在会议上讨论的宪草是一党所准备的。——因此对于这个国民大会,从 10 年前起,人民都不加重视。大家都明了,



这个国民大会开了以后，一切情形不会和未开以前有什么不同；其唯一意义不过是给国民党的一党政府穿上一套“宪政”的外衣而已。

抗战期间，民国 29 年（1940 年）以后，当局屡次说要召开国民大会以“结束训政”。其所说的国民大会就是按照民国 25 年所制定的格式的国民大会。人民赞成，而且热望国民党的一党训政赶快结束，但反对开那个国民大会，因为知道，那样的国民大会就是开 100 次，也不是真正结束训政。

民国 34 年（1945 年）初，在抗战快结束时，当局宣布在这一年的 11 月 12 日，要召开国民大会了。所指的国民大会依旧是那个国民大会。因此当时各方面曾认为，当局的这个决定是给团结商谈之门堵上了一块大石头。因为当局既然决心召开在一党操纵把持下的国民大会，以产生只利于国民党一党继续执政的宪法，则也就是明白地表示了对其他方面的排斥，决不和其他方面合作以共负国家的责任。

既然国民党的一党的国民大会是无利有害的东西，那么开怎样的国民大会才真正是能够有利于民主团结呢？

今年 1 月的政协会议中，国民大会问题是议题中争论最多的一项。其最后的结论虽然带着妥协性，不能使人尽感满意（最大的妥协即是承认 10 年前的旧代表这一点），但是有了政协决议后，已经很清楚，要开国民大会，就一定要依据政协会议中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程式来开，而不能依据 10 年前的国民党一党制定的程式来开。

政协的国民大会与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大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第一，代表成分不同了。按照政协决议，国大代表扩大为 2050 名。除了 10 年前选出的旧代表 950 名外，还要补加 1100 名。这



1100名由各党派分别提出，其分配办法虽未有成文规定，但当时的口头协定是中共与民盟至少要合占全数（2050名）中的四分之一以上。

但仅仅代表人数扩大和各党派提名，还不能显出特色来，因此，还有：

第二，国民大会的召开要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负责。按照政协决议，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国府与行政院即应改组以成为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政府。筹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事宜自然由改组后的政府来进行。国大代表的人数既已改变，则10年前的旧的组法和选举法已不适用，自然要由改组后的政府另行制定新法，依法召开国大。

第三，提交国大采纳的宪草须经过彻底的修改。依据政协决议，这一届国民大会的任务只是制定宪法。10年前的五五宪草弊病百出，自不能据以制宪，所以政协会中决定了“宪草修改原则”，并决定由政协会组织的“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制成新宪草，以“提供国民大会采纳”。

由这三点看来，政协的国民大会，在精神实质上，是断然和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大会不同的。

所以现在我们想到国民大会，就不能不想到有两个国大。一个是政协的国民大会，只有这，才真正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大路；另一个是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大会，其作用只是延长一党专政，制造分裂，扩大国事纠纷。

假如人们说，要召开国民大会了，我们就不能不看清楚，是召开怎样的国民大会？假如要我们参加国民大会，我们也不能不问清楚，要我们参加什么样的国民大会？

只有政协的国民大会才是值得欢迎的，值得参加的！



停战与国大

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大会闹了10年，一直没有开成。政协决议中规定在35年(1946年)5月5日召开国大，但到期因政协决议各项均尚未实行，召开国大的前提尚不具备，因此经参加政协各方面临时协议延期举行。到了今年7月初，当局突然宣布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到了10月11日又发布国大召开令。

现在我们不能不问：政府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的是个什么国民大会？

我们可以断言，这不是政协的国民大会。

也许有人会说，当局现正在向各党派索取参加国大名单，这是依据政协协议而来。倘无政协协议，自无所谓各党派名单。假如各党派把名单交出来，一致参加，那不就是政协的国民大会了吗？

但仅仅是各方面的人都应召出席国民大会，并不就是政协的国民大会。

第一，政协决议中决定的在10年前旧代表外增加的1100名，究竟如何分配，如何产生？尚未确定。而且在3月间，政府又拟把代表总数再加上350名，则名额分配更成疑问。此时，只由政府片面宣布若干新增代表，并要各党派交出名单，这显然不合政协决议。

第二，各党派现坚持名单只能交给依政协决议而改组之政府，但至今政府尚未改组，在国府委员会与行政院由政协各方协议，依政协决议而改组以前，召开国民大会总是不合政协决议的。

第三，就算是在11月12日以前做到了改组政府，也不能接着就召开国大。因为政府改组后，必须由改组后的政府重新确定选举



法和组织法，并改组国大选举事务所和国大筹备委员会，以进行选举和筹备，那样才能召开合于政协决议的国大。

第四，还有宪草问题，也是待决的大问题。虽然在3、4月间，政协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开过会，但是在若干重要点上都未得协议。《大公报》11月3日载洪兰友氏谈话谓：“此次国大为制宪，宪草将以政协宪草审议会者为蓝本”，但是事实上，在宪草审议会中根本没有制成过什么宪草条文，所谓“依宪草审议会者为蓝本”，只是句空话而已。

就这4点来看，可见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决不是政协的国大，而仍旧只是国民党一党的国大。这个国大并不能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代之以真正的民主宪政，却只是一党专政的继续延长并将在宪政名义下继续延长下去。

各党派、各方面假如都交出名单，参加国大，决不足以改变这个国大的性质。他们将不过是参加对于政协决议的公开谋害，不过是在国民党一党的国大中做陪客，做清客。

也许有人说，既然政府已经表示，只要各党派交出国大名单，即可发布停止冲突令。那么为求能够停战，各党派能委曲一下答应参加国大也罢。

政府当局的这种表示是很容易理解的。其意正是说：我可以答应停战，但你们必须答应参加我的国大，承认我的永远统治的合法地位。——由这，就更可以懂得11月12日的国大的性质确是一党的性质而不是政协的性质。否则，当局也不会以停战来作为诱致各方参加国大的香饵。

但是各党派参加这个国大，难道真能取得和平的保障了？谁都承认，政协决议是走向和平民主的唯一大路。假如各党派都承认这个国大，那就是给政协决议送了终。政协决议死亡了后，中国就将



永不能得到和平民主是可以断言的。

反之，假如当局是真心要停战，那么国大更可以慢开。停战以后，正应该让各方从容协商，共同根据政协规定，从改组政府起一步步做下去，以求开一个真正能代表全国人民，真正能开创民主宪政之远大前途的国大。

直到此时，政府的停战还只是一个表示。假如在国大以前，政府竟主动“发布停止冲突令”，那么我们就更加主张 11 月 12 日的国大应停开，各党派、各方面应坚持不参加这个国大，一切应按照政协决议进行。

假如国大开了……

我们不能不说，政府当局今年 7 月初单独宣布国大日期，实在是做了一件极不聪明的事。因为这一来，彻底推翻政协的决心是已经路人皆知了。到了现在，因为看到中共已决心不参加这国大，所以还尽力拉第三方面来参加，以为只要凑到足够的人数，便可以堂堂皇皇地开一个国大，那就是打错了算盘。

从一方面看，似乎这些都是聪明的打算。因为 20 年来，国民党是在训政的名义下执政，所以连杜鲁门总统也直率地说，这是一党政府。那么在召开国大后，国民党在宪政名义下执政，岂不就可以避免这种指摘了么？但是国大，国大，国大真有这种神奇的作用了？

袁世凯、段祺瑞、曹锟都制造过约法会议、宪法会议，都有过约法和宪法的制定，何尝能改变世界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观感？而且就是在国民党训政期间，岂非也开过国民会议，制过约法么？民国 20 年（1931 年）的国民会议也有非国民党人参加，国民会议中通过的约法也有些不能算不好的条文。至今当局有时还说：国民党政权



是由国民会议所委托,根据约法而施行的。但有哪一个人还记得什么国民会议,什么训政时期约法呢?大家只知道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而已。假如现在举行的还是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大会,则纵有一些非国民党人士“惠然驾临”,顺顺当当地产生一部宪法,但这国民大会及其宪法所能起的影响难道能比16年前的国民会议及其约法好多少么?

有人说,目前时局的关键是在各党派是否交出国大名单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在国民党当局能否悬崖勒马,停开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假如能停开,和平团结就还留着一些生机;假如竟然如期召开,那就是把不绝如缕的生机一刀斩断了。

政协各方面在此时拒绝交出国大名单,坚持按政协的程序办事,这是对的。因为各方面如果一致不参加国大,或许还可以最后使国民党当局迷途知返,不至一误到底;如果参加,并不能改变这次国大的毁坏政协决议的性质,而且将分担其罪名。

没有几天就是11月12日了。我们好像是眼看着一颗计时炸弹就要爆开一样。但是政协协议是绝对毁不了的,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前途是毁不了的。最后我们将发现,这颗计时炸弹所毁灭了的不过是炸弹设计者自己而已。

最初刊载于1946年11月7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5期,署名公孙求之。



十一月八日的新花样

基本方针

11月8日蒋主席颁发“停止冲突命令”，同时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声明。时局引起了巨大的波动。

为了认清时局波动的性质，我们必须简单说明一下过去的形势。

自7月初，政府宣布召开国大日期并节节开始对鄂中、苏北、鲁南、晋南、热河、冀东、绥察以至安东、烟台的攻势后，我们已可看得很清楚，当局所采基本方针不外乎这二者：

第一，用军事力量压倒对方，以完成武力统一；但在军事行动过程中避免形成表面的破裂，不使国际间得到两个交战团体对立的印象，因此就需要边打边谈。此所以在八九月间有非正式五人会谈的酝酿，到了10月里又死拉硬拖地把“第三方面代表”请入南京去进行商谈。

第二，一党专政的政治是要继续保持的，但必须使之穿戴上宪政的外衣，以避免国际间引起恶劣的观感。为此就必须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逐步加以毁弃，因为实行政协决议与维持一党专政是互相冲突的两回事。

这两点说来简单，但可以想见，做起来实在不容易。既然决心



打到底，就是走破裂的路，却又还要谈个不休；既要谈，就不能不承认政协会议的传统，却又偏要做到一党专政的继续存在。这正是当局给自己出的难题目。

这个难题目下的文章本当是如此做法的：在11月12日以前，一面始终继续着无效果的谈，一面已经在军事上取得全盘的胜利，获得一切预期的效果，于是就可以八面威风地要挟各方都来承认片面召开的国大，国大开成则政协决议都成了废纸，一部称心如意的宪法产生，总统“选”出，“宪政”实施，岂不歆叹盛哉！

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

11月12日一天天逼近了。军事上虽然占领得若干城市，但在战场上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相反的，在10月这一个月里，南北战场上损师折将的战果，仍不比7、8、9那3个月较少。9月16日政府所提8点的中心，在于要各方面承认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交出名单，但不仅“第二方面”，就是“第三方面”也坚不承认，拒交名单。10月底第三方面已有退出商谈之意。假如谈判停，战火炽；国大开，分裂显，那就不是原意要做的文章了。进入11月后，第三方面鉴于局势日益紧迫，原来由第三方面奔走探询的方式已无从生效，便建议开政协综合小组或政协会，五方面各派代表进行非正式综合商谈，而中共方面且由周恩来提出政治5点、军事4点主张一起付之讨论。中共与第三方面仍坚持不承认11月12日开的国大，要谈就要根据政协决议从实现停战开始，一项项谈下去。政府方面显然陷入窘态，因为对这提议，假如拒绝，就会造成谈不下去之局，这不合乎其预定的章法；假如承认，就是承认政协决议之有效而否定了11月12日的国大，又不合乎其基本的原则。

所以11月的第一星期间，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周旋应付，却不能使人看出其真意究竟何在。而到了11月8日，一个新的步骤



出现了。

看了8日的“停止冲突令”和“声明”后，我们不能不问：如上所举的两项基本方针改变了么？战事是真的能停下来么？商谈将如何继续下去呢？国大将如何开法呢？政协决议又究竟如何了呢？

真是停战么

在“停止冲突令”中说的是：

务于11月11日正午12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守原防，以示和平忍让之至意。

在声明中更加以阐明说：

兹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需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可以注意这两点：

第一，这是片面的命令，即是未经过协商的。1月10日的停战有一双方签字之协议，6月的休战是双方商定而后分别下令（当时政府拒绝共同下令），这一次却是根本不和对方打一招呼就单独宣布。从方式上看，是一次的效力不如一次。停战协议尚且被弃置不顾，这个单独的命令能有多大效力，能不使人生疑？

第二，这个命令包含着很大的保留。“声明”中说得很清楚，不是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而只是停止“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需者外”的“其他军事行动”。还记得，政府在攻占张家口后，有的将军说，并不是主动进攻张家口，而是“被迫”出此。照这意义说，也许连进攻张家口这样的军事行动都可算做“防守现地所必需者”。

这难道真的是停战么？

再说，倘是真的停战，本不妨开诚布公地商量，如何使冲突停



止下来，并且商订一个办法来使双方前线部队隔离开来以确保冲突不再起，并且还该商定如何运用军事调处执行总部及其各小组的力量，或再加上人民代表组成之军事考察团，以实际保障停战与隔离之实施。这样做，才有希望真能使绵延一年之久的内战停止下来。现在政府方面既有意拖延不去进行有效的停战商谈，却只简单地自己下一个命令，这怎么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呢？

难怪人们这样想，政府之所以突然下停止冲突令，并不是改变其既定的基本方针，而恰恰正是为了拒绝进行有效的停战商谈。

在这一个“停止冲突令”下仍旧保留着在认为有利、有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自由，但却可以用这“停止冲突令”来维持商谈的继续，并且在这“停止冲突令”的掩护下进行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这也许就是11月8日的新步骤的用意吧？

国大如何开法

照8日的声明看起来，当局已决心，假如各党派不来参加国大，国大也还是要举行。

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的唯一的合法步骤，亦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开会。……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关于宪草，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

自此可以看出，当局已决心开一个不是政协性质的国民大会。“声明”中关于国民大会会期的说明是不合乎事实的，那说的是“依照政协会议决议，国民大会原应于本年5月5日召开，但中共与各党派拒未提出其代表之名单，复于7月4日政府宣布国民大会于



11月12日召开，俾各党派可于此4个月期间作一切之商讨与准备”。事实上，5月5日之延期并非由于各党派拒交名单，而是因为按照政协决议开国大之前提条件（改组政府等）当时尚未具备，所以由政府征询政协各方代表意见，共同议决延期，而7月4日政府宣布11月12日之期却是未和任何方面协商，所以11月12日之期根本是不合法的。一党政府真要“还政于民”，唯一有效的（也是唯一合法的）步骤就是遵照政协决议，而不是召开一党的国民大会。现在各党派因为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不是政协的国民大会，所以不来参加。所谓“保留名额”的办法并不能改变这个国民大会的性质，适足以更显出这只是一党的国民大会。而且在这“声明”中也已说得很清楚：宪草在政协会的宪草审议会中并未“未完成”，既未完成，如何能向国民大会提出？事实上，现在国民党内大约已另制成一“五五宪草修正案”，准备先交立法院审定后再交给国民大会去。这样一个宪草修正案自仍如10年前的五五宪草一样，是一党制定的宪草，而谈不到是政协会的宪草。由一党的国民大会接受一党的宪草，固然是顺理成章，但这样的国大，这样的宪草，开成了，制出了以后，继续为各党派和全国人民所一致不承认，一致反对，那是可以断言的。

因为各党派不承认11月12日的国大，拒交名单，所以当局下了这一着险棋，就是你们不来，我还自顾自开。这样做就不怕担上造成破裂的罪名么？他做下了两个“眼”：

一个“眼”是，虽然单独开国大，但仍可同时进行商谈：

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中应出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根据余10月16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停止冲突及今后办法，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整编统



编等方法，以期从速施行。关于国府委员会之改组，望能早日获得协议，俾得正式改组成立。至于行政院，则为实际负责之机构，其改组必须更加慎重。故国民大会未闭会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变更。

另一个“眼”是6个月以后的国大：

此次国民大会闭会以后，6个月内即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普选，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届时均可自由竞选，以产生下届国民大会，根据宪法所规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职权。故各党派在下届国民大会对于宪法如有修改意见，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由这两点可以看出，当局的办法是，不管怎样，我还可以和你们继续谈军事问题，但必须按照我的条件谈；我也可以和你们谈政治问题，但必须按照我的程序谈。假如真照这样谈下去，再谈6个月也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却就此全部安葬。因为照政协决议，举行国民大会只能在改组政府后，而改组政府中必须包含改组行政院。

假如我们真的以为当局召开这个国大，制成一个宪法，是存心在6个月后再为另一个国大所彻底修改，那我们就太老实了。我们还记得，今年7月初，当局一面宣布11月12日开国大之期，一面正在积极布置着在各路大打，其想法未尝不是以为只要4个月就能在战场上打出个眉目。现在的预约6个月后，其意殆亦无非是：咱们等6个月以后“看颜色”！

只有政协路线

假如以上的分析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11月8日的手法虽然是新的，但是仍旧离不开老谱子。简单说起来，这就是：



下停止冲突令，但仍保留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自由；

力避负担造成破裂的责任，但仍不惜单独召开违背政协决议的一党的国大；

继续进行商谈，但一切必须按照“我”的条件和程序，而不按照政协决议的程序和原则。

但是人民上当已不止一次。我们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何至于连这一点手法都看不清楚？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仅仅这样一个停战令，绝不能使人跌入和平梦中。

我们坚决不承认一党的国大。假如他们喜欢开这样的国大，就尽管开去吧。但这个国大与我们人民毫无关系，由这个国大产生的宪法，无论如何不会为人民所承认。将来人民既不会承认它，也用不着去“修正”它。

我们赞成商谈继续进行。但商谈不能与国民大会平行进行，而是建立在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的基础上。商谈必须从如何实现切实有效的停战开始，逐步实施政协决议，以至召开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制宪的国民大会。

我们尤其在这时要提醒当局和各党派参加商谈的代表们，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必须立即兑现。停战也好，改组政府也好，开国民大会也好，假如人民自由没有保障，一切都还是空谈。

我们要的是真和平、真民主。要得到真和平与真民主，除了坚决执行政协会议的决议外，别无其他道路。由11月8日政府的新步骤，我们可以看出，破坏政协的恶浪正向着最高峰跃进，我们希望各党派绝对不承认不合法的国民大会，坚持政协路线。我们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支持政协的路线。我们深信，反政协的一切阴谋终归是一定失败的。



本文付排以后，政府又宣布国大延期3天，改于11月15日开幕，但这是无补大局的。唯一扭转大局之道，只有实行政协决议。离开政协决议的任何方法，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11月12日

最初刊载于1946年11月14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6期，署名公孙求之。



“国大”开幕以后

骗 局

名义上说是国民大会，但“夷考其实”，这不过是个“党民大会”，或甚至是“党官大会”而已。

拿今年1月政协会议开幕后的情形和这一次国大开幕后的情形一对比，就使我们分明地看出，前者因为表现了各党派的团结，所以普遍而热烈地受到人民的欢迎，而后者因为不过是一个分裂的国大，是走向与民主相反的道路，所以一点也提不起人民的兴趣。谁说人民是容易受骗的？国民大会的金字招牌还是骗不了人！

在11月8日的当局声明中，已经表示一党单独开大会的决心。12日延期3天，15日开幕后又无形休会2日，这并不是因为当局还想重走政协的道路而与各党派合作，却不过是故设迷阵，多诱引几个国民党内外拒绝出席国大的分子来帮场子而已。但钓饵无论怎样巧妙，终归只有愿者才上钩。千方百计也只能钓上一些本来有意于吊膀子的人而已。

这次国大的开会，无论在程序上，在办法上，在代表成分上，都是违背政协决议的。这样的国大行了开幕礼，显然就是为政协决议下葬。但是破坏政协者还不敢老实承认。新的花样还会继续来，那是可以断言的。



第一，在宪法问题上，据说还是要通过“政协的宪草”，以表示政府召开这个国大，仍旧是尊重政协，而不是破坏政协。

但这明明只是骗局。第一，政协并未协议成一新宪草；第二，按照政协决议，一定要先改组政府，先使一党专政在实际上结束了，然后再开国大，根据政协原则而另制新宪法。这样，新宪法才能有实际的价值。否则，宪法是宪法，事实是事实，纵有好宪法又有何用？第三，当局8日声明中已预定6个月后可再修改宪法，则此时纵写定一内容较漂亮的宪法也不相干。反正6个月内并不行宪。到了6个月后，武力统一的计划若能全如预期地实现，那就爱把宪法怎样改就怎样改好了。

所以这次国大所制的宪，坏也罢，好也罢，都引不起人民注意。如果坏，最坏也不过是把当前的现实写成宪法条文。如果文字看起来也还漂亮，那也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装饰品，与今日的实际、与将来的实际都不相干。

可以预见，在这个国大中，也会有一番宪法问题的假惺惺的争论。将有一些国民党代表以激烈的姿态发表根本反对政协的意见，而当政者则表示出维持政协的一片苦心，以要求通过一个比较漂亮的宪法。——这样的争论无论装得怎样热闹，无非是戏法而已，那又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其次，在改组政府问题上也还有戏法要耍。一面开国大，一面“改组”国府委员会，这是预定的节目。但是国大已经开幕，内战并未停止，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仍拒不兑现，在这情形下，实现政协的决议的基础都被挖空，高高在上的国府委员会改组一下有何用处？即使行政院也改组一下，让几个闲衙门的职司给国民党外人士担任，也不比王云五荣任经济部长更多一点意义。若干热心做官的在野政客固然可由此得到满足，但坚持不参加一党国大的人



一定也同样坚决拒绝在一党政府中充当陪客和花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的人民更完全看得出来，此时谈改组政府，无论如何，不过是一出骗局而已。

第三方面“拆伙”了么

难道还有人看不清楚这种骗局么？

政协的第三方面中，有不少人本来拒绝参加国大，到最后关头却变了节，这是不是表示他们上了当呢？

并不是的。

谁能说，青年党之参加国大是因为不幸受骗呢？原来青年党混在第三方面中是作为第一方面的代理人的。它的国大名单早已准备好，而且早已交出去了。其所以迟迟不公开宣布参加国大，一方面固然由于面子关系，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所负的任务是要带同全体政协的第三方面，乃至拉了第二方面一起去参加国大。可是因为人们早已识别了它的面目，所以青年党的任务简直没有能完成。起先青年党害怕的是只有它一党去参加国大，有失面子；后来又害怕，不要因为其他党派不参加，连它也得不到插足国大的机会。所以在一等到若干“社会贤达”表示参加国大后，就连忙诚惶诚恐地挤进国大会场去了。

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9人中，王云五、钱永铭、傅斯年本来从未说过不参加分裂的国大的话。还有几位虽然表示过不赞成这个国大，但他们的终于参加，何尝是因为对这国大的信任？《文汇报》南京通讯记载这几位“贤达”在开幕前一日相顾呻吟着：“苦痛呵，苦痛呵”，“明天我们去道喜去吧”。这很分明地表现着这几位贤达，明知他们自己是在干着一件违背良心的事，却只因为软弱无斗



志，遂致自甘屈膝。

以张君勱为领袖的民主社会党，截至记者执笔时，尚在与政府磋商“条件”，但很显然的，他们是已开始放弃民主同盟所一致决定的不参加分裂国大的约束了。仔细检视一下民社党内部，这发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民社党内部既有一部分，本来采取与青年党类似的立场；也有一部分，与那几位“社会贤达”同样地摇摆不定，心中无主。在这情形下，民社党内的少壮派，虽然坚持正确的立场，恐怕也终归难以挽救整个党的堕落。

由此可见，原来属于第三方面的政治集团中确已开始了分化，但是这种分化正是表现了第三方面中本来包含着伪装的分子、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敢用坚决的行动来代表广大人民意志的软体分子。这样一些分子参加了一党的国大，难道能给这国大增加什么光彩么？难道能表示这国大的性质有所改变么？答案只能是：否。这样一些分子离开了第三方面，又难道能表示第三方面的阵容已经溃不成军么？

第三方面之所以为第三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站在国共两党以外的立场上坚持真和平、真民主。像青年党发言人那样，居然说，“停战既已实行”，好像现在全国已经没有内战一样！居然说，只要这个国大通过“政协改订之宪草”，民主就获得一“有力之保障”。这简直是最没有心肝的话，哪里还配称做第三方面！

现在，在政协第三方面固然仍旧保存着坚持立场的中坚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协以外，还有表现为各个政治集团和人民团体的第三方面的强大力量。反动派及其帮手用尽拖、拉、骗的方法来瓦解第三方面，但结果并没有成功。在国民党一手写定的国大名单中也还有百余人不去参加，这并不是件小事情。认真说来，第三方面并没有“拆伙”，经过这次严重的考验，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将



离开政协第三方面的组成形式，淘汰掉一些伪装和不可靠分子，真正以广大人民为基础，而建立起坚强的新的阵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冬天已经来了

冬天已经来了。当前的政治局势，也如冬天的天气一样，凛寒然而明朗。

寒霜遍地，北风怒号，使一切地上的生物都显出了其本来面目，无所遁形。

无效的停战令，分裂的国大，虚伪的改组国府，骗人的空头宪法，针对延安的军事大攻势——政府当局已自行毁尽了政协决议的基础，也就是毁尽了执政党与在野各党联系的纽带，也就是毁尽了人民对政府仅存的一点希望。这是向在野党派——中共与民主同盟和一切真正的第三方面政治势力宣告破裂，也是向人民宣告破裂。

我们马上就可发现，一党的国民大会和伪装的宪法不但不足以得到收揽民心之效，反而是把人民推向绝望的深渊。在国大未开以前，政府还可以拿不久后就要实行政协决议、结束党治来搪塞一下，现在这块最后的盾牌既已经自行缴械，人民对它将采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拖延了10个月之久的边谈边打的局面已经结束。这10个月的谈判是建立在政协决议的基础上的。政协决议既被根本掘翻，谈判自无从继续。在这情形下，只有民主社会党还在和政府当局谈什么实行政协决议。以破坏政协的国大为基础而讨论政协决议的执行，岂非笑话？假如本不过以此来做进入国大和升官的遮羞面幕，



那也不去说它了。但假如真以为可以“与虎谋皮”，那岂非是天真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么？

水落石出，10个月的谈判既然结束，全面的内战将露骨地显出在冬天的原野上。但我们完全相信邵力子最近的谈话，“冬天已经来到，春天不会远了”。也许用不着半年，新的谈判时期就会到来。

问题是，这一时期的谈判的基础既已毁坏，那就非重新奠定一新的基础，不足以再建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

新的基础如何建立，这不仅决定于这6个月的战场上，而且要决定于全国人民争取真和平、真民主的奋斗。

容许我们面对凛寒的冬天作一乐观的展望。今后6个月中，我们将看见武力统一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得到更大的教训；我们将看到，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经过一番动摇和分化，将重新植根于广大人民中而建立坚强的新阵容；于是我们将看到，中国的民主自由的前途经过一次曲折，不过是更向前提高一步。春天会来，而且一定要来！

而这个正在大锣大鼓闹哄哄地进行着的国民大会，在今日人民的心里和将来的历史上所占的地位，难道会比民国3年（1914年）的袁世凯的约法会议和民国12年（1923年）的曹锟的贿选国会更高一点么？

最初刊载于1946年11月21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7期，署名公孙求之。



论“第三方面”

—

当“第三方面”政协代表们被邀赴南京参加和谈时，据说在某一次宴会上，陈立夫先生说：“现在的问题是国共之间的问题，无需乎第三方面夹在中间。”

这话在我们听来并不觉得新鲜。倒或许是因为在公开宴会上，所以话说得还比较含蓄一点。记得在民国30年（1941年），正在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一度最紧张的时候，有位与陈立夫先生身分类似的要员曾向一个文化界人士说：“我们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自命为中间立场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中间不中间。你们要嚷民主，反政府，那就和共产党一路去好了。否则，你们就跟我们来！”

照这种说法，就是“天下不归杨，即归墨”，无第三方面立足的余地。

假如中国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发展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尖锐的情形，只容许两个政党的对立，那么我们自然也只能承认第三方面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中国的局势远非那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以至在相当长期的将来，中国的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还是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的。

为什么？就因为中国不是一个高度成熟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



家,因而也不是把一切政治矛盾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对立上。在中国,一方面有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工人和贫苦农民大众,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广大的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职员、小商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已摇摇欲倒的中小地主……这样许多成分的人构成了这个庞大的中间阶级。

中间阶级在政治上向两极分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可以有加官进禄的可能,中间阶级的分子有的是选择了这一条路。宁可去过穿草鞋的生活,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经历彻底的磨练和改造,与工农无产者共呼吸,共命运,有不少的小资产者是选择了这一条路。尽管这种分化的事实是如此显著,但是终究不是全部的中间阶级都如此地分化了,而是仍旧保留着大多数在中间阶级地位上。

现实的经历对于广大中间阶级的群众是最有力的教师。现实使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断地提高。甚至在中间阶级中的不少上层分子也渐渐地明白看出,不能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走,那是一条死路,个人不能从这里找到真正的出路,国家更不能从这里找得出路。

按照中间阶级本身的利益来说,无论如何,非要求一个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可。但这些都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所能给予的,那所给予的只是殖民地的命运,是内战的灾难,是使人民活不下去的独裁专政。因此能否跳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就是中间阶级能否形成第三方面政治势力的决定关键。假如不能,那就是牺牲了中间阶级的利益而卖身投靠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第三方面。

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反对一党专政与独裁政治,要求民族独



立,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至少能有安定生活的保障,这本来是中间阶级喊出来的要求。近年来,广大的中间阶级群众中更普遍地自觉到这种要求,因此,第三方面政治势力也就日益壮大。

二

由此看来,第三方面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立场。现实使中间阶级普遍地过着活不下去了的生活,现实逼得中间阶级普遍地提高了民主和民生的要求,有着这种事实,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是无法取消的。

近来,常见人们用“第三方面”这名词时,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对这名词的怀疑。根据以上所说,我们以为,应该肯定这名词,因为这名词是代表着一种实际内容的,而且是恰当地代表了这内容。

由此,我们也可以弄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如本文篇首所引起的那种取消第三方面地位的说法,自然是完全错误的。除非他们能使中国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已不存在中间阶级——这是不可能的。或除非他们能使中间阶级对现实毫无不满,他们能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使中间阶级得到所要求的一切——这又是他们所绝对做不到的。或除非他们能用收买的办法来使中间阶级全都服服帖帖,用威胁的办法来使中间阶级都噤若寒蝉——这仍旧是办不到的,因为收买和威胁最多只能对个别分子有效。

第二,也有人认为,既然叫做第三方面,就该在一切问题上,采取既不偏于此,又不偏于彼的立场才行。对于这种说法,民主同盟中也早有人驳斥过了。难道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问题能有什么中间



立场可以采取么？原来，第三方面并不是没有固定立场的，并不是摇摆于二者之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排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争取为中间阶级广大群众所要求的出路，这就是第三方面的立场。越是坚定地站在这个立场上，就越能代表中间阶级的广大群众，也才能成其为第三方面。

第三，假如某一具体主张和共产党相同，是否就失去第三方面地位呢？我们以为，第三方面之所以为第三方面，只看他是否坚定地站在如上所述的他自己的立场上，而不看他谁相同，和谁不相同。从基本上说，第三方面一定是既与第一方面不同，也与第二方面不同的。但在具体问题上，相同或类似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必避免的。试想，在政协中全体一致通过五大决议案时，看起来第三方面不仅与第二方面相同，甚至和第一方面也相同。但是第三方面仍旧是第三方面，因为他们是站在中间阶级的利益的立场上投一票的。

站在中间阶级立场上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于远大的前途和对于当前的斗争方式，是一定不会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中间阶级又必须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合作，才能取得胜利。因此第三方面和共产党，在当前的政治问题上，意见一致，步骤一致，不仅不值得奇怪，而且是必然如此的。

第四，常有人说到第三方面的苦恼。第三方面有苦恼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三方面本不像做媒人那样轻松。担当第三方面的任务是担当一个斗争的任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真正的第三方面。挡不住利诱，受不了威胁，动摇不定，那自然会受到人民的责难和唾骂；坚守人民的立场，那又免不了要受到压迫和摧残。假如既要讨好人民，又要讨好权势，那就自然会永处于“天人交战”的苦恼中了。解除这苦恼也只要一法，只有坚定地站在第



三方面的人民立场上。

翻开这二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如前所说的，在中间阶级的广大群众中，政治觉悟不断地提高与普遍化；另一个事实就是，中间阶级的政治上的代言人（也就是形成第三方面政治势力的首要分子）起伏无常，难得有守贞不贰，全始全终的。

说远一点吧，拿今日“国大”主席台上的胡适博士来看，“五四”当年的雄姿而今安在？在国民党当政的最初几年间，胡适博士岂非也是呼吁人权自由，直斥当政者为反动势力的一员猛将么？岁月无几，江山不可复识！胡适博士此次回国后，对于国内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竟不作一声，自称是回来做小学生，不配发言。好的，但是请问现在已经学到了些什么没有呢？被捧在主席上当花瓶，难道竟一点也不自知羞耻么？

说近一点。青年党与若干政协会中的所谓“社会贤达”，首先大拍卖，使自己参加了破坏政协的一党国大。民主社会党继之，既不顾自己党内正义人士的反对，也不顾民盟的共同约束，更不顾自己对人民、对国家所负的义务，也扭扭捏捏地进了国大会场。这事实使得一般人认为，第三方面政治势力要保持政治节操，甚至比寡妇守节还难得多。

这种情形却又并不是值得惊奇的，无宁说是因为第三方面以复杂而动摇的中间阶级为基础，所以自然会产生这种现象。

第一，第三方面难免没有投机分子加入。这种投机分子本来就是眼睛看着上面，他们之所以作为第三方面而活动，本是为了在中间阶级中造成基础，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专等在取得好价钱时卖身投靠。

第二，第三方面更难免没有动摇分子。因为中间阶级——尤其



是其中的上层分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本是可上可下的。为个人的打算，更增加了他们的动摇。他们能造出各种各样借口以辩护自己的妥协，但是究其实际不过是为了一己的利害，而牺牲了断送了自己的立场。

正因为第三方面中有着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所以统治者常轻视第三方面，以为这班家伙是好对付的。打一下，拉一下，还不是一个个倒在我怀里。

统治者的这种做法，不能说毫无效果。但是他们所企图达到的目的却永达不到。

其目的是要征服第三方面，但是第三方面，只在未被征服时才是第三方面；一被征服，既已不是第三方面。——人民不再承认他们是第三方面，他们自己也羞于自称是第三方面了。

其目的是在消灭第三方面，但是他们忘记了上举两个事实中的前一个事实。广大的中间阶级群众的政治觉悟是像秋潮一样的汹涌，而第三方面的个别人士不过是潮水中的一个小水泡而已。可以消灭一个小水泡，但无法阻遏那澎湃的秋潮！

从这一个月来环绕着国民大会问题的政治纷争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出，中间阶级的广大群众中，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的确已经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所以第三方面中的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无论用怎样的花言巧语来解释其失节行为，也仍旧很快的为人民识破，立即受到人民的嘲笑和唾骂。同时我们又看出，中间阶级中的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所能包办，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也已经锻炼了不少站在第三方面立场上的坚贞不拔的政治斗士，他们能够在大风浪中仍旧把定了舵前进。

因此，对于第三方面的前途一点也不悲观，若干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排泄了出去，不但无害，反而有益。坚强的第三方面新阵



线将通过这次政治大风暴而出现，并在今后的政治局势中占更重要的位置，是可以断言的。

最初刊载于 1946 年 11 月 28 日《文萃》(上海)
第 2 年第 10 期，署名公孙求之。



制宪不如散会

话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氏于12月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特别邀了胡适博士到会向记者解答有关国大及制宪诸问题。胡适博士在他发言一开头特别表明，他在国民大会中面受蒋主席所递给之宪草，这“不过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大公报》）。

这难道真的只是偶然事件么？固然确也并没有怎样“深刻”的意义。用意浅得很，无非是想借这块在美国人中还有点信誉的博士招牌，为分裂的国民大会添点光彩而已。但是在国内，老实说，这块招牌早已在人民心目中黯然失色了。25年前，胡适之是全国青年所崇仰的先驱者。15年前，胡先生也还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敢说话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批评者。但是作为战士的胡适之一天天退色了，尤其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底，翁文灏、蒋廷黻二氏当了高官后，这10年来，在胡先生的笔底，连在他的《人权论集》中的议论也渺不可得了。这10年来，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日渐和广大人民的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更密切地结合，而胡先生却终于拉扯在一党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当花瓶，甚至在国民党宣传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帮场面，这恐怕不能算是历史的偶然吧？

这且按下不表。却说胡适之先生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14日《独立评论》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制宪不如守法》。那时



正是国民党政府开始制定宪法的时候。在那篇文章中，胡先生感慨地说：

这回的宪法草案起草工作需时半年之久，并且公开的征求全国国民的研究与批评，这样的慎重从事，比前年的约法起草与通过时的潦草，自然大不相同了。然而我们观察全国舆论，总不免感觉得全国人对于这回的制宪事业还是很冷淡的，很不注意的，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现在宪法草案的“原则”12项已陆续通过发表了。起草的程序已到了“初稿”的时期了。然而我们观察全国的舆论对于这件事还是很冷淡的，还是很不在乎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国民党的“制宪事业”从13年前开始，到现在国民大会中将告一结束。在开始时，人民的态度是“冷淡”，“不注意”，“不关心”，在结束时，还是一点也提不起人民的兴趣。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虽然现在胡先生站在国大主席台上，站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地位上，已不再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但在13年前，他是提出了这问题，而且给了答复的。当时他的答复是：

我们猜想，全国对于这回制宪工作的冷淡，其原因有偶然的，也有根本的。偶然的原因是在这国难严重时期，大家的注意都在中日问题，所以制宪事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反成了一种不紧急的点缀了。

又是一个“偶然”！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偶然”，正如同胡先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担任这样的角色同样的不是偶然。原来，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东北已被日敌囊括而去，而且冀东被占，平津告急。政府当局对外是步步妥协，对内则大打内战。国民党每次热心制宪总是在时局十分紧急之时，想借宪法空名以敷衍人心，遮掩耳目。13年前是如此，13年后也是如此。这岂能叫做偶



然？13年前，人民因国难严重而不关心一党的制宪工作，也如同今日的人民因为鉴于内战的严重局面，而不关心这分裂的国民大会的制宪工作一样。这又岂能叫做“偶然”？不过13年前，胡先生还看出了这“偶然的原因”，究竟比现在还胜一筹。

除了偶然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这就是人民对于宪法的效能的根本怀疑。我读了报上用5号或6号小字登载的草案委员会的新闻，或读了他们征求意见的广告，总不免微微苦笑，自己问道：“有了新宪法，能执行么？这还不是和民国元年临时约法以来的许多种宪法同样的添一大堆废纸吗？现今不是已有了一部《训政时期约法》吗？有了和没有，有什么不同呢？那一部89条的约法，究竟行了几条没有呢？”

这种对宪法的根本不信任，是今日大家不注意这回的制宪事业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根本不信任，完全是政府自己造成的。我们试分析人民为什么这样不信任国家的根本法，可以得着几种有益的教训。

第一，官吏军人党部都自身不愿守法，所以使人民不信任法律。凡官吏军人党部感觉于他们不方便的法律，他们都不愿遵守。……官吏军人党部自己不愿守法，故不但不许那些于他们不便的条文列入国家的根本法，并且肆无忌惮的违背根本法里已有明文的规定！这样有法等于无法，何怪人民不信任宪法呢？

第二，政府立法之先就没有打算实行，所以立了许多纸上具文，使人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

第三，宪法中列举的条文总是空泛的原则，若没有附加的详细施行手续，就都成了无效的具文。

以上所说，都要指出人民何以对国家根本法绝不生信仰。



此种状态若无法改进，虽有最完美的宪法条文，终不过与天坛宪法、训政约法同其命运！

我们节抄了胡先生 13 年前的老文章，真是“不禁感慨系之”。也许胡先生已经忘记了这些“有益的教训”，或不愿意再记得这些“有益的教训”，但是中国老百姓，特别在近一年间所得教训，比胡先生这段文章中所说的，还要深切万倍！

13 年前，胡先生说：“那一部 89 条的约法，究竟行了几条没有呢？”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政治协商会议的五大决议案、80 条的和平建国纲领和蒋主席亲口所说的四项诺言，究竟有哪一件、哪一条、哪一项是已经实行了的呢？

人民现在对于这个国民大会的制宪一点也不感兴趣，其原因是很清楚的。这个国民大会是建立在破坏政协决议的基础上的，这个国民大会是和内战的扩大同时进行的，是在继续摧残人民自由的情形下举行的。人民对这个国大所制的宪法怎么会有一丝一毫的信任？

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国大之破坏政协决议，不过是在“程序”上而已，无关重要。例如何永佶先生在 12 月 8 日《大公报》上就向拒绝参加国大的“民主同盟的朋友们”说：

你们不来的理由不过因“未完成政协程序”而已。所谓未完成者，国大应开在政府改组之后而不应在前而已。这点诚然是不合政协程序，我想政府对此必有办法纠正的。然你们如斤斤以此为争，则外面会误会你们只是求做国府委员或某部部长，这决非你们的本心，还是来参加，以免此误会为较好。

我们不知道除何永佶先生外，究竟有几人有此“误会”。但事实很清楚，“求做国府委员或某部部长”的都已参加国大，去混资格去了。我们以为，“国大应开在政府改组之后”，并不只是个“程序”问



题。按照政协决议的精神，是应该先行结束一党专政，使人民能够有自由权利的保障，然后才来开国大，订宪法。这本是民主宪政的通例。从未见在人民的手足被枷锁的国家中能由“上面”钦赐一部民主宪法的。正因为国民党当局所作的“结束一党训政”、“保障人民自由”的诺言已毫无信用，所以才必须先改组政府，以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政府来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的实施，保障人民自由之取得，这样才能结束训政，而为民主宪政开道，所以问题不仅是程序，更不能用“面子”来解释！一面内战打得震天动地，一面却在从容议宪；一面钳制人民的口舌，不顾人民的死活，一面却说是我要来给你们一部民主宪法了。事之荒唐，宁有过于此者！老百姓并不想当什么委员部长，但不能不问一问宪法的真假。

请看，每天读报的人，究竟有几个把“国大”中正在讨论着的《宪法草案修正案》逐条仔细读过的？又有几个人每天热心地阅读在“国大”中争论宪法条文的记录？

谁都看得出来，在“国大”中的争论无论多么热闹，也不过是种“点缀”而已。我们早就指出：“可以预见，在这个国大中也会有一番宪法问题的假惺惺的争论。将有一些国民党代表以激烈的姿态发表根本反对政协的意见，而当政者则表示出维持政协的一片苦心，以要求通过一个比较漂亮的宪法”（本刊第7期）。果然如此。这争论正在热烈地进行中。其结果大概还是依照这据说是根据政协决议的《修正案》通过。这番争论的作用也很清楚：一则表示当局的苦心孤诣，大有虽黄袍加身亦所不屑之概。再则向美国人表示，这一来你总不能说一党政府没有实行民主之真心了吧？三则是预为将来必要与可能时再修改这《修正案》作伏笔。

至于这《修正案》拿来当做一篇文章看，固然比《五五宪草》漂亮一些，虽然仍不符合政协决议的宪草修改原则，诸如人民的自由



权利仅予承认而不予保障，行政院向立法院的负责是有条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隐隐然为中央集权留地步。但是仔细批评这修正案实非急务，因为纵然规定得十分好了，还是与实际毫无关系。国民大会开完，宪法制成，内战还是内战，人民还是生活在保甲、警管区、戒严令、拉兵派粮制之下。仍旧用得着胡适先生 13 年前说的话：“这还不是和民国元年临时约法以来的许多种宪法同样的添一大堆废纸吗？有了和没有，有什么不同呢？”

我记起晚清名士易实甫的一个故事。当易做地方官时，每天必亲自写洋洋洒洒的公文。有一天，他写一长告示，谕令盗匪卖刀买牛。观者窃笑。易说：“我本不是要见诸实行，我的用意是要编成文集，传之后世而已”。吾于国大之制宪亦作如是观。谁能相信，一部宪法便能使好战分子“卖刀买牛”呢？

我们并不是对和平民主的前途绝望。我们只是相信简单的历史真理：民主断不会由钦锡而来，宪法只在人民已经争取到自由权利的时候才会是有效的民主宪法。这个国大尽管开得怎样热闹，尽管制成怎样漂亮的宪法，都不相干。事实很清楚，这个“国大”目前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作为内战的掩护，作为骗洋人的戏法，实际上则成了和平民主团结的障碍物。

看了人民的冷淡，看了英、美、苏联舆论都渐渐表示不满，当局假如还想顾点“面子”，实在就应该把这徒然丢脸的国大解散掉才是。即使仅仅为了节省点国库的开支，少增加点通货膨胀，这个国大也不必再开下去了。

胡适之先生在 13 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最后结论是说：

宪政的预备不在雇人起草，不在征求讨论，而在实行法律。与其吴经熊先生们另起新花样的宪草，不如请他们先研究现在已有的各种法律，看看有多少种法令是应该立刻废止的。



(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看看有哪些法律是从来没有执行的;看看有多少种法律是必须编制施行细则方才可以施行的;看看有什么法子可以教官吏军人党部多懂一点法律,多守一点法律。

总而言之,制宪不如守法,守法是制宪事业的真正准备工作。

我们也不妨套用这番老话。——但我们不想说重新研究法律。因为今年1月里“国防最高委员会”已通过48种法令应行修正或废止,但通过自通过,一切还照旧。我们要说:

实施宪政并不在雇人开会。请王宠惠先生们漏夜赶工制造条文,请胡适之先生在主席台上演一出“代表人民接受宪草”的戏,这都于事无补。不如老老实实,先把内战停下来,从头按照政协决议来做,结束掉一党训政,使“官吏军人党部”以至宪警特务乡镇保甲长,再不能在一党专政的护符下合法或非法地为非作恶,让人民有行使其基本自由权利的机会。这也是守法,丢开一党训政之法而守政协会议之大法。而为了表示真是遵守政协决议,就不能不首先把这破坏政协决议的“国大”停止下来。

所以我们说:制宪不如散会。

最初刊载于1946年12月12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10期,署名公孙求之。



当宪法公布的时候

这是什么宪法

在南京的一座建筑得很辉煌的大厦里面，有 1000 多人集在一起喧闹了 40 天，耗去了 100 亿的民脂民膏，于是中国又有了一部宪法。

我说，“又”有了一部宪法，是因为中国并不是没有过俨乎其然地制成而且公布的宪法和约法。袁世凯在民国三年（1914 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曹锟在民国十二年（1923 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等等。

拿这次南京制宪的情形和过去在袁世凯、曹锟以至段祺瑞等人的时代的制宪情形相比较，至少有一点是不同的。

袁、曹、段之流在制造为他们所需要的宪法时，还不得假托一议会制宪机关。例如袁世凯初任临时大总统时，老袁想把制宪权抓在自己手里，他的党羽纷纷主张由政府组宪法起草机关，而当时进步的政党则主张宪法应由国会制定。结果还是从国会中推出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起草委员会进行期间，老袁又屡次想插手干涉。初则争宪法公布权，要求宪法制定后应由政府公布，无结果；继又派了 6 个大员列席宪法起草委员会，陈述意见，以求直接控制宪法内容，却也被拒绝。老袁恼羞成怒，这才用武力解散国会，取消宪



法起草委员会，另行用他自己的党羽组会制订所谓《中华民国约法》。

老袁的手段究竟不算高。他竟不能做到一面当临时大总统，一面又以第一号“国民代表”的身份在制宪会场中直接当指挥者；他又不敢把他自己的党羽所组成的集会叫做宪法会议，而只能称之为约法会议。

老袁痴心妄想把宪法会议作为自己的御用物，根据他自己的意旨制成一部宪法，再由政府，用他自己的名义加以公布。——但老袁竟没有能做到。

这大概也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但历史不留情面。民国三年的约法虽煌煌然标明为《中华民国约法》，民国十二年的宪法虽煌煌然标明为《中华民国宪法》，但是历史上却已铁案断定，那只能被称为袁世凯约法、曹锟宪法，那么这一次的宪法将被称为什么宪法，难道还用得着等“后世史家公断”么？

人民的自由

“国民大会”开过，“宪法”制成，“公布”以后又怎样呢？

试一读这个国民大会中所通过的《宪法实施程序》。

其第一条是：“自宪法公布之日起，现行法令之与宪法相抵触者，国民政府应迅速分别予以修改或废止，并应于依照本宪法所产生之国民大会集会以前，完成此项工作。”说起修改和废止现行法令，我们首先能想到的自然是那些限制和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的法令，这一类法令早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间，已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有48种法令应行修改和废止。实际上，这一类



法令不但并未修改和废止，而且新的法令继续以限制人民自由为目的而出现。但是拿这回公布的宪法来看，其中在列举了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有一条文说：

第二十三条，以上各条所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这也就是说，可以用法律限制人民自由，只要用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的借口。按照这种条文，也许当局会觉得，有关人民自由的现行法令，没有一种是和它的宪法相抵触的吧？

纵然有些现行法令，连存在的借口都不能找到，但好在现行法令的“修改或废止”无妨等到下届国民大会集会以前再做。而下届国民大会又已规定了在三十六年（1947年）12月25日才举行。时间长得很，老百姓，你们以为宪法会给你们自由权利么？你们就老老实实等着吧。

从无数次的经验教训中，中国人民早已完全看明白了，人民的自由决不是政府恩赐的礼物。这个政府的真面目，我们已看得很清楚，它决不会忽然变成了慈祥的“圣诞老人”，把人民的自由装在宪法这只臭袜子里送给人民。

假如政府竟要吹吹打打，使人民为宪法的产生而“庆祝”，那么我们就要问它：人民自由的保障早已是你信誓旦旦的诺言，现在又写在你的宪法中了，那就首先请你兑现，再说别的。否则，就莫怪人民把这部宪法的价值看得连一只臭袜子都不如！



一 年 后

所谓行宪日期的规定，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

照所谓宪法实施程序中的规定，在公布宪法后3月内要由政府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关于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副总统、立法、监察委员的选举与罢免的法律，又在这些法律制定后6个月内选出国大代表及立法、监察委员，这样就已是9个月过去了。在国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又决定宪法施行日期为三十六年12月25日，这就是说，到三十六年12月25日召开“行宪的国民大会”。

政协决议本曾规定在宪法颁布6个月内开始行宪。蒋主席在这一次国大召开前，也曾表示，这次国大开过后，6个月内再“举行全国普选，产生下届国民大会”，以开始行宪。

政协决议固已因这次国大的召开而破坏无遗。但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忽然把行宪期规定到一年之后呢？

原因很简单，曰：军事上无把握。

在三十五年7月初，政府军力经6月休战期间作了一番调整后，已自觉实力充足，所以在那时一面出手在苏北、热察大打，一面则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当时人们已经能看出，这样布置正表示它颇有信心，以为用4个月就可以达到军事解决的目的。无奈事与愿违，7、8、9、10这4个月的战事情况全与预期相背。4个月间，政府虽然占得了若干城市，却丧失了33个旅的兵力。不但没有军事解决，反而背起了些城市的“包袱”，处处感受兵员不足，军力分散的苦恼。而预定召开国大之期却已经到了。

其所以悍然不顾一切而单独召开国大，那倒不只是为了顾全面子，而是因为，战事进行虽未尽得利，但军事解决、武力统一的方



针未变。打完了开国大固然再好没有，开国大再打又何尝不可以？于是在11月8日，蒋主席发表声明，说各党派纵然这次不参加国大，但到了6个月后再开国大时还要请各党派光临。

那时人们已经看出，当局的打算是，再打半年，总可以解决了。11月19日的合众社曾报道，蒋主席于18日出席“收复区绥靖会议”，表示：“政府如以军事解决中共问题，可能于5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不料一转眼间，11月又过去了，11月的前方战况并未因国大召开而“声势大振”。那些“剿共”的兵士们自然是因为太“愚蠢”了，并不知道他们的“代表”正在南京开会制宪，建立“民主”大业，非先靠他们的血肉来完成“统一”不可。11月战争结果是，政府军又损失了6个旅，占领得17个县城，却同时丢掉了15个县城。

12月初，正在南京的国大会议开始正式讨论宪草时，中共方面宣布，战局已开始转变，“国民党军开始转入被动而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主动”。《解放日报》12月5日的社论发出了大胆的号召：

应该采取坚决的行动，争取主动。在可以反攻的地方，坚决反攻；在应当准备反攻的地方，坚决准备反攻；在应当恢复力量的地方，积极恢复力量；在应当准备力量的地方，以适合于当前环境的方法，积聚力量；在国民党军还要冒险进攻的地方，更大胆地在消灭其进犯军之后，尽力转入反攻。

果然，12月里，用不着军事专家也能看出战场上的“苗头”大大不同了。

在苏北、晋西、平汉路的战事失利声中，国大结束了。在这情形下，不能说是把握在6个月内军事解决吧？

据说，国大主席团拟定了三个黄道吉日：就是三十六年的10



月10日,11月12日,12月25日,俾选择其一,定为开始行宪日期。蒋主席于12月23日在“中枢纪念周”中表示:“相信明年11月12日以前定能召开实行宪法之国民大会,吾人更深信本党能保持领导建国工作之地位”。但到了12月25日的国大会议中,爽兴决定了最晚的一个日期——12月25日。

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将军于26日招待国大代表席上说:“明年12月25日为行宪之日,国军是绝对保证行宪者,相信明年此日,国内局势定会澄清”。

不过无论如何,信心是已经由4个月变为半年,而又变为一整年了。回顾11月中旬,相距才不过1个多月,但是5个月的“此期”已经自动放长了一倍。

有什么作用

花了100亿的资本,制成了这一套宪法,究竟可以拿来派什么用场呢?——我们不妨“借箸代筹”一下。

拿来做战争的资本么?——有了这套宪法进行内战就能够理直气壮了么?有了这套宪法,就有了“得胜回朝”的把握么?

固然民国史上有过护法战争。但护法战争却是为了保卫那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专制统治者所毁坏了的法。人民从来不会为了保卫专制统治者的法而甘愿流血。

兵士们从此会自动踊跃打仗,说,我们是为了宪法而战;老百姓从此会自动踊跃入伍,说,我们将为了宪法而战。——难道竟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么?或者美国人从此便可以不必遮遮掩掩,大量贷款、物资、军火,以至军队运来中国,说,我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宪法。难道真能如此么?



假如坦克、火箭炮，以至一切美式装备都并不能使战争的胜利有把握，难道一部非驴非马的宪法就能建克敌制胜的奇功么？

然则是拿来和谈的资本么？——有了这套宪法之后，从此什么政协决议的牢什子就可束之高阁了；从此谁要来谈和，谁就得接受这套宪法。这样说起来，100 亿的资本也还是投得合算的。但真的是如此么？

拿政协决议和国大宪法相比，其轻重差是不待衡量就已显然的。

一个是代表中国一切方面的政治力量的各党派一致协议的，一个不过是一个党（外加上两个自居附庸地位的小党）所片面制成的。

一个是受到各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是广大人民批准了的，而一个很显然地在广大人民中所受到的待遇只是冷淡，不信任。

一个是为国际间所公认的，而另一个则是在国际间，虽是“朋友”也不敢公然为之张目。只看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就已很显然，其基本立场虽是为国民党的政府帮场，但也不得不肯定政协决议，承认政协决议被破坏是不幸的事，反之对于正在热烈进行的国民大会及其制定的宪法不敢提一个字。

也许有人是这样想，片面制成了宪法就是筑成了一个囚笼，谁要和平，谁就得自己钻进这个囚笼。谁不愿钻进这囚笼，谁就只能负破坏和平的责任。这种想法看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是最愚蠢不过的。

因为这个囚笼并不能把任何别人关在里面，却只是把自己关在里面示众，使天下后世看得清清楚楚，是谁破坏了政协决议，一意孤行地发动内战制造分裂！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会怀疑，发动内战者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拒绝走政协的道路以真正结束一党专政，真正进入民主宪政。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会相信一切和平的谎言，除非他自己有勇气打碎把他自己关在里面的囚笼，这就是，取消这部宪法，解散这个国大。（这个国大在“完成制宪”后仍继续存在，一直到所谓“行宪时期”，这正是把这囚笼封锁得更紧了。）

最初刊载于1947年1月1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12、13期，署名叶岚。



如何实现真正的和平

和平是每一个老百姓心坎里的希望。但只是空洞的希望并不能实现和平。一年来在内战的苦痛经验中，使我们更认识和平的可贵，更下定决心要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努力，同时也使我们看出了实现和平是一个艰苦的斗争事业。假如不明辨是非，认清方向，那么我们的善良的和平希望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会为破坏和平者所戏弄。

和平的敌人

和平的敌人是什么？我们已经能看得很清楚，武力统一政策是和平的最大敌人。

主张武力统一的人也自称能缔造和平。蒋主席在去年11月间说：“政府如以军事解决中共问题，可能5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陈诚将军在去年12月底说：“国军是绝对保证行宪者，相信明年此日，国内局势定会澄清”。南京《中央日报》在去年10月间说，“我们不能不再用血来缔造国家的和平统一”。其他许多官方报纸和党官指挥的“民意机关”与“人民团体”，在去年10月11月间狂喊大叫什么“当机立断，戡平内乱”，也无不都是这个意思。这意思就是：用武力扫荡了反对势力，和平统一就能实现。



事实已经证明，武力统一政策是不能成功的。民国以来的经验，最近一年来的经验都使我们明白武力统一政策不但不能给人民以和平，反而正是内战不已的祸根。

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曾耀武扬威，主张武力统一。当时也有些工商界人士和文人学士拥戴他们，以为他们一旦完成统一，就有太平日子可过了。但结果，这些军阀头子一个个都是在造成了连年不断的内战之后，惨败在自己所造成的内战中间。而且武力统一政策和卖国政策、专制政策是不可分的。因为其武力只有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壮大，而使用武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极少数的特权统治者。一旦武力统一政策真能成功，就是整个国家陷于殖民地的地位，而全体人民被镇压在武力下听凭宰割剥削的时候，哪里还容得老百姓过太平幸福的日子？正因此，广大的人民总是坚决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在人民力量的反抗下，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是非失败不可的。

民国 16 年（1927 年）后，国民党当局坚信武力统一政策，又造成了 10 年的内战。抗战结束以后，当局仍不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又使这一年半来内战仍旧继续不已。

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就要有办法来使武力统一政策绝迹于中国。

政协的道路

有什么办法呢？一般说来，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激进的，一种办法是缓和的。激进的办法就是革命，缓和的办法是妥协性的、改良性的。

反对政府，改换政府本是人民所应有的权利。在民主国家中，



人民可以用投票来反对政府，改换政府。但是在统治者握有兵力，以兵力来维持生存，镇压人民，杀戮任何反对者、异己者的情况下，人民常被迫得不能不采取革命的办法。以武力来反对进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政府，推翻它，建立人民的政权——这也是人民所应有的权利。实行这种权利，那就是以革命的办法来争取和平。

我们既然赞颂中国和外国历史上无数次的人民的革命运动，那么我们自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现在没有革命的权利。问题是，革命不免于大量的破坏与流血。虽然可以说，忍痛须臾，来扫清内战、专制和卖国的祸根，建立巩固的人民的和平，并不是不合算的；但是特别在经过了8年抗战之后，中国亟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之时，老百姓总希望尽可能避免采用战争手段，减少牺牲，而实现对人民有利的和平。因此，就要考虑到能否用妥协性的、缓和的办法，来消弭武力统一政策，实现和平。

很显然的，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妥协都能造成和平。向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者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假如用这办法来向统治者乞求和平，那不过是更加强了他的武力统一的信心，更养壮了他的力量——而内战终不可免，和平终不能得到。

能够造成和平的妥协办法究竟有没有呢？直到去年1月底政协会议五大决议案产生以前，人们实在不敢相信有这样妥协的办法。政协决议奇迹似地出现了，而这正是武力统一政策和革命政策之间的妥协，是各党派相互间的妥协，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妥协。

政协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执行共同纲领，实行地方自治，逐步推进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共同召开国大，共同商定民主宪法以实行宪政。这是妥协的产物，因为它确是在各方都作了若干让步下产生的。国民党政府从一党专政，武力统一的政策让步了。共产党从武装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政



策让步了。广大人民虽然对于政协决议中有些地方还感到不满，但也一致赞成，愿意接受，这也正是人民对于政府的让步。由于这各方面的让步就打开了和平、民主、统一的捷径。政府既接受政协决议，自不能再迷信武力统一政策。人民和其他各党派既接受政协决议，自不必去从事武力的革命斗争。

国共两党的态度

但是好的办法虽然有了，没有执行还是空的。一年来，政协决议之所以未曾执行，其责任，很清楚的，只能由国民党政府负。按政协决议原文，一切决议的执行都可由政府操纵，这本是各党派对国民党的很大让步。国民党利用这地位很方便地使政协决议全部变成废纸。国民党之推翻政协，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为去年2月到5月，这期间制造较场口暴行等事件，压制拥护政协的人民力量，并在二中全会中作推翻政协的精神准备，表面上仍和各党派敷衍，讨论宪草。第二时期是在去年5月还都南京以后，那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政协的机构和决议全部搁下，不问不闻。政协综合小组，虽经各党派要求召开，始终不召集。改组政府，虽是最迫切的事情，并不根据原有协议而着手。到了第三阶段，10月以后，已决心片面召开国大，单独制定宪法，也就是把政协决议彻底毁弃了。

看了这些情形，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政府当初接受政协决议，不过是迫于一时之势，并以之做障眼法，其武力统一政策实在并未放弃。当他一步步地毁弃了政协的妥协办法时，自然就越来越强地重操武力统一的政策。去年3月后发动东北战事；6月后，关内各省又发动大战；10月后，已公然宣称要于若干日内消灭共产党，完成统一。而炮火也就弥漫于全国，使得和平的机运渺茫



难寻了。

另外一方面，看一看共产党是如何。在国民党宣布单独召开国大，摆脱政协决议的束缚时，共产党方面就指出，这是国民党宣布破裂。当时人们曾很担心，共产党也许从此要改变方针，另建政府，直接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运动。但是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共产党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并不是革命，他们坚持了数月之久的和谈的两项前提只是：（一）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二）取消国大，取消宪法。国民党当局认为这两条过苛过高，不能接受。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两条实在还是属于妥协的办法，是把目前的局势拉回到去年1月间的情况，以妥协精神来重新实现和平民主统一，不但还不是革命的主张，而且这两条本身一点也没有超过政协决议的范围。设想，假如政府接受中共的两条而开始和谈，其结果也绝不是国民党的政治地位被推翻，充其量仍是政协式的相互妥协让步的局面。对于这样的条件，国民党当局直到最近，仍坚不承认，拒加考虑，这实在是很不智的，难道当局的意思是非逼得中共和人民走革命的道路不可么？

也许有人要说，当局虽然拒绝中共的两条，却也提出了四个愿望以求与中共进行和谈，为什么中共也加以拒绝呢？我们以为，今日谈和，要采取妥协办法，就只有走政协道路。那么，自政协以后，破坏政协的一切行为应当先行纠正，则政协道路才能恢复。假如说，我破坏了政协而得到的一切（包括军事上所占领的地区和政治上所片面制成的事实，如国大、宪法）你都得承认；而你所得的一切，如何处理，我们可以来进行和谈，商量办法，这怎么能叫做妥协呢？政府于12月24日所提出的四点实在就是这种内容。这四点是以武力统一政策为背景而提出的，自难希望由此建立和平。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于12月29日发表了声明，又一次拒绝了



中共的两项提议,并把和谈断绝的责任推归中共,宣布将继续进行“求其在我”的一套做法。这一来,就更加清楚,是政府有意把回返政协的和平的大门紧紧关闭了。

上面所说的妥协的和平办法,自然要有关各方都愿相互让步才能实现。国共两党是主要的两方,他们如果都愿按照政协路线而让步,妥协的和平就能实现。如果都不让步,各走极端,一方面坚持一党专政,武力统一,一方面采取武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政策,那么要靠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来把时局的发展纳入政协的和平的轨道上去,那就简直是困难的事了。所幸的是,现在一方面虽用武力统一政策关闭了和谈的大门,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改变他所提出的作为和谈基础的两条缓和的建议。在这情形下,政协的和平仍可以有恢复的希望,从而我们也就知道,在今天来致力于和平运动应该从何着手了。

所谓“和平运动”

于此,我们愿一谈最近在上海王晓籁先生、吴蕴初先生等 80 余人所发起的“和平运动”。我们从报上已看到这一运动的《发起宣言》(1 月 27 日报载)、《公约》(1 月 31 日报载)和《发起人对时局的书面谈话》(2 月 2 日报载);也看到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团体和若干从事和平民主运动的先生们对这“运动”的批评文字。在此烽烟遍地,民不聊生之时,起来主张和平,自然是适应全国人民的希望的。这一运动之所以引起批评,首先是由于它的性质和目的令人怀疑。这 80 多位发起人中固然有不少是社会知名的正派人士,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过去对和平运动都是毫无表示的。在去年 6 月间,上海市民为要求和平而作盛大运动,并且赴京请愿代表在



下关被殴打时，他们也都充耳若无闻。甚至有若干位还曾参与过以工商团体名义通电要求政府戡乱的行动。到了现在，正在政府当局军事上感到困难之时，经过某方授意忽然出现了这一和平运动，而其屡次表示的内容又空洞玄虚不着边际。去年6月，和平运动的代表被殴打，而现在，这一个和平运动的一切文件却能由官方通讯社、报社代为传播。这样，这个运动在热望和平的人民中自然就占不了重要位置。因此，民主建国会首先向这一和平运动发起人建议，“对过去以工商团体发表之主战电文应予否认，以一新全国之耳目”。

至于这一运动所表示的意见确有很多不可解的。其所标榜的主张有所谓“不算旧帐”，“不问过去是非”，“不偏袒的”，“不作政治企图”等谈话，他们似乎以为有了这几个消极限制，才显示为“大公无私”、“纯洁精神”的和平运动。其实有这几个消极限制，这个运动简直成了毫无意义的一堆废话。

以言“不算旧帐”。假如目前业已实现政协的和平，各方已经团结一致，共同建国，那么提议不算旧帐，不念旧恶，那倒是很合理的。但目前局面之险恶正是旧帐的积累，不加清算，如何能转危为安？而且算起旧帐来，并不全是坏事。拿国民党方面说，破坏政协，发动内战固然是坏的，但签订停战协定，发布四项诺言，承认政协决议，却是极好的事。主战者不识好歹，自行毁弃其荣誉的历史，假如人民也帮腔喊不算旧帐，那就不是“君子成人之美”，而是“成人之恶”了。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虽都被毁弃，但其道义上的价值至今虽反动派也不敢公然否认，今若在“不算旧帐”一语下轻轻把这“旧帐”抹掉，这岂非正合了好战派的心眼？

既然“不算旧帐”，自然无从问过去的是非了。但不问是非而欲解决国事，岂非笑话？假如说，过去的是非问清了反而解决不了当



前的国事，谁也不相信。若谓，过去的是非问不清楚，所以不问，但事实上明明是问得清楚的。合于政协路线的为是，不合政协路线的为非。问清了是非之后，就如张志酥先生所说，“是的，大家拥护它，非的，大家都鄙弃它，那么为大家鄙弃的自然就失败了，这纠纷就自然解决了，和平就可以实现了。”不问是非岂不正是帮助为非作歹者了？

“和平运动”发起人又加以掩饰说，过去的是非虽不问，但今后的是非是要问的。其所谓“过去”与“今后”的划分界线，就是1月26日。这的确如施复亮先生所批评的是“可笑”而“狂妄”。为什么1月26日有这样重大的地位，以致在这以前的是非可以置之不问，以后的才需要问呢？因为在这一天上海有80几位先生发表了一个“和平运动宣言”！这种说法简直是拿国事开玩笑了。

再说所谓“不偏袒的”，亦即所谓“超党派的”，照他们自己解释是，“无论偏袒任何一方面，均足以鼓励战争而不利于和平”；其所以不问是非，或许就是为了不偏袒任何一方面。但我们以为，问清了是非就有公平，如民主建国会宣言所说：“有公平始能有和平”。如果真是公平，就不能认为是偏袒。为避免偏袒而不问是非，宁愿不分皂白，实为吾人所不取。我们愿直率地说，以国共两党目前态度来看，倘若双方已各走极端，一方主武力统一，一方行武力革命，则工商界人士既不愿同情前者，又不愿参加后者，则置身事外，力求不作左右袒，是很自然的。但若一方行武力统一，一方所要求者仍只是政协的和平，并不求以武力推翻对方，只求公平合理的妥协，则我们自然同情后者而反对前者。这不是左右袒，而是拥护公认的是而反对公认的非。假如明明有是非可分，而不去分辨，那倒恰恰是左袒了非的方面。所以施复亮先生评之为“貌似公正无私，实则偏袒一方”，是“偏袒政府，偏袒破坏政协道路的反动派”。



最后说到所谓“不作政治企图”，那也是不合理的话。既然是和平运动，对国事发表意见，那就是一个政治运动了，岂能说无政治企图？从实际政治活动中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人士一定光明磊落地表示他们的企图是什么，而那怀着丑恶的企图的政客却总是表白他们无企图。我们自不认为列名于这运动的 80 余位先生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相反的，其中大多数确是纯洁善良之士，他们实在是怀抱着为国为民的好企图的，但善良的先生们不幸而参加到这个自称无企图的政治运动中，恐怕最后是要大呼负负的。

爱国、民主的和平运动

这个只有消极限制而无积极内容的和平运动，自然提不出任何有效办法来促成和平。

但我们看清楚了一年多来政治形势和内战经过，我们可以看出来，和平仍是有望的，是有促其实现的办法的。

什么办法？就是要用更多事实的教训来使得迷信武力统一政策者觉悟起来，使他们明白，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不可靠的，人民是不会百依百顺地纳粮、缴税、应役来帮助他们打仗的，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是一定要一败涂地的。沉迷于武力统一政策中的人是除了事实以外不会接受任何教训的，那么让人民用事实警告他们，假如还不及早回头重走政协的道路，那么将来会连要求一个妥协式的和平也不可得了。

于此我们得一明确的是非标准，凡是助长武力统一政策者为非，凡是阻止武力统一政策而恢复政协路线者为是。迷信武力者总是寄其最后希望于帝国主义，不惜牺牲一切国权来乞怜外国，所以



争和平的运动和爱国运动是不可分的。武力统一政策者的目的是恋恋不舍于其专制统治的特权地位,所以和平运动又与民主运动不可分。靠人民的力量广泛地发动民主的和平运动,就一定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最初刊载于1947年2月6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18期,署名叶岚。



迎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时期

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就是爱国民主运动继续兴起的历史。全部历史中的起伏曲折固然很复杂，大体看来，我们可以指出过去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曾经经过三个高涨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 20 世纪的最初 10 年间，也就是从辛丑条约的订立到清朝覆灭之间的 10 年（1901 到 1911 年）。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前，清政府已经对外屡次战败，订立了一次次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得寸进尺地瓜分中国的权益，清政府的“宁送外邦，不与家奴”的政策也已十分显著。虽然如此，直到庚子之役后，人民才普遍地认识到挽救危机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到这时期才在国内国外取得广大的群众基础，国内各大城市中才普遍发生爱国性的群众自觉的运动。在这以前，谈救亡爱国的多半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我朝”的“恩泽”，“今上”的“贤明”。到这时期，爱国运动就和反清的民主革命运动渐渐地不可分了。如当时上海的士绅商学各界曾屡次举行爱国群众会议。1903 年，因清政府与俄国帝国主义订新约，上海举行拒俄大会。是时桂抚王之春有借法国钱，用法国兵来“平乱”之议；上海又举行大抗



争,通电全国,主张罢工罢市,驱逐王之春。对于这种爱国运动,满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呢?商约大臣函告苏抚恩寿说:“上海租借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章太炎、邹容等即因此而被捕。1905年由于美帝国主义排斥华工,上海、广州、天津、河口、厦门、福州、牛庄各地商人发动抵制美货运动,这一个运动在当时居然能爆发,的确表现了爱国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美国政府抗议,将以舰队示威。清政府电令各地,严厉制止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人民的爱国自救,政府的媚外取宠,对立的尖锐已至极点。终至1905年后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各省爆发了反抗政府借外债办铁路,送利权给外国的运动。清政府在这几年间虽厉行立宪来粉饰,但在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下原形毕露,苟延残喘也不可能了。

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五卅”运动,仍可视为其继续发展。北洋军阀的统治由袁世凯传授下衣钵,而袁世凯就是继承满清的卖国政策的。但因为袁借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登台,人民一时还看不清他的面目,还有错以为他是开国的华盛顿的。四年(1915年)他居然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借外力的帮助进行内战,帝制自为,这才激起了爱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继袁之后,更完全倒在日帝国主义的怀抱里,一心借款、借军械从事内战,对于一切卖国条约都表示欣然同意。“五四”运动的爆发显示着爱国民主运动高涨、澎湃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开始是北京学生向卖国贼的示威运动,因政府以武力镇压而发展为罢课,普及到全国各地,工商各界纷起响应。



北京总商会，立誓不买日货，断绝中日间工商业关系。6月间，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界联电北京，请惩办国贼。京奉路唐山及京汉路长辛店工人也举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于7月接受日本的要求，通令禁止抵制日货运动。爱国运动在以后几年中仍在各地继续发展，到了民国14年又因“五卅”惨案而大爆发。帝国主义者当时因看到北京政府镇压人民无效，便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自己动手，屠杀人民。各地罢工、罢课、罢市，群众示威游行，规模比“五四”时又大得多了。6月10日，北京的群众大会，11日上海的群众大会，到会的都在10万人以上。继之并爆发了坚持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向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威力。这时北京段祺瑞政府以赤化加罪群众运动，以暴力压迫群众运动，无所不用其极。这更使人民的爱国运动和反军阀统治的民主斗争结为一体分不开来。当时人民斗争的口号就是孙中山先生所遗下的“推翻军阀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谁都已看清楚，这个军阀政府是依靠不平等条约而为帝国主义所使用的工具。十四年的年底，在军阀直接统治下的上海和北京甚至都举行了反段示威大会。次年的“三一八”惨案，就是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的一个可耻的记录。在全国人民对于卖国贼的愤怒之下，北洋军阀的统治不得不崩溃。

第三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以后。1931年前，由于国民党政府连年进行“剿共”内战和国民党内部各实力派间不断纠纷，纵容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日盛一日，民族大危机本已在预料中。在“不抵抗政策”下，沈阳事件发生后，上海学生与工人首先发



动反日运动。9月26日,上海人民反日大示威,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京沪一带学生首先到南京请愿抗日,北平学生也不顾一切艰难,南下请愿。教育部通令禁止请愿。12月间各地学生在京受到武力对付,有当场被击死者。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是压不下的,次年1月就发生了十九路军与人民共同抗日的淞沪战争。淞沪之战失败后,亲日势力更占统治地位。我们现在还可以很沉重地想到那几年间人民在窒息与重压下的苦痛。内战继续不已,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势力一天天深入,其他帝国主义也从中渔利,分我一杯羹。政府天天高喊“安内攘外”,拿些永不兑现的宪政的空名敷衍人心。但在这期间,人民仍在苦痛中作着挣扎与奋斗。反对内战的运动,保障人权的运动,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运动,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的运动,反对妥协不抵抗的卖国政策的运动在重压下继续展开,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入而愈益普及到各阶层。到了1935年1月里,日本的广田外相发表《中日经济提携》演说,谓中国倘能制止排日及抵货运动,日本政府便将予以人才物质上的援助和全面的经济合作。2月间国民政府下令“取缔排日”。6月里发生“新生”事件,只因《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政府竟徇日方之请而封闭《新生周刊》,处编辑人以徒刑,并且发表《敦睦邦交令》,说是:“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由此可见当时情况的恶劣。但其实,这种情形却又正反证了当时人民的爱国运动已经高涨到沸点,势将一发而不能遏制。就在这时,“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全国各地学生都冲破了禁令而响应,“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于此时产生。政府虽即宣布施行戒严,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并在各地逮捕爱国的学生和领袖也无效。因为这时爱国民主运动已经是极广泛的群众大运



动了。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不抵抗政策不得不放弃，内战不得不停止，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不得不放松一些。抗日民族战争是“一二九”以后的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所争取得来的。人民在抗战8年中的奋斗正是抗战前的救亡运动的继续。

新的时期

过去中国人民已经奋斗过了三个时期的爱国运动，现在我们是又进入了爱国运动的一个新时期。抗战虽已胜利，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美国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的内战，和中国订立了比二十一条更加凶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派遣海军、陆军和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实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大量的美货倾销在中国，使民族工商业不能抬头。1935年日本广田外相所提议的“提携合作”（其实就是全面的控制），现在美国已开始完全可以做到了。面临着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甚至是比过去的三个时期中更加严重的。

回顾过去三个时期的奋斗史，我们可以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这时期中更勇敢的前进，克服这危机而最后达到独立自由的目标。

由过去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爱国运动是一个极其广泛的人民运动。只要人民看清楚了民族危机的真相，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真面目，广大人民是一定奋不顾身地从事爱国的斗争的。以觉悟程度来说，在清政府的愚民政策的统治下，一般人民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自然要算很低。但是清统治者想以假民主来欺骗，以铁路国有政策来蒙混，总不能改变人民的观感。人民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卖国政府，这不过是把国权民利奉送给洋人的政



策。固然最初能明确认识的常只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每次的爱国运动中,学生总是做着勇敢的先锋。但学生并不是孤立的。当学生运动和工人、商人、农民以至社会各阶层的市民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最伟大的力量。

拿现在的情形来看。在一年前,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很多人看不清楚新的民族危机的到来。但到现在,由于内战不停止的事实,由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不断增加的事实,由于工商业崩溃的事实,由于美军暴行的事实,已经使每个人都看清楚了中国所面对着的是何等可怕的命运了。民族的危机是在加速度地到来,已经有过丰富经验的中国人民的认识也在加速度地成长。今年年初开始的各地学生的抗暴运动,是群众的爱国运动总爆发的信号,工商界和社会各方面已经在迅速而广泛地进入这运动了。

民主和爱国

爱国运动是人民的自救运动。人民的爱国运动总是先向统治者呼吁请愿。呼吁,不理;请愿,被屠杀。这才不能不转而谋自救之道。于是统治者就加以诬蔑,施以压制。清朝官僚称爱国者为“所谓热血少年”,加上“实则希图作乱”的罪名,这几乎成了一定的章法。但爱国运动难道是压制得了的吗?过去的历史足够证明,统治者公开镇压爱国运动,正是把他的最不齿于中国人的罪行表白了出来。一个压迫爱国运动的政府就是自己断送了命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是前车之鉴。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在这点上聪明的,在最危急的时候改变了方针,采取人民所一致拥护的抗日政策。只有其中汪精卫等一部分势力自甘堕落,坚持走和人民爱国运动相反的路,蒙了万劫不复的耻辱。由这也就证明人民的爱国运动



的意向确是不可违抗的。

统治者也知道爱国的潮流是不可抗的，因此统治者总想竭力把爱国口号抓在自己的手里，但人民不看口号，而要看事实。清统治者之运用义和团本是想证明自己是爱国政府，但结果反使他的卖国本质更加显露了。北洋军阀政府自以为是国际公认的“合法”政府，便自命为国家的代表，凡反对它的都被称为“国贼”。但谁都清楚，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之所以为“合法”总统，不过因为他们愿意卖国求荣，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也就乐于承认他们。今日的国民党政府，无论如何在抗战8年间并没和汪伪组织同流合污，这总要算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但是须知道，20年来，不光荣的记录已足够多了。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只有跟着我来，才算是爱国，反对我的，就是叛国”呢？

无论如何，中国人民所要爱的国决不是卖国者的国。卖国者把国家主权拆散了或整批地出售，他有什么国叫人民爱呢？人民要爱国就一定要使国家从卖国者的手里回到人民的手里。所以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不可分。专制统治者想把民主主义者说成是“捣乱国家”、“破坏国家”的罪人，但事实上，广大人民在爱国运动中，同时也一定是站在反对卖国统治者的民主运动中的。过去和今天的现实都证明，凡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定是爱国主义者，凡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一定是民主主义者。专制统治者捧着国家的名义来压制民主运动，从来没有能成功过的，因为当他自己的卖国面目一暴露时，就把全国广大人民推向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阵营去了。

一定能够胜利

虽然有帝国主义力量的参与，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



压不倒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固然是极其强大的，但是当前的世界形势，比起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有利得多的。辛亥以前，不用说，那还是全世界人民力量比较薄弱的时候。“五四”时是帝国主义混战时期。“五卅”时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抬头压制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时期。抗战前虽然国际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正在组织中，但还没有足够力量抵消绥靖主义的帝国主义。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势与过去都大不相同。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革命力量的生长对比起来，帝国主义势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低。美国帝国主义者正以其帝国主义政策而在国际上走向孤立的地位，决不是如所妄想的那样走向统治世界的宝座。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客观条件，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有利得多。

当然，决定中国人民胜利的基本因素，是人民自己的力量。回头看过去三个时期的爱国运动，我们完全相信，中国人民是有这力量取得最后胜利的。我们不能因为至今还没有实现独立和民主，就以为过去三个时期都是失败了的。拿辛亥革命以前看，当时所有的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环伺中国四围，固然它们相互间有矛盾，但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自救运动，它们未尝不能一时协调而实际上瓜分了中国。落后中国的人民斗争力量出乎它们意料的强盛，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它们所培植好了的清政府这工具，眼看着它在人民力量下崩溃。同样的，在北洋军阀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甚至直接用自己的武力来屠杀人民，威吓代表人民的革命势力，但也无救于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力量有时而穷，而它所扶植的工具是太腐朽了。至于“九一八”以后的爱国民主运动，取得了发动抗战的成功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那更不必说。

现在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力量，固然决不是辛亥以前所可



比拟,也已不是“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九”的时候可比的了。新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信号已经高举,对于最后胜利的终将取得,我们是一点怀疑也没有的。我们一定要能做到使帝国主义势力退出中国,使依靠帝国主义而生存的势力不再能立足于中国。

让帝国主义及其代理工具再一次发抖吧。中国人民勇敢前进,迎向这爱国民主运动的新的时期!

最初刊载于1947年2月27日《文萃》(上海)
第2年第21期,署名公孙求之。



从学生运动中所看到的

学生运动往往是中国政治上的精确的晴雨表。看学生运动，就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气候”。

继承着“五四”、“一二九”的精神，现在全国青年学生又以空前的大规模进行着他们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实质上正是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地区内，人民求解放、求生存的斗争进入新高潮的象征。

这个青年学生运动目前仍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挠，也可能遭遇到若干挫折，但是我们可以断言，正如过去历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一样，这一次的学生运动也一定是能够和其他方面人民（工人、店职员、农民）的集体斗争相结合，而展开广大的前途，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

在前年（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民主和平运动中，在去年（1946年）5、6月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运动中，青年学生都曾担任了先锋和主力的角色。尤其到了今年年初，在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和美国对华帝国主义政策原形毕露之时，各地学生首先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的大运动，这更表示，新的一代的学生运动是像巨人一样地挺立起来了。

蒋介石政府做贼心虚，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人民所痛恨的，尤其害怕青年学生首先站起来喊出反对的声音，所以它



一面大打内战，一面在它统治地区内，封闭民主报纸，封闭刊物，禁止集会，监视民主人士的活动，加强警管区制，用打手政策来恐吓人民，秘密逮捕，制造恐怖，而对于青年学生的防范更无所不用其极。大批的特务打手被派遣到各学校中去，在学生群众中进行分化，制造恐怖。各校的负责人曾被召集起来专门研讨如何防范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又搬弄些什么“爱国护权”的空话，想把青年学生带上反共、反苏、反民主的路上去。中学毕业生的会考制度忽又要恢复，其用意也还是要以繁重的功课来使学生不敢动弹。所以虽有许多教育家从教育的理论与实际上申论会考制度的不合理，国民党教育当局却毫不理睬，一意要执行，以至引起各地中学生纷纷起来反对。

一切蒙蔽、欺骗、压制都无效，中国的青年学生终于在5月的阳光下，用集体的声音喊出了他们所要喊的和全国人民心头所要喊的声音。

事实上，在5月的学潮以前，继今年年初的抗议美国暴行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各学校的学潮，可说是此起彼伏，从未断过，不过每一次学潮都起于各自不同的特殊的原因。到了5月初，各校学潮仍带有个别的性质，如英士大学学生之反对校长要求迁校，交通大学学生之“护校运动”，反对缩小该校编制，沪江、之江大学学生之因反对取消积点制度而罢课。但是这各个不同的学潮显然是发生在一共同的社会背景上。所以一到了5月中旬，中央大学学生以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要求提高学生的公费待遇而游行请愿后，立刻这要求就成为全国各地学生一致响应的口号。上海各国立学校学生于17日成立联合会，综合提出四点要求：

- 一、要求增加公费数额，按必需之营养标准，以物价指数计算；
- 二、要求普遍增加公费生名额；



三、要求增加教员待遇，依照物价指数支付；

四、要求提高全国教育经费至国家岁出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五。

在他们宣言中提出目前国家的情形是“混乱动荡恐怖的威胁，反而比抗战时期更加严重，教育已面临总崩溃之一日”。他们又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豪门政客操纵着国家的命脉”（上海《文汇报》5月18日）。他们所提出的总口号是“抢救教育危机运动”。教育危机和整个国家的危机是不可分的。所以北平学生进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六个大字是何等鲜明地反映出了当前中国人民的生存斗争的目标！北京大学学生且提出六项要求，为这“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作了注脚：

一、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

二、清算豪门资本，彻查救济机关；

三、提高教育经费；

四、恢复政协路线；

五、停止征兵征粮；

六、实现蒋介石的四项诺言。（同上）

所以很清楚地，在目前的学生运动的要求中至少反映着这三件事：

第一，反映着在国民党统治下教育的崩溃。国民党办了20年的党化教育和愚民教育，在现在已充分证明，他哪里是真心办什么教育！中央大学教授会宣言中指出，“政府怎样忽视教育，可从国家预算中找到事实的证明”。原来据政府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数字，“总教育文化费”最多只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四点五八，最少时只百分之一点八四。而在这样可怜的教育经费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充作党团的训练经费，最多的时候是在34年，竟占教育文化经费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这个数字确已足够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



是如何糟蹋着、摧残着教育了，更不用提那一切党化的措施对学校中自由的讲学与研究的残害。

第二，这里又反映着在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的统治下，人民普遍的贫穷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了。在抗战期间，教授、学生、工人、农人、公教人员生活也困苦，但大家知道这笔帐追根究底该由日本侵略者负责，所以大家咬紧牙关争取胜利。到了现在，内战扩大，经过2月和4月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大票满天飞，物价拼命涨，这笔帐又该向谁算呢？人民已经能清楚看出，该负责的就是盘据在南京的反动统治者。上海学生大声地为人民唱出了胸头的积愤：“物价天天高，饭也吃不饱，物价高啊公费少，我们啊都要饿倒了。要吃饱啊，嘿，到南京去要！”（上海《联合晚报》载上海学生18日游行时所唱的歌）

第三，这里更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国民党靠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放手发动内战，在前方遇到了解放区军民坚强的自卫战争，10个月来损失90万人的兵力；在后方又一意孤行，不惜造成广大人民的饥饿，引起了普遍各地的米潮、学潮、工潮。武力统一的梦想是注定要破产的了。蒋介石政府的策士们还想用诡辩论向人民说，要反对内战就要反对战场上的两方面，但人民对内战的责任也已看得很清楚，学生代表了广大民众说，反对内战就是要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人民的一切灾难就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统一政策所造成。

反对党化教育，反对使教授、教员和学生都饿死的国民党教育政策，反对养肥四大家族而使广大人民贫穷、饥饿、活不下去的反动统治，反对媚外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统一政策。——这就是当前学生运动的斗争目标。

这一次学生运动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同时发动，规模之大，参加



学生人数之多,在中国学运史上可说是空前的。许多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都同情学生运动,直接间接支持学生的要求,这种情形也可说是前所罕见的。同时一般社会对学生运动更是普遍表示同情,例如南京学生游行时,市民纷纷给送茶水。这一切在在都说明当前的学生运动是纯洁的爱国青年的运动,是和国民党统治下广大人民的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相应和,且为之作先锋的。

国民党当局在看到学生运动已压抑不了、欺骗不了而爆发起来的时候,起先的确有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是假如以为这班狡猾而又狠毒的统治者真的会很快就在人民群众力量前自认失败,那就错了。5月18日蒋介石发表所谓“整饬学风,维护学纪”的谈话,同时所谓“国府委员会”通过了什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按照这办法,人民连“请愿”的自由都被剥夺,动辄就要受到武力的制裁和刑法的处分。果然到了18日以后,南京、平津、上海,在学校中,在街头,特务军警开始以暴力对付爱国的学生了。流血惨案相继发生,“失踪”事件不一而足。这算是实施了蒋介石谈话中所说:“国家何贵乎有如此的学校!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在这两句话里是显得再分明不过了。

在学生方面,很显然的,既不是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而残忍的恐怖手段所吓得倒的,同时,他们也并不是抱着轻率的成功希望而投身运动中的。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发言人在5月20日的大游行示威后,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知道政府不会为了我们的要求便停止内战,但至少我们已说出要求停止内战了。我们说出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由此可见,青年学生对于前途必将有种种阻挠和艰难是完全预计到的,他们是英勇无畏地面对着并不是短期的奋斗过程。

中国青年学生有着从“五四”以来历次爱国救亡运动的丰富经



验,这一代学生多半又直接参加过从抗战结束以来的民主和平运动。他们用集体的智慧一定能够通过险恶的风浪而继续向前,他们将既勇敢而又机警灵活地对付统治者的一切卑污手段,一方面保持学生群众内部的团结,继续坚持着旺盛的青年朝气,使分化、麻痹、压迫的种种毒计都不能生效;一方面要和学生以外的广大人民的求生存、求民主和平的斗争更密切地结合。“五四”以来的历次运动之所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它们能一举而达到目的,其真实效果是在于通过每一次学生运动而使广大学生的志气和认识提高和坚定,同时又推动了学生以外的各阶层人民的觉悟与团结;然后当学生群众与学生群众以外的人民结合到一起,汇成巨大的力量时,就终能够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般的学生运动发展的规律。这一次学生运动本身在一开始已显出这样蓬勃的气象,而又正是在全国人民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进向高潮的时候,全国人民一定会更积极地起来支持学生的要求,反对和制止反动当局对于青年学生的暴行。最后我们终将看到,究竟是公开宣言不要青年,违抗人民公意的反动统治者胜利呢,还是纯洁爱国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青年学生得到胜利。

最初刊载于1947年5月29日《群众》(香港)
第15期,署名沈友谷。



要民主就要“造反”

在各路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锋芒日益锐利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已经掀起了新的高潮。在这时候，我们应该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上来看一下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国民党反动派之勒令解散民主同盟（10月27日），正是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的一个表现。根据这些特点，由施复亮先生所提出而引起了若干争论的“中间路线”问题也将不难得到解答。

一 民主与革命

民主——就是革命。换言之，在中国，如果不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其中必然地包括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就永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什么叫做革命？孙中山曾下过一个最通俗的定义：革命就是“造反”。是的，如果不是千百万人民大众向既成的统治秩序宣布“反叛”，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压迫下翻过身来，那么民主就没有意义。

一部近代中国的政治史证明着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号召下，千千万万农民组织起“造反”的队伍，为“分田”、“反官府”而抗争。他们革命——为的是民主。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清政府统治下



为民主共和而努力，他们毫不迟疑地称自己为革命派，向既成的统治秩序进行革命的斗争。他们要民主——所以革命。

在全国范围内，至今中国的民主还没有完全实现，就因为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将来虽然属于民主革命派，但是它曾经在力量上不如君主专制派的既成力量那样大；而且君主专制派因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君主立宪派和民主立宪派的直接间接的帮助，更常常能够压倒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在民主革命进行过程中折断了它，结果就使得革命不能完成，民主不能实现。

什么叫做君主立宪派？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君宪派的典型。清朝的专制派在戊戌政变后固然也曾异常讨厌这些君宪派，称他们为叛徒，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看得很清楚：君宪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挽救专制派的命运而帮同扼杀民主革命的。康、梁以后，君宪派的传统始终未断过。所谓“君”，曾经是皇帝，而现则叫做“元首”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总是要选择一个在他们队伍中最“强”的人，来乞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而组织一个全副武装威压人民的政权。凡无条件地坚持维护这样的政权的人就是君主专制派，而凡是企图给这样的政权穿上一套“立宪”外衣的人就是君主立宪派。君宪派在基本立场上和专制派是一致的，尤其在专制派受革命浪潮的撼动而感到左支右绌的困难时，君宪派就挺身而出，来当长坂坡上“救主”的赵子龙了。

什么叫做民主立宪派？从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民宪派乃是这样的人，他们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但他们不赞成经过人民的革命来实现民主，而认为只要写定一部“民主的宪法”，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就能使民主实现。——既然不是革命，那就自然不可能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既成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之所谓民主立宪就只能是对这既成的统治秩序给



以若干限制；他们所向往的“民主”也就决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而只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民主。这样的民宪派尽管也常常为专制派所讨厌，但他们终究是不能够给专制派以什么损害的，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可以拿来做幌子，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于民宪派的国民党就是采取这种手段的。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虽然表现着这样的4个派别（方向），但4个派别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君主专制派与君主立宪派站在一边，构成反动阵营；而民主立宪派与民主革命派站在另一边，构成民主阵营。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简单。已经有多次的历史经验使我们看到，一到民主革命的浪潮澎湃时，专制派就求助于君宪派，并且自己也化妆为君宪派；而君宪派又拉拢民宪派，并且自己也化妆为民宪派。反过来说，民宪派如果坚持和平立宪的主张而反对人民革命，就会觉得自己倒和君宪派血缘相近；而君宪派则施展狡猾的手段来软化民宪派，以尽其为专制派帮忙之责。在这种情形下，民主革命派就一定要坚持立场，看出自己不但和专制派对立，而且和君宪派对立，还要看出自己和民宪派之间的严格的区别，并且促进民宪派的进步。如果不能这样，就会丧失革命派的立场，断送革命。这样的历史先例也并不是没有过的。

从近年来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势力来看，四大家族的直系统治势力自然是君主专制派，因此是民主革命的死敌。曾经有人以为像政学系、太子派（孙科）的势力和四大家族之间究竟还有所区别——那是什么区别呢？最多也只是君主专制派与君主立宪派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在今日的实际政治中已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君宪派已不过是专制派的附属品，利害相通，命运相共。民主同盟在其基本精神上可以视为属于民宪派，但其中也包含着民主革命



派分子；至于张君勱的民社党和曾琦、左舜生的青年党，曾经厕身于民宪派，但一转身间，露出原形，原来还是君宪派，是为专制派尽其绵薄的。

二 自从政协以来

民主革命的高潮正以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掀起着。在这一回，专制派和君宪派密切合作，加上帝国主义的支援，也不能够压倒民主革命的力量了。我们要迎向民主革命的高潮，就一定要扫清对于专制派与君宪派的幻想，并且扫清“和平”、“合法”地实现民主的幻想——幻想的迷雾退尽时，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和人民大众在一起走向民主革命的大道。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政治形势发展的基本轨迹，可以更帮助我们了解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政治协商会议，就其成分而言，是包括着上述的四个方面的，从君主专制派到民主革命派都有代表参加。

君主专制派与君主立宪派在这会议组织与进行的过程中是合作无间的。在他们之中，孙科、张群等以君宪派面目为主要的出面人，他们向民宪派表示同情，企图加以分化和拉拢，又向革命派表示好意，企图加以软化。如果分化、拉拢和软化的企图实现，那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就可以在“立宪”的外衣下安稳地维持下去了。

但政协会议只是反动派方面发动的阴谋么？自然不是。应该看出，政协会议之所以能开成，基本上是由于民主革命派力量已经达到空前强大这事实。只拿会议的方式看，这是革命派、民宪派和反动派（专制派、君宪派）分庭抗礼的圆桌会议。——辛亥革命时，



虽已曾有过一面是袁世凯、一面是南京的革命政府立于对等地位的和会,但那是在后者向前者作政治原则上的让步的结果。如果没有在抗战期间的人民力量的高涨,使专制派在抗战结束时感到革命的威胁,如果民宪派不和革命派携手合作,那么可以断言,反动派方面是决不会承认在政协会议中革命派和民宪派的地位的。

反动派在政协会议中的阴谋是失败了。软化革命派——没有成功;分化和拉拢民宪派——没有完全成功。他们不得不在会议中承认他们在会后立即动手加以撕毁的决议案。因为这些决议案的执行虽不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然而大大地削弱了反动派的势力,而使广大人民中的民主势力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可能条件。

在破坏政协决议的过程中,专制派与君宪派的合作无间是更显著了。一面是发动全面内战以实行其所谓“武力统一”,一面是召开国大以制订其所谓宪法——这就是专制派与君宪派联合演出的交响乐。自政协会议后,在去年一年中,一次次的“和谈”,到现在看来,很清楚的也只是为了想麻痹革命派,并分化民宪派。既然不能拉拢到民宪派中的全部,就先取得某一部分吧。于是民宪派中真的发生了分裂。——原来这中间本来有着君宪派化妆的分子,张君勱、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之流回到娘家去了。

但革命派并没有被麻痹,勇敢地起来接受了反动派的挑战。反动派本来以为,一旦尖锐的斗争代替政协的圆桌会议,民宪派与革命派的步调便不能一致,就可使革命派处于孤身奋斗的情形下。但事实上革命派并没有“孤立”,因为革命派所依靠的本来是广大的基层人民。内战进展中,土地革命深入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卷进民主革命的队伍中间;同时,惨酷的现实使更多的人民放弃了对蒋的希望,民主革命的高潮在反蒋的军事胜利和土地革命的号召下掀起。



一方面，民主革命派依靠着最广大的人民；一方面，反动派更公开地依靠着美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对立绝不可能调和，内战的炮声日益猛烈。——在这中间，民主立宪派就自然处于一种异常困难的境地了。

民宪派的幻梦越多，处境也越艰苦，仅仅靠“和平”的“合法”的方法，通过立宪的程序，就能在中国实现民主么？事实上，去年（1946年）7月当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被暗杀而全面内战展开时，已经证明这是条走不通的路了。去年11月，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和谈”完全断绝，是又一次证明了这点。今年来，在所谓“总动员令”发布之后，在内战继续扩大中，民盟终于被蒋政府宣布为“非法”，这正是再鲜明不过的事实，表明了“和平”、“合法”的民主不过是个幻想！

其实本不必等这两年的事实。中国近代政治史早已证明民主与革命是不可分的。政协会议好像是表明了非革命的民主立宪之可能，但实际上也不是的。只有张君勱才以为政协决议的基本精神就在制订一个好的宪法，那正是使他堕落的思想根源。政协的基本精神是在于保障广大人民中的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果去掉这一点，全部决议都是废话。政协决议既被破坏，那就连1946年政协会议那样的方式（相当地保留“君主派”的地位，而同时保障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也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

这样的事实也许可说是惨酷的，但既然我们是在处理实际的政治，就不能不承认这“惨酷的”事实。

如果硬不承认这事实，那就只能以更多的各种的幻想自娱了：或者是幻想美帝国主义来弹压中国的内战，助成和谈局面；或者是幻想君主立宪派能“说服”君主专制派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沉溺于这类幻想中的人总以为，一旦这种想望能实现时，反动派与革



命派又可像政协会议中那样叙首一堂，而民宪派便又可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

没有现实根据的幻想对于实践是有害的。这一回民主同盟的领袖们在京沪受到蒋政府的压迫时，周旋应付上，显出了手忙脚乱的状态，恐怕正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类幻想的影响吧？

三 行不通的“中间路线”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施复亮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他所提倡的“中间路线”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写在10月初，但发表时已在民盟被宣布为“非法”了。施先生现在重新来看一下他在这篇文章内提出的问题：“中间路线究竟有没有现实的根据？”或许会要茫然若失吧。照我看起来，对这问题可以有两种答复：从中国社会的某些阶层中仍将继续有一些人支持施先生所说的“中间路线”，就这意义可以说，“中间路线”也还是有现实根据的。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决定了这种“中间路线”是一定走不通的，就这意义说，“中间路线”确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中间路线”这名词本身的含义很不明确。照施先生所赋予这名词的含义来看，可以说，这就是非革命的民主立宪派的路线。因此，把施先生的意思说得明白一点，他就是主张，“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只可能或只应该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以实现中国的民主。

如果把施先生的意思弄清楚了，我想，在他和别的几位先生间的争论，虽然牵涉很多问题，但实在不难解决。问题的焦点就是“是否只可能”，“是否只应该”。是否中间阶层只可能、只应该走和平改良的路线，而不能走民主革命的路线呢？照理中间阶层中应包括农



民,也包括小资产阶级,他们显然不是不可能革命的,相反的,是有丰富的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从理论上,从历史实践上看,也不是不可能革命的。所以施先生认为中间阶层不能革命是错误的。那么是否为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起见,只应该走和平改良路线呢?既然承认民主是合于中间阶层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指出,走和平改良的路线是不可能从反动统治者的控制下得到民主的。所以施先生以为中间阶层只应求改良也是错误的。

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中有一部分曾经而且至今只想走和平的改良的政治路线(而尽力拒绝走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事实,我以为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么我们所应做的事就是指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所谓走不通,就是走这一条路将永不能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甚至反而达到相反的目的。让我们引用一段施先生自己的话:

我深深知道中间派及中间阶层的弱点,只有在和平民主的条件之下,中间派才有发展的前途,才能在政治上发挥其独立伟大的作用。只有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下迫使双方停止内战,中间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中间路线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它能够实现,这是要由国内国际的种种条件来决定的。假使反动派坚持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迫使左翼党派采取革命路线。假使左派党派能够推翻反动的政权,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权,那就可能采取更左的政治路线,也不一定会恢复政协路线。

施先生的这段自白已经充分表明他所说的“中间路线”是十分可怜的一种东西。路是有的,但不一定能实现!(虽然走不通,但路总还算是一条路!)照理说,这条路是为了走到和平民主的,然而却又先要有了和平民主的“前提”才能有“前途”。作为“前提”的和平民主是怎样的呢?原来是虽然不要让反动派完全胜利,但也不要反



动政权被推翻——照施先生看来，一定要先由“国际国内的种种条件”造成了这样的“和平民主”，中间派才有前途，才有“独立伟大的作用”！施先生的话正是“深深”地说出了作为非革命的民主立宪派的“中间派”的“弱点”，他们是这样地弱，以致于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合于他们胃口的反动政权在自己头上时，才觉得自己是既有“前途”，而又“独立伟大”！但是民盟的受摧残是证明了，“反动的政权”一天不被推翻，就一天不会停止对民主立宪派的压迫，除非你上它的钩，向它投诚。如果“中间阶层”和“中间派”自己不觉悟起来，从事对自己有益的民主革命，却埋怨“左翼党派”不该去“推翻反动的政权”，并且希望有什么“国际国内的种种条件”来阻止人民翻身的伟大斗争的进行，这又是何等没有出息的想法！

和施先生争论的人竭力想证明，所谓中间路线的想法在中间阶层中并不存在，但这确是徒劳的，因为施先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答复说：“我就是属于中间阶层的人，我就有这种想法。你能否认我有我自己想法的权利么？”自然不能否认这权利。但我们应该指出，有这种想法的人，虽在中间阶层也已不多，而且将因事实的教训而一天天更少下去（事实的教训对施先生想来也不至完全落空）。如果不顾事实的教训而硬要坚持这幻想的路线，其结果将如何呢？恐怕有一天连自己也会发现，这想法与君主立宪派并无多大不同，而觉得今日有些评论者“把中间路线排斥于民主路线之外”，也并不完全是“故意曲解”了。

四 新的政治阴谋

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广大人民胜利进军，土地革命的巨浪在农村中汹涌澎湃……



在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失败下，美帝国主义着急，蒋介石躁恼，君主立宪派恐慌……

民主革命的新高潮挟着不可抗的威力而高扬。但在这威力前，不能设想反动派会束手待毙。政治上的诡计行不通时，就用军事；军事上技穷时，就又要用政治阴谋来辅助。在人民军事方面的胜利愈扩大时，反动派方面在军事上愈加疯狂，在政治上也就可能有一套套新的阴谋出现，那都可以预计到的。

最近，民主同盟之受到压迫，固然反映着蒋政权危机的更加严重，所以对于一般说来属于民宪派性质的政治集团也容忍不了；但另一方面，这也未尝不是其整个政治阴谋中的一部分。对于民宪派的政治力量，反动统治者向来总是不断地加以分化、拉拢和打击的。分化不了，拉拢不了时，就加以打击；打击过后，又再加以分化和拉拢。在反动统治者的危机愈严重时，他对民宪派的打击就愈猛烈，其对民宪派的分化和拉拢也就愈迫切了。

然而政治阴谋不止于此。有各种征兆可以使我们预感到，当前军事形势更加发展时，在美蒋协议下，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政治阴谋行使出来。

这种阴谋简单说来，就是使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的臭名昭著的君主专制派暂时隐到幕后去；让君主立宪派以“自由主义者”的名义来收拾局面，由他们再去收买一批在野的君主立宪派（他们有许多也已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甚至民主派了），并拉拢一些坚持非革命的方针而且隐隐然讨厌革命胜利的民宪派。

据从南京方面来的消息说，美帝国主义者有一个计划，要求南京政府再作一次大规模的“改组”，大量吸收“自由主义分子”在内，以这改组后的政府来提出“和平”，和平不成就再打。——这所谓改组，就其实际内容说，也就是要组成一个以君主立宪派和肯来上



钩的民主立宪派为中心的政府，因此孙科就被拣出来作为代替蒋介石的候补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自然为了尽可能延迟和限制民主革命的胜利，挽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难以逃脱的危机。但这是真的牺牲掉蒋介石么？不是，因为如果按照这套计划做起来，蒋介石本人也不过是一时地藏到他主人的夹袋里去，活动着的还是蒋的全部喽罗。如果计划行得通，蒋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

但也很明显的，对于这样的阴谋，除非是受了一切事实教训而仍执迷不醒的和平合法改良的民主运动者，民宪派中少数从心底里反对人民革命翻身的分子，决不会有任何人上当。广大的人民，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各民主革命的党派，已经对于美帝国主义者，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其中的任何派别，不再存任何幻想。在清醒的人民的力量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反过来促使它自己崩溃得更快！

据说，在破晓将近之际，正是群魔乱舞之时。民主革命的高潮愈来愈奔腾了。让我们扫清一切残存的幻想，粉碎一切将要来的政治阴谋，勇敢坚决地走向人民大翻身的胜利的明天去吧。

最初刊载于1947年12月1日《自由丛刊》(香港)
第9辑，署名沈友谷。



不再幻想,不再上当

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里面反映着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人民所遇见的敌人,既凶狠,又狡诈。

对人民凶狠,是为了吓倒你,压倒你,使你失败。

对人民狡诈,是为了欺骗你,麻痹你,使你上当,结果也是使你失败。

凶狠中又狡诈,狡诈中又凶狠,这就是人民的敌人的全部面目。

凶狠是容易看出来的,狡诈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受欺于狡诈,对敌人发生了幻想,就是自行向敌人缴械。40年来,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跌过不少筋头,每一次的失败多半都不是失败于敌人的凶狠,而是失败于敌人的狡诈。一旦敌人从狡诈的狞笑下露出了凶狠的真容时,才觉悟到是上当,但已经不得不用大量人民的血来补赎这一次错误的幻想了。

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遇到两个大敌,一个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是本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者。这两个大敌都是不仅以其凶狠,而且以其狡诈来对付中国人民的。

我们又必须看出,中国人民当前所面对着的美帝国主义又是从来一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最狡诈的一个。远在25年前就



有人指出：“美国是最会使掩耳法，最会用宣传术宰割中国的‘好朋友’”（见蔡和森在1922年所撰文）。虽然到现在它的一切掩耳法与宣传术已遮掩不住它要殖民地化中国的全部狠毒的阴谋，但是至今它还用“扶助中国的自由分子”，“帮助中国民主化”等等说法来做幌子，欺骗中国人民。

同时，中国人民所面对着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也是极端狡诈的一个。拿这一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人来看，人们常说，要把握他的性格，便不能忘记他的交易所和流氓的出身。交易所的出身——表现为其极端地善于投机；流氓的出身——表现为其极端的无赖。总起来说，就是极端的狡诈。极端的狡诈加上极端的凶狠，就使得这一个统治集团成为中国的封建性、买办性的统治者中的最后的集大成者。

我们既已识得了这两大敌人的“性格”，就不能不提防他们的狠毒，更要提防他们的狡诈。尤其在这中国人民大翻身，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我们不能不预先警觉到老练的狡诈的敌人所能行使的阴谋。

人民的敌人是不是会在决定的时机更凶狠的使用出他们的全部力量来企图摧毁民主革命的胜利呢？不成问题的，他们是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已经生长成如此强大的力量，是人民的敌人无论如何压不倒的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在战场上已经使用出全部力量，已经是除了呼吁美援助别无其他办法，而且已经是虽有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也不可能源源不绝生长出自己的有生力量来了。美国的援助有限，即使美帝国主义发一发“狠”，派出若干军队来“参战”，我们也可断言，在偌大的中国战场上，少数的帝国主义部队也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必能胜利的形势。——太平天国的时期已是一去而不可复返的了。



中国人民既已有了这样大的力量来实践“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真理，人民的敌人无论再怎样凶狠是都不足惧的了。

在这情形下，有人说，反动统治者已完全失去自信，已经陷于疯狂状态。——这样的看法其实只是部分地正确。失去了在战场上致胜的信心，这是事实，但如果以为，最狡诈而老练的美帝国主义，加上最狡诈而老练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在这时期已经完全神志昏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那就错了。有时我们过分低估敌人的实力是错误，有时我们过分低估敌人的狡诈程度，也是错误。

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也根据当前时局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统治集团和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主人，越到危急的时候，就越加会抱着一定的计划与步骤而行使出狡诈的手段。下列几点是值得提出的：

第一，在人民的敌人整个营垒中，本来是包含着各种内部矛盾，帝国主义与它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基本上互相勾结，但也决不是毫无牴牾；在中国统治集团内的各派系为了争权夺利，从来就有数不清的纠纷。到了人民革命浪潮高涨之时，整个反共营垒因共同的生死关头而结合得更紧了，但同时形式上，其各方面的相互矛盾，常会因为种种原因而特别显露——或因为各自所主张的镇压人民的办法有轻重缓急的不同，或因为各自想多牺牲一些别方面的利益，多保留一些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必须看出，这一切矛盾比之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来，究竟是不重要的：办法尽管有轻重缓急的不同，都是为了镇压人民的革命；权利地位的争执尽管存在，基础上还是要维持整个反动统治者的权利与地位。如果以为这就是“树倒猢猻散”的表现，却不知道他们还是在同心协力来挽回



他们的命运,那就要上当。反动派懂得这一点,往往就在这样的时
候,故意特别地把他们的内部矛盾显露出来,使你迷惑,造成你的
幻想。过去每当中国革命时期(例如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甚
至在帝国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激烈派”与“温和派”的争执。主张
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激烈派”大声责骂所谓“温和派”是消极旁
观,坐视列强权利之丧失。但实际上这种“激烈派”的谩骂正是掩护
了“温和派”来以阴谋破坏中国革命;而“温和派”也就借“激烈派”
来胁迫革命中的动摇分子屈膝。同样的情形,在今日出现。美帝国
主义者也可有“激烈派”、“温和派”之分。美蒋之间的矛盾,蒋的直
系势力与各地方势力之矛盾,政学系与 CC 团之矛盾,也都是同一
类型的矛盾。可以想见,这一切矛盾将越来越故意地招摇出来,被
有计划地用来作为造成迷惑和幻想的手段。

第二,以表面上的或局部的让步,换取根本的不让步,这是反
动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在抗日战争中用过这办法,在政协会议中也
用过这办法。所谓根本不让步是不让人民的革命力量保存和继续
发展,而在基本上操纵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更具体地说来,
就是在土地问题上不让步,因为,要做到使广大农民不能翻身,就
是阻止了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保存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在目前土
地改革的浪潮正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反攻箭头而广泛展开,这对于
反动统治者是被挖掉命根的危险。在最后的时机,如果能免除这一
个“危险”,他们就肯以各种各样的让步来换取,那是可以想见的。
“要变不要乱”的话将被重新喊出。这话在这情形下的意义就是:民
主啊,联合政府啊,什么等等啊,都可以,只要基层农村中不“乱”,
也就是不要让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如果他们真能得到这样的
保证,在某种情形下,出乎有些人意外的“让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谁真给了这样的保障,那么所换得的任何“让步”都无



意义，就终于会发觉，不过是上了一个大当。

第三，尽管是根本不让步，但是反动统治者却善于在必要时把他的政治面貌装得和反对他的势力完全一样。在过去，反动统治者曾经多次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还没有足够经验的人民与不够坚强的革命势力。当辛亥革命时，各省的军阀官僚一霎那间都挂起了白旗，满口说着反满光复了。讨袁时，袁世凯原来的部下很快地都变成了讨袁健将。北伐时，一些聪明的北洋军阀官僚看出了革命队伍中原来尚有可乘之隙，便一起挂“青天白日旗”，满口说的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我已经和你一样了，你还能拿我如何呢？自然，人民的经验已经越来越丰富，革命的领导力量也远非当年所可比。人民已经看清，我们所要的是下面的“大翻身”，而不是上面的“换旗帜”。因此，这一套伪装的戏法是难以扮演了。但是更巧妙地行使这骗术，来使人民上当，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第四，就以上三点，总起来说，反动势力最后的一着狡计就是：装死。这正是流氓出身的皇帝惯用的办法，却也是帝国主义者擅长的办法。自然，在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从来没有死过，也从来没有过要大规模地装死的必要，但这种战术局部地一时地是用过的。在北伐大革命中，帝国主义势力曾经装死过，他们向革命势力表示尽可能让步，甚至装得哀伤地说，这回我可真的完了。同时北洋的军阀官僚势力纷纷装死，他们奔向南方说：我们是完了，决心向你投降了。自然，装死是为了不死，是为了一个筋斗翻起来，再把中国人民踩在脚底。“向你投降”也不真是，是要让我来分化你，同化你。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来详细分析这些。但由此已可见，狡诈的敌人将有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是可以预计到的。在过去40年间，中国人民的民主斗争并不是从来没有胜利过。但每一次都不是彻



底的、全面的、消灭全部敌人的胜利。起先是敌人的凶狠使得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的人民有点害怕，继之，敌人的迅速“归顺”又使得还没有坚定识力的人民发生幻想。当人民在幻想中以为胜利已经取得的时候，敌人狞笑着把人民所取得的胜利篡夺到自己的手里。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特别提出的“落水狗还应该从而打之”的道理是何等的识力。我们不能不记住，还有后台老板撑持的反动统治势力，虽然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了，但是至今还远不是落水狗。他们还会十分凶狠地咬你，更会用各种狡狴的方法来企图逃避他们的命运，甚至最后还要装成是落水狗来哄骗你。

中国人民认定，这回一定要把这条狗不仅真正打到水里，而且纵然真的淹在水里，也要从水中去继续打它，使它再不能爬出水外，洒一洒掉皮毛上的水滴，又来啾啾向人。中国人民这回要得到的胜利一定要是这样的胜利，既不会被其临死时挣扎的凶狠所吓退，也不会因其狡诈的手法而上当。

最初刊载于1947年12月4日《群众》(香港)
第45期，署名沈友谷。



路是怎样铺成的

——一年来政治形势的总结

在去年(1946年)年底时,全面内战虽已进行了半年,“和谈”虽已无声,国民党的伪国大虽已不顾一切地开了起来,但是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战争中途停止而恢复和平的希望尚未断绝,因为在国民党区内民主同盟及各民主的团体与出版物尚能“合法”地活动,中共也还有代表机关留在京沪,而且中共方面还提出了“取消伪国大和伪宪”,“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这两点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只要国民党接受这两条并不苛的条件,和平就能即时恢复。

但是到了现在,1947年的年底,我们所看到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画:战争是决不会中途停止的了。这就是说,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全部彻底打垮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才能停止,真实的和平将建立在人民的胜利的基础上面;而这样的结果的来到已经是很快的事了。

仅仅一年,变化得多么大!这种变化是怎样来的?这是我们在迎接新的一年时应该回头看一下的。



谁关死“和平大门”

去年年底，蒋介石向他的军队发出了一个密令（12月30日），宣布“剿匪军事”的方针，原文很长，结语是说：“只要我将领在今年一年期内，淬厉精诚，奋发努力，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则滔天大祸救平于一旦。”由此可见，这一年的内战已早在蒋介石的预计之中，他所惟一未预料到的是经过一年战争，陷于被“救平”的危机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所认为“奸匪”的对方。本来，到去年年底，蒋介石集团破坏政协，发动各地区内战，又扼杀和谈，片面召开伪国大的事实已十分显著；所以人民虽尚未读到这“军事剿匪”的密令，但对蒋介石所讲的“政治解决”的谎话已经一点也不相信了。如果在当时，和平之门还没有被他关紧，那就是中共提出了恢复和平的两个先决条件的原故。

但到了今年（1947年）1月，这两个先决条件被国民党正式表示拒绝了。蒋介石集团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做不到的事。那自然是因为如果实行了这两条，他们所已经下定决心要打下去的“剿匪军事”就不可能继续进行了。

很清楚的，在蒋介石集团的主观中，和平之门是早已关了的。甚至早在政协会议刚结束后，全国人民以为和平之门从此大开之时，蒋介石已开始做着关门工作了。本来，在蒋介石想来，让人民幻想着和平，而自己则全力“剿匪”，完成“武力统一”，是对他最有利的。但“可惜”军事发展不如他预想中的顺利。在去年11月他兴高采烈地召开伪国大，却正是他在军事形势上开始逆转的时候。从此以后，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为什么呢？反动统治者永不能理解使他失败的真实原因。他以为，一定是因为企求和平的人民还在掣肘，



而他的士兵还不能体会层峰意志奋勇作战。因此他在密令之外又要公开宣布拒绝两个和平前提条件，这样来把和平之门关紧。

这一年来，和平之门的被关绝，也如去年政协被破坏一样，是经过了好几个步骤的。在1月的拒绝两条以后，3月初把中共在国民党地区内的人员赶跑；5月公开屠杀反内战的学生并封闭上海的民主报纸；6月29日，“通缉”毛泽东，接着《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就在7月初发出来了。最后就有10月底的宣布民盟为“非法”，勒令解散。事实上，对民盟的这一措施已确定于《总动员令》发布之日。这一步紧一步的做法，正反映着其军事形势上的一天比一天恶化。好心眼的人以为反动派在军事上失利，就会自愿把和平之门打开。错了。事实上他是在越着急时就越凶狠，也越狼狈地把和平之门关起，关了不够，再加上闩；闩了不够，更钉上钉。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激励士气”，而使人民死心塌地跟他走了。

蒋介石的总动员令发布后已快半年，有什么用处呢？对于挽救他的危亡，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有一个用处，就是使人民中的最后一批也认清了，和平之门已被蒋介石关死。从此以后，人民的确不能不死心塌地了——死心塌地为根本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而奋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和平。

如上所举的蒋集团的历次行动，美帝国主义的从旁鼓励和配合是非常显著的。例如，1月国民党拒绝两条前提条件后，马歇尔即宣布退出三人委员会和军调部，从此美帝国主义放弃了表面调解的两面政策，而公开执行全力支持蒋集团打内战的方针。2月28日驱逐中共人员前一天，马歇尔在华盛顿宣布将西太平洋各岛的美国剩余物资运华，并决定加速执行将271艘舰只送给蒋政府。6月27日，美国务院以1.3亿发子弹让与蒋政府，也恰恰在南京宣布“通缉”毛泽东的前两天。等到所谓总动员令下了之后，美国的



“钦差大臣”魏德迈就出发到中国来为蒋集团督战和出主意了。

因此，美帝国主义协同蒋集团以战争来胁迫中国的人民大众，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事了。

用什么争取和平

那么，人民大众应该用什么来答复凶狠的帝国主义者和恶毒的反动统治集团呢？——要就是投降，要就是迎战。很明白的，如果你不接受它的投降条件，它不会让你和平；如果你不能推翻它的统治，你不能从它得到和平。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来的政治态度从来就是很鲜明的。我们不妨来回头看一下中共所曾发表的主要文件。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今年的最初两个月内中共一面继续在战场上周旋，一面仍不放弃在实现两个前提条件下较早取得和平的希望。这本是对人民和对国民党自己都有益的一条路，但既然它已公开表示过拒绝，如果还是片面地希望它这样做，那就成了傻子了。所以2月24日评蒋军事密令的《解放日报》社论中说：“蒋介石及其后台老板美国帝国主义者留给中国人民的只有战争一条路，但是中国人民留给蒋介石的至今还是两条路，或者是顽固不化，坚决执行其永远达不到的‘军事目标’与‘一年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的密令，以致自取覆亡；或者是迅速实行恢复去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与取消伪宪两个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表示起码的和平诚意，因而提早实现国内的和平。”

可是在这社论的后几天，蒋介石驱逐中共人员了。这就是他自己选定了人民所留给他的“两条路”中的一条死路。

3月间的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及其对延安的攻势，把蒋集团的



面目暴露得更清楚，所以4月12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就宣布：“蒋介石反动集团现在已经走到他们的末路，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的高潮是一定要到来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灭亡！因为蒋介石集团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集团。”

5月的学生运动受着残酷的镇压，新华社发出中共权威人士的谈话，其中指出，因为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坚持着的政策是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和蒋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因此，“七七”纪念日中共对时局口号的中心内容是，“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正是正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

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这样的明确的政治方针之下，人民解放军在7、8、9三个月间，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于是新华社的“九一八”社论中提出了“救国必须灭蒋”的口号，于是在双十节的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宣布了“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为首的內战罪犯”和“实行人民的民主制度”的政策。

同样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明确的政治方针之下，中共提出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法大纲。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挖掉蒋统治的根，才能给人民的民主制度奠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不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



中间路线的破产

我们不能不再谈到中间路线的问题。

中间路线是什么？说得更清楚，就是既不愿向反动统治者投降，也不希望人民的全部胜利，只想在某种条件下求得妥协的解决，而渐进地获取和平与民主。

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一年来的政治发展，我们就必须指出中间路线在事实面前的破产。

第一，假使能证明美帝国主义与蒋集团并不是已经选定了战争，他们还是肯作符合人民利益的让步的，中间路线就还有立脚的余地。但事实所证明的恰恰相反。是否人民很急躁地没有等待过他们呢？不是，如前面所指出的，甚至在今年1月后，他们还有最后的机会来改变他们的态度。但他们顽固地放过了这机会。因此，到了今年3月以后，谁如果还相信美帝国主义与蒋集团会自愿回到政协路线，谁就是自行陷入了错误的幻想。固然在7月里（在所谓《总动员令》已发布后）魏德迈来华，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洋钦差身上，结果如何呢？不管魏德迈及其顾问人员曾经如何“坦白”地和民主分子谈过话，不管人们曾怎样夸大了这位钦差大臣与他的奴隶总管之间的“矛盾”，但是现在事实已再清楚不过，魏德迈的来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帮助独裁者。

第二，主张中间路线的人退一步说，纵然希望能寄托在美蒋身上，但是人民真能彻底战胜美蒋合作的势力么？如果实际形势终于只是相持不下或两败俱伤，则中间路线还是走得通。这种想法在今年三四月以前还可以原谅，因为人们并不是个个都能敏锐地看



出人民力量与反动力量消长对比的形势。但是现在，事实应该能使每一个人看清楚了：战争下去只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人民的全部彻底的胜利。固然决不会是反动势力的胜利，也决不会任何形式的相持不下或两败俱伤。

第三，事实既已证明了寄希望于美蒋是幻想，以为两败俱伤是错误，那么中间路线终该绝迹了吧？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甚至于还可能有更坏的想法作中间路线的灵魂。有人以为，如果让人民完全胜利，那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于是就出现了类似于“在国民党治下的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却是有无的问题”这样的看法。也还有人以为，如果人民的胜利就意味着土地革命的普遍实行，那就难免要“逼得”有些人宁愿走中间路线了。

这种想法之所以是“更坏”的想法，因为如果由这种想法出发就势必至于以阻止人民的胜利为中间路线的任务；而如果抱着这种任务，也就难免会觉得美蒋集团倒是较可爱的了。有着这样想法的人，我们可以断言，他在国民党治下简直不必考虑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因为他可以得到很多“自由”。至于在人民胜利后有没有封建剥削的自由呢？没有了。有没有反人民的自由，有没有卖国的自由呢？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如果人们要求的是这种自由，那的确是“有无”的问题，人民决不在“多少”问题上和他讨价还价。

一年的事实也已经证明得很清楚，在国民党区内有的是反人民的自由，没有的是人民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民盟被解散和所谓“经济戡乱”做了最显豁的证明）。在解放区内，有的是人民的自由（劳动者与工商业者都有自由），没有的是反人民的自由。因此，清清楚楚，或者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奋斗，或者为保持反人民的自由而挣扎，这中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



信心和警惕

这一年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在基本上说起来,就是阶级力量对比形势的根本变化。这个变化最显著不过地表现在战场上面。——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曾经抢先在战场上居于优势的主动地位,而以工农大众为基干的人民解放军曾经在战场上居于劣势的被动地位,现在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整个形势是确定无疑地扭转过来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形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领导着革命,将保证把民主革命推进到底。中国人民这一回将能够得到一百年来所争取的彻底胜利,是已经注定无疑。无产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彻底铲除封建统治的根的事业;又领导着全体人民走民主革命的道路,以最后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

这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外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本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者)所遭遇到的空前未有的困难局势,他们的必然失败的命运也已经注定无疑。如果说,在这一年来,在7月《总动员令》以前,反动势力所努力的还是如何把转为优势的人民力量再打下去;那么在7月以后,他们所努力的已是如何减低和避免他们的失败,如何在失败的情形下还能留下复辟的根子。7月的总动员令虽然声势汹汹,然而正是其总崩溃开始时的救命挣扎。

那么从这局势发展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基本结论呢?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两点,第一,要提高对人民胜利的信心;第二,要提高对人民的敌人的阴谋的警惕。须知道,在这时候,如果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我们就会犯错误。同时,如果我们轻



视了人民的敌人的狡诈，忽略了人民所应有的警惕，我们也会犯错误。

只要我们能够以最高的警惕对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一切化妆、分化、装假死、换旗帜等等阴谋，而以最高的信心来团结人民，坚决向既定的目标奋斗，那么，在新的一年里，人民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最初刊载于 1948 年 1 月 1 日《自由丛刊》(香港)
第 10 辑，署名沈友谷。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如果说在 1946 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么，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

——毛泽东

—

1946 年是所谓“和谈年”，虽然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已经是战火弥漫了。参与“和谈”的国共两党以外的人当时曾被笼统地称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也在这时发生。

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在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但在革命与反动之间，绝对不偏不倚的“中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实际政治的逻辑和各人的立场的不同使得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在 1946 年已包含着几种不同的内容。

有一种人，抱着“第三条道路”的想法，是出于害怕和反对人民的革命势力的心理。他们向反动势力要民主，只是要它宽大一点，给他们这若干人以“民主权利”（说穿了，就是给他们官做）。他们要求和平，说穿了，乃是要以和平方法来削弱以至最后消灭由中共所代表的人民革命势力。



不用说,这样的第三方面的想法不过是对反动势力的化妆的配合。反动势力在需要和谈假面具时,就需要这一种工具。一旦反动势力自以为已有了足够武力来一举摧毁革命势力时,青年党、民社党,以至王云五、胡政之等也就不再装扮成什么第三方面了。既然他们所努力的目标本是削弱和消灭人民势力,和平不过是个方法;所以为了同样达到这目的,他们是拥护和赞成武力的。

所以这一类人已早就被人看穿,连第三方面也不配做,一到1947年他们已公开跟着喊“戡乱”,自己也羞于说什么第三条道路了。但是到了反动的武力在战场上处处失利,眼看快要支持不下去时,从这一类人中也就出现了怨言,他们说的是,早知如此,为什么动武呢?用“和平”方法来渐次消磨革命势力,岂不是较聪明的办法么?这类怨言自难免要受到“上面”的申斥,此所以有一些人现在大发牢骚,说政府也不要第三方面了。——他们自以为是第三方面,其实就是这一类假的第三方面。

在1946年的和谈中可以叫做真的第三方面的,大体上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要双方让步以保持和平,但他们看出和平民主的障碍乃是蒋介石反动统治势力,所以他们要求革命方面作若干让步,目的在换取一种条件,就是全民的民主宪政,俾能由渐进的过程削弱以至最后消除反动势力。他们希望而且相信,这是能够用和平方法达到的。

如果说,1946年的和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证明了第三条道路的善良想法的破产。当时共产党曾经在不违背人民的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但反动势力所要求的是人民力量的全部缴械投降,所肯给予的却只是假民主的“诺言”。1946年的和谈的失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了,要不投降反动势力,就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消灭;用渐进的和平方法削弱它是绝对



不可能的。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他们既不愿意反动势力膨胀,又有点讨厌人民革命势力发展,他们希望双方都能相对地削弱一些,在二者相互牵制之中,而让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但是请问,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用什么办法来实现呢?他们希望在国际间出现美苏双方势力均衡的局面,而影响到中国也出现这种均衡局面;他们希望国共双方打得精疲力尽,两败俱伤,于是,出现这种均衡局面;他们更或者希望,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奇迹似地出现某种政治上的变动,从而使均衡局面能够产生。——所以提倡中间路线的施复亮先生说:“中间路线的存在还不能保证它能够实现,这是要由国内国际的种种条件来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想已经够了。这样一种懦弱的第三条道路的想法,早已注定是破产了的空想。

二

有人以为,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共产党也应该负责,至少也该负一部分责任。如果不是“右面攻击,左面也攻击”,何至于落得破产呢?

这点应该弄清楚。

如果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作为反动道路的附庸的那种第三条道路,是用和平的方法来削弱以至最后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的那种想法。——那么,我想,使这种想法破产的,确是共产党所代表的那一方面。中国人民已有了强大的力量,不是好欺负的;同时又有了坚定的识见,不是好欺骗的,谁想用甜言蜜语来欺骗人



民，使人民缴械投降，人民自然要用坚决态度答复他，使他的想法破产。

但如果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用和平的方法来削弱反动统治势力的那种想法——那么，我想，使这种想法破产的，不是别人，而只是那得到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个反动集团是如此狡猾，如此凶狠，决不因你的善良吁请而放弃它的既得权利中的一丝一毫。你想拔掉它一根毫毛，它就拔出手枪来对待你，使你的想法破产。

本来，在1946年11月蒋介石已关断和平之门，毫不动摇地进行战争；而以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力量也在投降与战斗的两条路中早就选定后一条路——在这时候，一切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都已破产了。

但是不庸讳言的，在1947年，国民党区内仍不是没有人继续存着“第三条道路”（或者又称做“中间道路”）的想法。他们总以为蒋介石用武力，对付的不过是共产党，以为他们自己还可以被容许在蒋介石治下作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并且以为到了某种时候，他们还可以用和谈来套到蒋介石头上，使他不得不承认和平，接受民主。

对于抱着这种想法的人，蒋介石看着是不顺眼的，尤其是在他军事上愈不顺利时，就愈加迁怒到他们，纵然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对蒋介石并没有致命的损害。蒋介石接二连三地给这种想法以打击，一直到10月里勒令民盟解散。——这种打击正是更加证明这种想法是破产到底了。

“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在直接受着蒋介石的打击时，同时又遇到另一方面来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内容是根据事实来指出“第三条道路”的想法的破产，认为这种想法应该赶快丢开，转向民主



革命的大道来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势力作决斗。

于是就有些本来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不高兴了。他们说，既然我们已从“右面”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为什么“左面”还要给我们以批评呢？这样“左”又不好，“右”又不好，叫我们怎么办呢？——照这种说法，就似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是由于“左右夹攻”了。但这难道是事实么？难道在受到蒋介石的惨酷的打击时，“与虎谋皮”的想法还没有破产么？难道不是因为这种想法已经破产，所以才有批评么？

很明白的，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时，如果进步的舆论还打起“同情”、“安慰”的调子说：善良的先生们啊，你们的想法好得很，还应该继续抱着这种想法而做下去，即使你们的脑袋被蒋介石搬走的时候，也不必丢开这种美妙的想法。——唉，如果竟有这样的舆论，那岂不是在故意骗人、害人么？

很明白的，指出“第三条道路”的想法的虚妄，使之转向民主革命的大道上去，这样的批评是必要的，即使话说得粗糙一点，也还是有益的。应该指出，在事实已经十足证明这种想法破产时，再要坚持这种想法，那就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有害。

三

在“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在事实上破产时，还要坚持这想法，就必然成为上举的那种“平衡”论的想法——希望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条件使战争由妥协而结束，不要让人民势力全胜，也就是不要让反动势力连根铲除。

本来是反动势力的帮闲的清客们，看到主子的武力已经失效，也都想从这样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中来求“出路”了。



如果是抱着这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一时感到“左右夹攻”的苦恼，那倒是很自然的。

反动势力在目前还是讨厌这种想法的，因为这不合于它“戡乱”的调子，有点像是丧气的乌鸦噪声。

有人以为，凡反动势力所讨厌的，人民就该赞许。我以为不。尽管这种想法现在为反动势力所讨厌，但正在争取彻底胜利的人民，仍有充分理由反对它，因为这种想法是违反中国人民与中国民族的利益的，而且可能表现为违反人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行动。

这里应该指出下列三点：

第一，在1947年，有少数人虽已看到战场上力量对比形势的变化，但还不敢相信人民革命力量能够取得彻底胜利；又在国际局势的看法上受了骗，以为国际间还会出现某种足以影响国内局势的“均衡形势”。于是他们就总放不开战争将有“相持不下”局面出现的想法，也就总丢不开“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现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中国人民是能够而且敢于取得彻底胜利的。这样的事实，在本来是好心地担忧人民不能全胜的人，一定是举手欢迎的。那么对于他们，“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就是完全可以丢弃不顾的臭袜子了。

问题是，可能还有这样的极少数人，他们本就只希望“均衡局势”，不愿意人民得到全胜，对于他们问题就复杂一点了。

第二，如果在今天，满心只希望出现某种的“均衡局势”，让反动势力还能保留一点根，好来牵制人民的全胜，而让资产阶级右翼力量能够吞占人民的革命果实——如果想法是这样，那么其致力的方向就必然是如何阻止人民的全胜。但有什么办法阻止呢？既然所谓“足以影响中国国内的国际均衡局势”只是个幻想，而连蒋介石都不能阻止人民的胜利，难道还会有一个什么“中间力量”能够阻止人民的胜利么？有些先生已在要求美国停止对蒋介石援助，



转而支援“中间集团”。——这一说,事情就很清楚了,原来假如有一个什么“中间集团”想要阻止人民革命的胜利,它就一定会堕落到向美帝国主义去乞求援助,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和蒋介石争宠。但既然这样做了,那就在本质上和蒋介石的道路成为一个东西了。

应该看出,属于中间阶层的多数群众在这两年来的政治觉悟已经提高了,他们既已看出向蒋介石乞求民主、和平的虚妄,又已看出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于中间阶层是完全有利的。他们既已唾弃了蒋介石的卖国路线,也决不会接受乞怜于美帝国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因此,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想法甚至在中间阶层的群众中也会遭受唾骂。

第三,直到现在,固然蒋介石统治集团还是公开反对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并不是不可能为蒋介石集团或其中的某一派别所默许或欢迎的。因为在革命的浪潮使它完全覆没的时候,它就会把这种想法当作挽救它的生命的最后一根草。

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如果还要坚持下去,就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原故。——但不管怎样,这种想法在任何形态下表现,都已在事实面前破产了,要发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是决不可能的。

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道路必然失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定能胜利。不愿和蒋介石一起失败的,就必须敢于和人民大众一起胜利。想在这两条道路间出现妥协而来什么“第三条道路”,或者在这两条道路外另找什么“第三条道路”,都是梦想。这种梦想(如果还有残存)是到了必须彻底肃清的时候了。

最初刊载于1948年1月17日《正报》(香港)
第72期,署名李岱青。



美蒋导演下的一种政治运动

在一切民主党派的活动均被视为非法，一切民主的社团与报刊均遭受迫害的蒋管区内部，出现着一种政治运动。从事这种政治运动的人，有的自称为“新中间路线”、“新第三方面”，有的标榜着“自由主义”的招牌，也有的提出什么“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这样的似乎十分新颖的口号。

本来，在去年上半年，在上海出版的《观察》，南京出版的《世纪评论》一类刊物上已很有些人写文章，大谈其“自由主义者的结合”。国民党在军事上一天天愈加失利，对民主运动的压迫一天天更为加紧，这所谓“自由主义”的运动也一天天更具体化了。今年一二月间，上海《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等社论，列举所谓“自由主义”的主张，俨然是提出一个政纲，并说：“自由主义倡到极峰时，有热心人士出来组党，是很自然的事。”（2月7日）可见这是有意识地在倡导一个政治运动。3月初，北平出现了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上举的政治制度化，什么什么化，就是该会在成立时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这个会虽再三声明只是“学术研究”的集团，但是它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意图是很显著的。其所提出的32条“主张”，在形式与内容上也无异于一个政纲。继之，南京有47个教授联名发表《为当前时局告国人书》，自称是向“大公无私之国民”与“忠于自由之知识分子”提出呼吁。——这一种政治运动是



显得越来越热闹了。

那么,这一种政治运动的内容是什么?性质是什么?作用又是
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种政治运动是怎样来的。

美帝国主义对这运动尽着催生婆的作用是很显然的。早在“政协”时期,美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努力要寻找一个反共而拥蒋的“第三方面势力”。在1946年的双十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过一篇演讲,表示反对“极端主义”,而要求“自由主义”者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下”。大家知道,那正是蒋介石已经用全面内战来打断了国共谈判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支持蒋介石统治集团是既定的方针,但这个集团在中国国内和在国际都已声名狼藉,无法掩饰。如果有一种代表“中间势力”的有力的“自由分子”集团出而参加蒋政府,使它看起来面目一新,这对于美帝国主义者做手脚是要便利得多的。“政协”与“和谈”期间,美帝国主义者找到甘心上圈套的“第三方面”只是民社党与青年党,这两个小党虽然满含着感激之泪而进入庙堂,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立刻看穿,他们原来不过是美蒋的附庸,哪里代表得了中间势力!于是美帝国主义者便继续向无党派的教授文人、在野的政客名流中去找寻他们需要的货色。曾经做过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便是负着这个任务的。他们总以为,合于需要的中间势力即使本来没有,以金元的力量何尝不能制造一个出来!甚至赳赳武夫的魏德迈,于去年7月到中国,虽然满脑袋装着如何军事援蒋的计划,却也伸展其嗅觉,到各方面去帮同寻找和制造这种中间势力。

原来在美帝国主义立场上,加强援蒋与鼓吹“中国政治之改造”本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今年2月18日,一方面杜鲁门向国会



提出咨文要求给蒋政府以 5.7 亿元的借款，一方面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希望中国忠于自由的爱国分子与全国各界共同本建设而渐进的步骤促成整个国家统一与和平进步”。——后一方面不仅为了作前一方面的掩护，而且还是为了积极地辅助前一方面。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看来，如果有能够赢得中国人民信心的自由分子集团在蒋政府周围，那么他为支持蒋政府而化的本钱才不至于白化。为了制造这种自由分子集团，美帝国主义也不是不化钱的。在北平的社会经济研究会中就有美国方面的资本。

蒋的崩溃形势越来越迫近，美国议会与政府中反动派叫嚣军事援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也就可以断言，美帝国主义培养和资助中国的所谓自由分子集团的工作也一定更会加紧了。

但如果说，这种政治运动仅仅是美帝国主义所制造出来的，却也不尽然。因为蒋介石本身也是擅长于利用所谓“自由分子”的。每当他的统治遇到困难时，他就要特别着重于拉拢在野的“名流学者”们，以求减少反对他的力量，使得一部分心怀怨望的人士得到满足，使得独裁政治的面目在人民面前显得模糊一些。例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翁文灏、蒋廷黻等相继被拉进南京政府，虽然他们一登龙门，在人民看来就和国民党的官僚并无二致，但在当初，他们何尝不是以“自由分子”的“学者”身分而应聘的呢？今日倡导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公报》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死心塌地拥护蒋介石的。

《大公报》与政学系官僚集团之关系本属公开的秘密，它竟扭扭捏捏地自称无党派，唱什么“自由主义”的调子，本已堪令人作呕。在北平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 59 个发起人中，倒有 30 个是已经查明是国民党员，其中并包括国民党现任中央委员 3 人，现



任或曾任南京政府官职的 23 人。它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关联是怎样也掩饰不住的。南京的大学教授 47 人的宣言,轻轻地责备两句国民党,用力地诬蔑和责骂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此来表示他们的“公正无私”与“忠于自由”,其与所谓戡乱政策相配合也是无论如何掩饰不掉的。

这一种政治运动目前还只表现在文字上。从文字上已可以明白看出它的内容和企图。

首先,应指出,这些人在主张上尽管可以空谈“独立自主”,但对于美帝国主义正在殖民地化中国的事实是绝不敢提一个字的,恰恰相反,他们正是为美国加强援蒋制造较合适的条件。他们所批评与要求于南京政府的和美帝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加强援助的条件是并无二致的。

大家知道,双方各打五十板是无原则的糊涂的中立,但这些“自由主义”者何尝真舍得把他们的主子打五十板。《大公报》在讲自由主义的信念时,纵然也轻轻责备国民党几句,但是一到吉林失守时,它立刻舞文弄墨地为蒋介石各方辩解,为他鼓励士气,证明像他的“这种军队中间纵有挫折,终必全胜”。这正是小骂大帮忙的一个典型例证。南京 47 教授的宣言也是如此,虽然在拚命辱骂共产党之时也连带骂到了国民党,但所骂的只是说它衙门里贪污腐化,部队里搞得一团糟,以致不能好好地认真“戡乱”。这不过是复述马歇尔、魏德迈对南京政府的责备。

北平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的 32 条主张,足以代表这一类人物给蒋政府的积极策划。他们供给它以一套合于它需要的民主理论(甚至他们还可以讲社会主义呢)。简言之,就是以所谓“文官制度必须确立”,来保障蒋政权下的整个官僚制度;以所谓



“军队属于国家”，来保障独裁统治的武力；以所谓“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的结果而定”，来保障国民党政权可以继续通过伪选而维持下去；又以所谓“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来反对土地改革，保障地主利益……这个研究会的主张既对于眼前的卖国独裁政府所做的一切罪行一字不提，对于现状并不觉得有根本改革的必要，却空谈些“什么什么化”，其实，统而言之，无非是求“独裁合法化”而已。

但如果我们仅限于说，这一种政治运动是蒋政府粉饰门面，并为它向美帝国主义讨好，那还是不能够说明为什么恰恰在这时候这一运动热闹起来。

这正是蒋政权摇摇欲坠，十分危殆的时候，凡是在生活利益上与思想意识上依附于这政权而又不敢断然舍弃它的，这时不能不觉得极端恐慌。如果说，在1946年，民社党、青年党装成第三方面的姿态，是企图用缓和的办法来削弱人民革命势力以效劳于独裁统治，那么，现在这一班扮做自由分子的角色都是意识到已是危急存亡之秋，挺身而出做革命的绊脚石，妄想抵挡一下革命的浪潮，而为蒋家朝廷救急，万一救不了，也还好给他做料理后事的孤臣。

最近在与国民党关系最深的“中央政治大学”中，在该校校长顾毓琇主持下，举行过一个关于时局的座谈会，一些教授的发言都令人有情见乎词之感。其中，刘不同（也是南京47教授宣言的签名者之一，金陵大学教授）说：

去年上半年黄河以北是我们的，今年黄河以南是不是我们的？去年陇海路可通西安，今年只能到徐州。这种时局已经甚为急迫，我们已等不及美国的借款了。……我们的政府堕落腐败，为政者只能代表他本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非其所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庸俗无能的医生。现在我们要自己来



开方子，我没有第二个主张，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他们这一班人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叫他们走和以后谁来干。我想这应该是今天这班教书先生和大学生的责任。……换一个新政府，至少给人以一种新的希望。（3月29日上海《大公报》）

满口“我们的”，其与现在统治集团的关系之深可想而知。说得慷慨激昂，好像真是秀才要造反一样，但其实还是为了整个的“我们”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形势紧迫，美、蒋双方才不惜加工培植这种自由分子集团，让它拿与现在的统治集团稍稍不同的面目出现，用以装点所谓“民主宪政”下的自由，用以配合武装戡乱，用以混乱中间阶层的耳目，更在必要时可以用来做政治阴谋的资本，在最后万不得已时还可以用来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势力的遗命的托孤者。

列名参与这种政治运动的人，不用说得有直接秉承美帝国主义者或蒋家朝廷之命做工作的人物，他们是这种政治运动的骨干。

这种政治运动自然会成为国民党下失意政客党棍，热中仕途的穷文士们所奔赴的热门。这班人虽在基本利害上与这统治政权相一致，但在个人生活上又心怀怨恨，自然要趁这时机来抓一把了。何况这个运动又是在太上老板——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的呢？南京47教授的宣言说得很坦率：“在政治上采用输血治疗，立刻开放政权，扩大政权，扩大政府基础，罗致全国进步分子……使政府内部起迅速之新陈代谢作用”。这正是说，你们这些老官儿的位置该让我们这班人来坐一下了。国民党内各派系各自派出其干部以“自由分子”面目进行活动，互相竞争，这在目前也是已经开始的了。

但我们也必须指出，非出本愿而误行投入这种政治运动的人



并不是没有的。国民党地区内也有人因为一时看不清楚当前局势的发展,误以为这种政治运动也不失为走向民主和平的一条路,以至于糊里糊涂地参加了进去。但当他们发觉了这种政治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后,相信他们会立刻作明确的决断。因为凡是真心为了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人,是决不甘于在“自由分子”的名义下当奴才的奴才的。

至于这一政治运动究竟应该叫做什么政治运动呢?叫做“新中间路线”吧,其实一点也不“中间”,完全是为独裁统治救死图存。叫做“自由主义运动”吧,其实和自由毫不相干。无以名之,名之曰自由保皇派的政治运动或者较为适当。因为比之每天念诵着“党员守则”而向“总裁像”立正的保皇派,这一帮人是较为“自由”一点的。

最初刊载于 1948 年 4 月 3 日《正报》(香港)
第 83 期。



透视南京伪国大

南京的蒋记伪国民大会，是言如其实的一出滑稽闹剧。一切卑鄙龌龊的“花絮”，狗抢骨头的丑态，已经是尽人皆知了。

也很明白的，这一闹剧的意义又不仅是闹剧而已。反动的专制王朝越到了崩溃的时候，其本来在外表粉饰着的一切实质上的丑陋越加全部暴露出来。所以中国历史上在每一个王朝快到覆灭时的小朝廷中，总是最露骨地表现出内部的排挤倾轧、荒淫丑恶来，当今的南京朝廷不能成为例外。

把这一出南京“国民大会”的丑剧当做反映着一个专制王朝的覆灭的政治现象看，让我们提出下列几点来谈谈。

蒋介石的“辞让”

国民党召开这一次国民大会，本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府主席”的蒋介石换上“大总统”的礼服。然而出乎意外的，在“国大”刚开幕后几天，蒋介石向他的中央委员们宣布“不拟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大有“荐贤以代”之势。虽然结果表明这不过是句空话——代表们还是按照着预定布置“选”出了蒋介石做“大总统”，而这个“大总统”也就一声不响地准备着“荣登”“民主”皇帝的宝位了。但所谓“辞让”也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否是从来一切流氓皇帝在跃登他所蓄谋已久的宝座时，照例应有的“客气”表示呢？当袁世凯被“推选”做皇帝时，也曾向他的御用民意机关表示“恳切”谦辞过的。

自然，蒋介石并不是真的不想当大总统。他在4月5日向国民党临全会宣布不参加“竞选”的意思时，提出“未来大总统”应具备的6个条件，于是有不少人猜测，这6个条件是为胡适而设。但其实想请胡适当大总统也还是假的。对这6个条件应该按照蒋介石的辞典作一点诠释：

一、非国民党员（因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已经太臭，太声名狼藉了）；

二、有民主风度（能合乎马歇尔、麦克阿瑟等所要求的“民主”外表）；

三、对中国文化有相当了解（保卫地主阶级的传统地位）；

四、对国际问题有研究（善于体会美帝国主义主人的意旨）；

五、忠心拥护宪法并忠心实行宪政（大总统的权力尽可以加以扩大）；

六、有国家民族思想勇于为国奋斗（坚决“戡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

照这六条来看，蒋介石自己已完全具备了——只差第一条不大够格。此所以蒋介石必须在国民党中表示“辞让”，不要国民党推他出来做“总统候选人”，而要由那算是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签署提名，这样一来，他就算不是以国民党领袖资格当大总统了。

这和袁世凯当皇帝一样，他向他的直属爪牙所组成的所谓民政府再三谦辞，而由这民政府请他非“接受”被制造出来的“民意”不可。



然而蒋介石之所以玩这套把戏，还有比袁世凯更复杂的理由。这因为今日蒋的处境与当年的袁的处境大有不同。当年袁虽在谦辞和接受帝位后6个月就已一败涂地，但在当时他的处境还不像今日的蒋这样的危机四伏。

这是因为，对于袁的丑剧，当时的真正民意还只能作无言的嘲笑，而今日，对于蒋，觉醒了的人民则已经在作武装的批判了。

蒋的独裁统治地位，在上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下面依靠着腐败朽恶的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拥戴。在这人民革命的胜利的巨潮中，蒋受着这两方面的委托而尽着把舵的任务，支撑着反动的独木舟。

眼看这个独木舟已经支撑不住了，就要覆没了。这是否因为这个把舵人的“威望”与“才能”已经不够了呢？是否让这个把舵人稍稍退下一点，反而对于挽救这只独木舟有利一点呢？是否除了他，还能找出更强更有效的把舵人呢？这样的问题在美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统治集团中，都已至少是在开始考虑到的了。正因此，蒋介石的辞让的表示在整个统治集团中引起了一种波动，并不被简单地看作例行的“谦虚”。

蒋介石表示可以不干总统，正是向他的“上司”和“下属”作出一种姿态：“如果我不干，还有谁能干？”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直是在找寻着“最强”的人来做他们的代理人而统治中国。丢开了袁世凯，找到了段祺瑞、吴佩孚、曹锟……丢开了北洋军阀，找到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到了现在，美帝国主义手里拿着一个蒋介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即使觉得他还不够“强”，但要更“强”的人已经是无论如何找不到了。所以美国的合众社说：“国内国外对蒋主席之声明不免有种种之推测。不少观察者仍以为此不过一种形式上的作法，意在显出个人之绝不可少。”(4)



月5日合众社南京电)

对于蒋的辞让,国民党内颇有人觉得可以赞同。4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此问题时,在20个发言人中,有何浩若、黄宇人等6人主张接受蒋的意见(《观察》第4卷第9期)。南京的一些曾站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立场上联名发表“告国人书”的大学教授(倪青原、刘不同等)也举行座谈会,表示“拥戴”蒋的表示,这些都反映着国民党内某一派系(大致上与复兴社系统有关)认为可以让蒋暂时退下去一些。但是蒋如退下去,整个统治集团就能起死回生么?会不会反而更糟呢?

美国官方透过合众社隐约表示了一下意见。“灵通方面评述南京非官方消息,所谓蒋主席不拟在中国新宪法下重新当选事,谓此间政府方面意见认为‘在目前殊无可能’。据称,如蒋主席当真辞职,则可表示蒋主席确信中央政府在华北抵抗共军之军事已告绝望”(合众社华盛顿电)。这是表示,还是要靠你来“戡乱”。国民党的中央也决定“鉴于当前国事之艰巨(生死关头!)与党内期望之殷切(反动社会势力的一致期望)”,还是非蒋出来当大总统不可。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向蒋说:“际此戡乱期中,无人能出而担负此局面”。一些帮闲帮凶的角色少不得也呐喊几声。于斌说:“总统系一重负——特别在此困难阶段中——但蒋主席必须出任”。张伯苓说:“蒋总裁如不当选总统,中国局面很难逆料有何结果,目前谁来做总统都有困难。”

蒋介石巧妙地运用辞让的表示,使他的上司对他再度表示信任,使他的下属对他再一次表示拥戴诚意。但其所以少不了蒋介石,并不表明反动势力之强,恰恰表明了它的弱。蒋介石之所以受信任,并不是因为相信他能挽回危局,而是因为没有他,就更加不得了。上海有一家刊物发出了这样的哀鸣:“我们这只政治的船已



经触礁，搁浅在那里。满船男女大哭小喊，水手们都在争夺救命圈，各奔前程。”他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掌舵者能够带他们出险，但他们更不能设想如果不是这个人掌舵更将怎么办。

无疑的，蒋介石现在在他的下属和上司心目中的“威望”正在逐渐降低，因此，他在穿起他的“大总统”礼服以前，必须设法来使他的“威望”振奋一下。可是从这一番辞让和拥戴的丑剧中，恰恰是深刻地表现着这个统治集团已面临着何等严重的危机！

美帝是最高裁决人

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激烈斗争在这次“国民大会”中表现得十分热烈紧张。

首先表现在“代表”权的争夺上，甚至演出绝食抬棺，登报自杀等等丑态。如果以为这是真的在争什么“民主”，那就太老实了。原来那不过是反动集团各派系分赃不匀而斗殴罢了。所谓“中央提名当选人”是在国民党中央讲资格、讲地位够得上被指定的人，所谓“签署当选人”是各地方有势力的豪绅党棍，他们虽不能在“中央”提名，却能在地方上以权势来造出多数选票的记录。——后一种多半属于CC系统。

其次可表现在“国民大会”中“讨论时局”、“修改宪法”、“提高国大职权”等等问题的争论上。在这些问题上，闹得乌烟瘴气，而其发动者也是CC。原来CC这一系统本是蒋介石运用来建立他的统治机构中的平衡状态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但近年来美帝主人颇有把国民党之腐败都归罪于CC，以牺牲CC来为国民党赎罪之意。因此CC就利用一切机会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并显示自己之不能被抛弃。尤其因为在政治上各方面负责者多半属于政学



系集团，CC 更可利用“讨论时局”的要求来给政学系以打击。

最后，这种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又在副总统的竞争中，淋漓尽致地演出了一幕狗抢骨头的大戏。按照国民党的伪宪法，副总统本是无足轻重的一个职位，但正因为如上所述的原因，蒋介石或许有一天不能不去职，于是副总统的职位就成为国民党内各派系争夺权利的焦点了。

美帝国主义显然在研究着如何为自己培植一个蒋介石的“继承人”。按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向例，他们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必须是有武装的军人。李宗仁以桂系军阀而与西南地方实力保有若干关系，并且近年来在北方又与华北金融势力（买办资本势力）取得联系，而以华北金融势力为基础的政学系官僚集团也愿意支持他，因此李宗仁就在司徒雷登指示下宣布参与国民党的副总统竞选。

CC 集团从自己内部提不出副总统的候选人。他们先支持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来和李宗仁竞选，但是该谁当“副座”已不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而要看美帝主人的意旨。于是 CC 改而支持据说是在美帝眼中较能蒙垂青的孙科。

至于还有几个所谓竞选人不过是在纵横捭阖的派系斗争中的一些运用而已。

此地没有功夫来嘲笑在这幕竞选副总统的连台戏中的一切办宴会、买选票，以至撒娇放赖、拳打脚踢等等怪现象。（如果没有这些，也不成其为国民党的“民主”了。）我们要说的是，在这派系斗争的演出中有些什么意义。

第一，这种派系斗争是并无政治原则的权利之争。如果有一个最高原则，那就是尽一切力量挽救危亡的统治势力。向来，统治势力越到危亡的时候，一方面固然要为“救亡”大目标而呼吁内部团



结,另一方面又必然在内部各派系间因各自攫取最后生存机会而造成你倾我轧的斗殴。因为所剩无多,抢得也就越厉害,因为时机急迫,每人更抢了自以为可保安全的救命圈,而让别人淹下水去。蒋介石向来平衡运用在他统辖下的各派势力,颇能应付裕如,但这次在国大这场戏上显然可以看出,是已不大能够得心应手了。这正是小朝廷的专制统治者的必然的趋势。

第二,从这种派系斗争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得出来,是完全以美国主人的意旨为依归。本来,“国大”之召开,“民主”的扮演,“主席”之改称为“大总统”,就是为了讨好美帝主人。不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却居然愚蠢到不能预见到,这样的一套扮演不但不能为国民党统治挽回一点信誉,反而使任何一个最不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也发生极度的憎恶!然而整个戏到底按照着导演人的意思而一路演下来了。大总统该不该仍由蒋当,要看一看华盛顿的脸色。宪法不能改回“五五宪草”的内容,基本上因为美国主人觉得“五五宪草”不够“民主”。但大总统为应付戡乱不妨有紧急处置权,因为美国主人的要求就是在“民主”外衣下的独裁。李宗仁当副总统本来在蒋介石心目中至少是不十分乐意的,但看看美帝国主义的脸色,也只好接受。

第三,但李宗仁到底还是一家人,“鸡兔同笼”,未为不可。孙科派与CC系在“竞选”中打击李宗仁,说他胜利后就要“逼宫”,失败后就要“造反”,——这不过是一种攻讦之辞而已。但可以注意的是,李宗仁这次上台挟有两套把戏:一、以所谓“改良”政治的名义,拉拢美帝之所谓“自由分子”;二、以地方实力为基础来和人民革命的势力相搏斗。政学系官僚和桂系军阀合作,承美帝旨意而玩弄这两套把戏,是可以想见的,而其基本目的仍是保卫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反动势力,妄想稳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



要把它彻底摧毁

到此，我们还没有谈到在伪国大中的民青二党及所谓无党派的“贤达”（胡适、莫德惠等等）们。那实在是已不值得去谈到的了。他们被国民党用来做装点“民主”的饰品，但是这些角色早已被人民看得一钱不值，哪里还能给独裁者添一点“民主”气味？“国大”里提出宪法补充案（给大总统以紧急处置权），要由莫德惠领衔提议；反映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诸问题，要胡适一类人物去调解。这些“社会贤达”也许由此而自觉身价日高，但“过河卒子”的丑态也越来越显著了。

伪国大好歹总算开过，李宗仁入赞“中枢”，胡适和胡适一流人物将有人被列名在所谓“行宪”以后的新阁名单中。已经按照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的号令而排起队来了的“自由主义”分子恐怕要有一番兴奋了。但正如同上海《密勒士评论报》所说：“最难堪的是被美国重视的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却会被中国学生看得不值一文钱！”

从这次伪国大的整套演出，人们应该看得出来，整个反动统治势力是意识到自己已面对着何等危急的局面，正在不择一切手段地救死图活。正在蒋介石被推上大总统宝座去时，西北的战局大变，解放军光复延安，攻入宝鸡，而法币的币值，不“凑趣”地在一跌万丈，叫反动统治势力怎么能不心慌意乱！

今日南京城内的空气既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做皇帝时的情状，又使人联想到武昌起义后的清政府的仓皇失措。虽然在美帝主持下的四大家族的统治比之清王朝和袁世凯要狡猾得多，也要狠毒得多，但是如果以为这一个南京王朝一面继续凶顽地作着军事上



的挣扎，一面用行宪的空名，招募几个“自由分子”做帮凶，利用某些地方实力派来安排后事，就能延长它的生命，那就未免太短视了。

中国的人民要坚持向前，撕破一切假面具，粉碎一切可能来的阴谋，把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整个统治机构彻底摧毁！

最初刊载于1948年5月10日《自由丛刊》(香港)
第14辑，署名李岱青。



怎样认识新政协的号召

—

自前年(1946年)下半年以后,在内战扩大过程中,曾经出现一种看法,以为中国政治问题既已被用武力来解决,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在政协会议桌上求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革命中就不可能有什么统一战线的存在了。

施复亮先生曾经先后发表过的几篇讨论“中间路线”的文章中,实际上正是表现着这样的看法。

到了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已在它的五一口号中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而其他民主党派一致表示响应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明白看出,上举这种看法乃是错误的。

我们并不是要回头重新批评施先生的意见,但为了认识新政协的性质与意义,提出上述这种看法来检视一下,是有意义的。

当时施先生的看法是,在1946年11月前,中共是支持“政协路线”的,但到了以后,内战扩大,在国民党反动派舍弃了政协路线时,中共同时舍弃了政协路线,改而“坚持它独特的左翼革命路线”,而且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路线。因此在1947年4月的施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政治路线:第一条是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右翼党派所走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第二条是代表工人贫农的左翼党派所走的革命的政治路线;第三



条是代表中间阶层或中间派所要走的改良的政治路线。”又说：“我们应当反对内战到底，要想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回到政协路线，即回到中间路线。”

这样的看法的基本错误是：一、不了解 1946 年的政协已经被证明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是在中国政治中不能也不应该复活的东西，是已经一去而不能复返的了。二、不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的相关性，因此就以为中共既已全力从事革命的战争，就表示它已不再要统一战线，而为其捏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性”的“左翼政党的独特的政治路线”。

1946 年的政协是包括反动势力在内的国事协议机关。在当时的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形势下只能有这样的会议。其结果，从一方面看来是失败的，另一方面看，又有着重大的意义。失败是因为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达到削弱和消除反动势力的目的并没有做到。但也因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就在于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由实际经验中人民认识了反动统治者的卖国独裁的顽固本质，看出了要削弱和消除反动势力，要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采取别的方式。

由于 1946 年的政协失败，是否可以简单地宣布另举行一个不包括反动势力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呢？很明白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旧的政协是适应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下的惟一可能的方式，那么如果阶级力量对比形势没有根本变化，就不可能举行新式的政协。这就是说，在旧的政协既已失败以后，人们所应致力的，就只能是要团结一切民主阶级的力量，来在反动派的武力进攻与镇压下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由此来造成一种条件，可以由一个排除反动势力在外的政协会议解决中国问题。

于是战争就成为必要。



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有一种“打天下”的思想，即所谓“老子手里有枪，天下就是老子的，老子爱怎样就怎样”。以为内战既然扩大，中共就一定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革命路线”的想法，未尝不是受这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以此来估量中共，是把已经有了近 30 年的革命经验的革命政党看得太幼稚了。

中共是个无产阶级政党，但事实证明，中共在国内战事过程中并没有采取什么社会主义性的政治路线，也并没有执行任何不照顾其他民主阶级的“独特”的政策。其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卫一切民主阶级的利益，并创造一种形势，可以由各民主阶级的人民大众自行解决中国国事。——中国问题的解决，舍此没有别的道路。

只有形式主义者不能懂得这问题，好像 1946 年的政协就是统一战线的唯一方式，好像有了战争就没有了统一战线，好像要有统一战线就必须中途停止战争而恢复 1946 年的政协。——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既不能认识中国问题，更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二

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特点使得中国革命中必然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武装斗争的问题，一方面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两方面是密切结合着，不能分开的。

陈独秀曾经为了顾全统一战线，而宁愿不要农民武装，其结果连统一战线也没有了。反之，如果因为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是工农大众所执行，便以为可以不必顾到其他民主阶级的利益，不必有团结和领导一切民主阶级的问题，那自然也是错误的。

两年内战中，中共所执行的政策是什么政策呢？就其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税收政策、城市政策来看，都可以承认，那是贯彻



着统一战线的精神，而并不是片面地为工人、贫雇农利益打算的政策。拿中共所历次颁布的对时局口号来看，也可以看出其一贯的精神。1947年的“七七”10周年中共中央发布对时局口号，其首二条是：

一、全解放区人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

到了1947年的双十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口号67条，其中也是一面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进犯军！”（第16条）一面提出“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23条）同时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基本政策8条，其第一条就说：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这些表示中，都可以看出是一面坚持发展武装斗争，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一面坚持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被压迫的各民主阶级来共同解决中国问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两方面的紧相配合，在两年来的事实中得到充分证明。正是在战争的发展中，统一战线才能有巩固扩大的发展。战争使反动势力更加削弱，更加孤立，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也就更加提高，于是统一战线也就更加巩固扩大。反过来，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又保障了战争的胜利。两年来，解放区军民之所以能够取得大踏步的胜利，超过预料的速度，主要原因之一



是他们的战争得到全国各被压迫阶级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

1947年7月正是解放军准备过黄河南下展开大反攻的时候，就在这时候，“七七口号”中鲜明地提出“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3个月后，全面大反攻的初步胜利业已稳固，双十节口号中又重申这个主张。到了今年4月，蒋军在战场上已被歼灭达二百三四十万人，整个战场上展开着前所未有的形势，“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来到，就在这情形下，这个一贯的主张便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劳动节口号中取得了更具体的表现，那说的是：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根据这样的发展的线索，召开新政协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否则，如果以为有了战争就没有了政协路线，于是就会以为，政协的出现倒是表示战争的曲折，那就成了痴人说梦，与事实的发展越来越远了。

三

旧政协的召开是以停战协定为前提，是以反动势力与人民革命势力在战场上的妥协为前提，新政协的召开却是以战争为前提，是以人民革命势力在战场上压倒反动势力为前提。

旧政协包括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内，并且因为有反动势力



参与,其他的出席人的数量远不足以代表各被压迫的民主阶级的实在力量。新政协不但是排除了反动势力在外,而且因为它是建立在战争期间所巩固扩大的统一战线基础上,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社会贤达所共同召开,因此它将能够正确地表现出各民主阶级的比重力量,代表他们的一致愿望以解决中国问题。

在1946年的旧政协以前,人民曾经一致努力来督促反动统治者,使他不得不接受停战要求,不得不接受以协商来解决国事的要求,这样来使政协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在现在,我们应该怎样来促成政协会议,并经由政协会议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达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的呢?我们的一切努力只应该朝着一个方向:更猛烈地开展消灭反动势力的人民革命战争,更提高和加强全国人民大众的觉悟、团结与斗争。反动统治者仍在妄图挣扎,我们的任务是要粉碎他的一切苟延残喘、借尸还魂的阴谋,使他更加孤立,而终至无可挽救地沦亡。一切帮凶伪装的自由主义者还在巧施簧舌,企图在群众中蒙蔽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企图使人相信可以有不根本改变政治现状而以改良办法来求得中国出路的可能。我们的任务是要让群众彻底明了,旧政协已经一去不返,只有在人民革命的基础上,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各民主阶级的共同出路。

在新政协的号召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将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将更加速地到来。在这种情形下,新政协必能够完全成功,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展开无限光明的前途!

最初刊载于1948年6月5日《自由丛刊》(香港)
第15辑,署名李岱青。



第 四 辑
杂 文
(1935—1947)





报 复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的债只有用血才偿得清——这是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的野蛮人所保持的一种“道德”。

这“道德”自然是早已丧失了的。住在上海的人便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报纸上记载，有某个高等华人或高等洋人的汽车撞死了拉黄包车的，或是做小买卖的这一类人，尸首躺在马路上，一摊血。记者先生还得加上句按语：“惨不忍睹”。但是结果呢？大抵总是百把块钱乃至几十块钱就把这摊血洗得干干净净，仿佛不曾有过似的了。

然而血可以用钱买这样的事倒也不能说是只有现在有，由来其实也是很古很古的了。——今天读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中间有一篇是论“正义思想的起源”的，便提到这回事：“私有财产一旦建立起来，便不再要求以血换血，他所要求的是财产，报复刑也就改变了。”怎么样地改变呢？于是，人们便要求以牲畜、铁、金抵偿生命、牙和其他的伤害，来代替那以命抵命，以牙抵牙的赔偿了。倘然还要知道得更详细的话，拉法格原书中举例着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不妨再在这里转载一下。（这故事虽然还是发生在一个原始的民族里面，但这民族已经是半开化的了）

裁判官和观审者围成一个宽大的圆形，犯人在中心，把一枝枪和一把刀系在他的颈上，向被侵害者方面膝行而前直到



其脚为止，在人家把那些武器给犯人拿开以后，才挪起他并抱着他说：上帝赦免了你。于是那些旁观者就以快乐的鼓掌，庆祝仇人们底重新和好……这种仪式叫做“血会”(Cercle du sang)。其结束要由凶手出钱来举行一个贺节，凡一切在场者都得参与。

野蛮人的硬气于是完全消灭了。仇人们似乎都忘记了血的仇恨，摆开宴席来，举起满斟着香槟的酒杯丁丁当地碰一下。旁观者都快乐鼓掌，凶手自然更是满心得意地笑了，而被受害者呢——也笑了。

据说人类就是这样地文明起来的。——圣人说：毋报复，毋抵抗，被打了左颊之后，再把右颊也伸过去。——这一类训练人成为奴隶的道德变成天经地义的时候，离开原始的野蛮人，是不知若干远了。

半开化的民族用了“上帝赦免了你”这样的话，固然也可以遮盖掉拿血卖钱的丑行，然而后世在道德的训条下，掩饰掉了血的痕迹，这种办法不能不说是格外的聪明了。

然而傻瓜总是有的！据说在古代的丹麦，便流传着一首武士(Barde)的歌，内容就是“愤恨那时的风俗，反对把他们的父亲的血放在他们的钱口袋里底人的”。

但是歌毕竟只不过是唱唱罢了。事实上，能拿父亲的血卖钱的人反而是成为大家钦佩的聪明人。并且卖得了钱还可以苟延残喘地活几时，若还逢时逢节上父亲坟上去磕两个头，也就不能一定算不肖之子了。

东北几年来死了那么多的义勇军和平民，血可算也流得不少了，又几曾看见卖到了钱呢？——血要是还能让他们的儿子去换几个钱，到底也不是完全白流的了吧？



不过对于用钱买血这样的事也不能看得太死，买卖原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试翻无论哪一本讲道德的书，都不会直接承认把父亲的血藏到钱口袋里去的行为的——虽然他们也反对“以血换血”，反对报复。

这里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对于反对报复这样的话也是不能看得太死。一方面反对“以血换血”，一方面又鼓吹世界大战。一方面，在1914年人类的不知多少血莫名其妙地流掉了之后，现在又旁征博引地，甚至根据天文学来鼓吹第二次的大流血，但另一方面，还是无碍于跟奴隶们讲道说：被打了左颊之后，再把右颊也伸过去！

道德原来就是有两面的，正如拉法格在另一个地方所说：“如果说基督教最高的宝训是‘你们彼此相爱’，那么基督教的教堂，为了给他们的店子广招顾客，便只想到用铁和火来强迫异教徒改宗，以救他们出地狱底永劫之火。”

我不知道这样的道德是不是就能表示人类的文明，但是无论怎样，我总以为，原始人的质朴，真挚，老实是来得更可爱的。

然而原始人的这种的精神是不是真是完全消灭了呢？——仔细想来倒也并不然。记得在《太白》第二期上有篇题目叫做《辟水》的速写，写乡下人在旱灾时，求神神不灵，便把所有的神像都抬出来放到田里面去晒：

泥像在毒太阳下面起了裂纹，泥的袍挂一片片掉下来。敲着锣鼓的村里人见了，就很痛快似的发喊。“神”不能给他们“风调雨顺”，“神”不能做得像个“神”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报复是可怕的！

我想，最可怕的报复也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吧。——受够了“神”的苦的人是不会说着“上帝赦免了你”这样的话，而偷偷塞



几个“血钱”到荷包里就马马虎虎了事的。

血的债只有用血才能偿得清——这样的道德说不定也颇值得在今日来恢复一下，因为它比了礼义廉耻，不消说得，更是古得多，古得多的！

3月16日晚在北平图书馆

最初刊载于1935年4月20日《芒种》(上海)
第4期。



鸦片、开矿、田赋等

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国闻周报》第12卷第16期(4月29日出版)中间的《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记载道：

黔省府委员，国府已明令发表。吴忠信等已起程赴黔，新省府有5月1日成立之说。省委中有矿冶专家湛湛溪任建设厅长，地质学家朱庭祐任委员，可见中央重视开发贵州矿产。蒋又令李仲公先接收餉捐税局，清理“通关”税票。所谓通关票者，即鸦片烟出口税是也，年约收六百余万。在此过渡期间，鸦片未实行禁种以前，黔省财政似仍依此为命脉也。中央因黔省受祸最烈，特豁免二十四年分田赋，但此税已被旧省府预征矣，黔民似未能得受中央之恩惠。此时春耕已废，如何抚绥，黔当局宜事先筹划，空谈开发矿产，不能济急也。

这一段“述要”的内容，在每天的报纸上，是早就都看到了的。不过经该杂志的编者综合地这样叙述了一下，使人看到了，更觉得触目惊心一点罢了。

从这一段简单扼要的叙述中间，的确的，我们是看到了不少的事情：像贵州那样偏僻的省份，不是在这段叙述中间留下了一个生动的剪影了么？

请看吧：鸦片充塞在民间，而种田的农民呢，大概二十三年(1934年)的收成还没有到手的时候，已经被“预征”了二十四年



(1935年)的税(但要是只预征一年,贵州的农民比较四川的农民还算是幸福点的)。虽然有了豁免一年田税的优待,也还是没有福气享受。

真的,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矿冶专家”、“地质学家”虽是荣任了“厅长”、“委员”,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来呢?“空谈开发矿产,不能济急也”,《国闻周报》的记者无可奈何地下了这个结论,真使我们也不禁跟他一齐“废书叹息”了。

最初刊载于1935年6月10日《读书生活》(上海)
第2卷第3期。



帮闲的学者

近几年来，北平人确是遇到过许多次的“意外”了。

最初时候，大家一碰到“意外”，实在是惊慌害怕的，于是乎搬家，于是乎“逃难”……自然，在这搬家、“逃难”的人中间也有大学生。——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大学生也是人。

而况连不是“人”的古物也早已一车车地“南迁”了呢？

然而事实上是：不是“人”的古物仿佛要比是“人”的大学生还可贵一点——因为有许多人高声嚷嚷着道：不要逃避！你们大学生是国家的中坚，这样仓皇地逃难，岂不是贻笑国际？总之是你们大家都应当镇定。

“应当镇定”这是个原则，而如何补充、说明、证实这个原则，那便是“学者”们的工作了。“学者”自然是聪明的，他们翻一翻书，马上有了，“你们应该学普法战争时候的法国的小学生啊，敌兵已经来了，还在上最后的一课呢！”——是的，大家应该镇定地上“最后的一课”。

最近，北平方面又发生了一次“意外”。这一回百姓们因为已经训练有素，都不很怕，也不急忙逃走了。大学生也没有逃，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镇定”地上着“最后的一课”。

然而我们这一回却在报纸上看到了北方各大学要迁移的消息，虽然是马上被几个大学的校长所“绝对否认”了，但这消息确是



有过的，而且大概并非全然是无稽之谈。

大学生应该高兴了，因为现在是人家把他们看得和古物一样地宝贵了。

然而为什么当初不该逃难现在却应当搬家呢？——回答这问题自然又不能不仰仗“学者”们了。

标准的“学者”是应该到吾家博士的《独立评论》上去找的。果然我们到七八月的《独立评论》上看到许多论高等教育的合理化和提议合并国立大学的文章。

原来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者”们忽然看出来高等教育的不合理了，于是对于大学的地点分配也不满意了。譬如北平的大学校就太多，应该迁到“新疆、甘肃甚至陕西或贵州”去。

啊，原来如此。

当初是“最后的一课”，而现在是“大学地点分配的合理化”——“学者”们是永远有一套堂堂的理论的。

而在这先后的一反一复之间，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学者”们的嘴脸和他们的“帮闲”的伎俩。

最初刊载于1935年9月25日《读书生活》(上海)
第2卷第10期。



论客的丑脸谱

今天日报上有孙科向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谈及“大赦政治犯问题”。据说：“中央仍本宽大为怀之旨，对有功革命之政治犯，行使大赦，予若辈以自新之路，当可减少反动之集体力量。”

在一件时事发生的时候，比了这事件的本身，倒往往是这事件在一般论坛上的反映，以及在这反映中间所显出来的一些“论客的丑脸谱”更使我发生趣味。——今天我看到的一份日报（《时事新报》）和一份晚报（《大晚报》）上，社评便是在相反的两个观点上反映了孙科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谈话的。

先看《时事新报》的，那是农山作的《为大赦政治犯进一解》。他是反对大赦的，他说：“我们觉得今日中国当前的大问题不在于抽象的消极的‘释放政治犯’，而在于具体的积极的完成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解放。”这就是说：大赦政治犯现在为时还早，要留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之后才做。为什么现在不应该大赦政治犯呢？这位论客提出理由三点：一是“假使当局要普遍的大赦，那么在客观上必有优容国贼汉奸的讽刺”；二是“政治的错误只有自我的忏悔，在没有自我忏悔以前，纵令大赦，亦难改正其错觉”；三是“对着孙科说的‘有功革命’那样的话而发的。这位论客以为尽管过去‘有功革命’，但是因为‘往往某种学说在今天为真理，到明天则变成邪说’，所以这些不能聪明地‘改邪归正’的人还是应该被监禁在暗无天日”



的地方的！

我们不知道这位论客是代表谁在讲话，这种意见很容易使人以为是××政府拿钱来买通了的^(註)。

请问我们的论客：你在哪儿看见“国贼汉奸”郑孝胥、殷汝耕之流被下在牢狱里面过？放着真正的“国贼汉奸”，让他们建立伪国，鼓动“自治”，而不去讨伐，却使成千的热血青年，终年过着奴隶的黑暗的生活，仅仅因为他们的政治意见和现政府的不同！——这真应该说是故意削弱反汉奸国贼的力量，削弱救民族的力量。政府当局能表示考虑大赦政治犯，这正证明他们还有点远见。但这些画着鬼脸的论客却在主人脚旁悄悄地吠起来了。难道这些论客以为把成千青年关在牢狱中倒可以避免“优容国贼汉奸的讽刺”了么？就可以使这些青年“自我忏悔”、“改邪归正”了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这些论客是想把自己的软骨病也传染给人家！

答复这种无耻论客也不必我们多费什么话了，今天的《大晚报》的社评已经说得很好。他说：“政治力量生于团结，团结的形成奠基在一个‘诚’字……‘诚’，真心救国的‘诚’，这抽象的意图必须用具体的事态表现出来。表现的方法虽多，可是单刀直入最足令人感动的一条路，就是抹去过去一切政治上的恩怨，从今日起凡是真抱救国热忱的国民没有一个不能容纳在我们同一阵线之中。”所以他认为“大赦政治犯”是“中央在共赴国难的大原则下，将不计既往与全国作‘昨死今生’共抱最大决心而奋斗的表示。”

很明白的，中国当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抗日救亡，所以对于一切问题都应该根据整个的抗日救亡的联合战线而去考察。从非人生活的牢狱中把一切抗日救亡的力量集中起来，充实国防的最前线，这真是全民的要求。只有那些吃主人残羹的论客才歪曲了真实，歪曲了民众的要求，有意向民族的敌人献媚！——虽然有时，这些论